

赫·德·馬拉維亞著

#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赫·德·馬拉維亞著

北京編譯社譯

內部讀物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0年·北京

H. D. Malaviya  
KERALA, A Report to the Natio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New Delhi, 1958

根据印度新德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英文本译出

• 内部读物 •

## 喀拉拉邦

——关于印度共产党执政情况的报道

[印度] 赫·德·馬拉維亞著

北京編譯社譯

---

出版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1号

印刷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

定 价 每 本 五 角

---

开本 787 × 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5  $\frac{3}{4}$  • 字数 50,000

1960年1月第1版 196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号 3003 · 507

## 譯者的話

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期間取得了巨大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并在印度其他各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即使是资产阶级的某些人士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本书作者赫·德·馬拉維亞是印度国大党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任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机关刊物“經濟評論”的編輯和喀拉拉邦政府的經濟顧問。他在1958年10月写的这本书中承认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在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等方面做出的成績。1957年4月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以来，开始进行了行政改革；发展了邦內的工业；实施了禁止夺佃法，制定了土地关系法案，大大推进农民摆脱地主压迫的事业；提高了工人的工資，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制定了教育法案，保护私立学校教师的权利和改善他們的状况。所有这些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措施和所取得的成就，作者在本书中都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述。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是对于印度国内外反动派对印度共产党的恶毒誹謗和誣蔑的一种有力駁斥。

当然，作者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場上，他的基本思想只是要求国大党容共，而仍把希望寄托在国大党身上。他虽然暴露了国大党內部的黑暗，但仍然认为国大党有“健康核心”，并认为能使印度繁荣富强的，“除国大党外，再也没有其他組織了”；与此同时，作者表示出对尼赫魯推崇备至，也表示出他是国大党所謂“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信仰

者，认为在尼赫魯的創議下，“議會和国大党所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已經替印度的未来历史規定了道路”。作者在书中还把国大党和尼赫魯的“社会主义”以及和平过渡的問題同印度共产党爭取的社会主义以及对和平过渡問題的态度混为一談，并歪曲了印度共产党 1958 年 4 月阿姆利則特別代表大会的決議。作者认为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似乎說明印度有“健全的民主”，这种謬論，也已为事实所駁倒了。从书中談到的国大党对土地改革的态度以及对所謂“社会主义”的解釋来看，正好說明了当資产階級掌握政权时，不但根本談不到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作者在书中談到的国大党最高当局和印度中央政府对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的态度，以及后来（1959 年 7 月 31 日）印度中央政府宣布解散喀拉拉邦政府的事实，也正好說明了印度資产階級民主的虛伪性、欺騙性和它的破产。此外，作者认为階級斗争是“凶暴的”，并把它同“极权主义”相提并論，认为民族主义同共产主义有許多“共同之处”等等，也都表明了作者的資产階級观点。

但是，本书有助于人們了解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的情况。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对于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所取得的成就，連像馬拉維亞这样忠实追随尼赫魯的国大党人也不得不予以承认。最近，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虽已被印度政府非法解散，但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广大人民反对这种非法措施的斗争仍在发展和扩大。为了帮助讀者了解情况，特将本书全文譯出，以供参考。

## 目 录

序言.....	1
一 印度独立后的喀拉拉邦.....	2
二 “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縫”.....	14
三 喀拉拉邦共产党內閣就职.....	25
四 教育政策和成就.....	32
五 劳工政策和成就.....	51
六 关于喀拉拉邦“局面不安定”的全部謊言.....	62
七 印度国内反动势力的伎倆.....	78
八 灌溉计划和电力发展.....	89
九 共产党政府的土地政策.....	97
十 內战还是共处? .....	115
十一 共产党执政下的一張收支平衡表.....	128
十二 德維科倫补缺选举和选举后的情况.....	142
十三 向国大党同人进一言.....	156

## 序 言

我是在1958年6月完成这篇报告的。写完之后又是四个月过去了，这期间喀拉拉邦发生了许多需要加以考虑的事情。关于法律和秩序的叫嚣又气势汹汹地卷土重来。同这个由来已久的奇谈一道出现的是关于共产党干涉邦政府的指责。另外还有几次政治性的冲突，这些冲突造成了一些人的死亡。

然而问题是：本报告的主要结论是否由于这些发展而需要做任何修正呢？我是不这样看的。喀拉拉邦最近所发生的事件，如果起任何作用的话，也只是证实本书的基本结论罢了。

赫·德·馬拉維亞

1958年10月15日

## 一 印度独立后的喀拉拉邦

喀拉拉邦(也就是特拉凡哥尔—柯欽部分)<sup>①</sup>从1947年到1957年的经历是不幸的。这段不幸的经历说明了一系列国大党政府相继倒台,说明了那些菲薄之徒一朝大权在握,便目眩心迷、忘其所以,同时也说明了那帮国大党人为了推翻那些正在当时掌握政权的人,彼此之间便结成层出不穷、变幻无常的派系联盟。难怪今天的馬拉雅利語族人民极其郑重地宣称:“如果南布迪里巴德<sup>②</sup>下台的话,在他任期届满以前,就让总统来治理我们吧。但愿神把我们 from 国大党那伙老坏蛋手中拯救出来。”(见1957年12月18日“时事报”载“关于喀拉拉邦的报告”一文。)

在这十年中,喀拉拉邦的经历也正是国大党中央领导机构无能的写照;令人惋惜的是,邦国大党组织腐败无能、江河日下,国大党中央领导机构竟一直无法加以制止,听任邦的党组织一直处于那些政治生活已由灰暗变成漆黑一团的人们的指导之下。

国大党主席烏·納·德巴<sup>③</sup>在写给买索尔邦国大党主席斯·昌尼阿的信中,曾谈到对当时的首席部长斯·尼扎

① 喀拉拉邦是由原来的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大部分地区和由临近的馬德拉斯邦划入的一小部分地区组成的。——譯者

② 印度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自1957年4月至1959年7月任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的首席部长。——譯者

③ 在1959年1月举行的国大党第六十四届年会上,改选英迪拉·甘地夫人为国大党主席。——譯者



林加帕所投的不信任票；他在信中警告国大党人說，“他們不懂得，这种做法应对我党在喀拉拉邦的惨敗負責。”德巴接着写道：“在喀拉拉邦，国大党每三年都要把邦政府搞垮，然后再建立一个新政府，而隔不上两三年又把把这个新政府推翻。在这次或那次推翻政府的事件中，我还没有发现一位喀拉拉邦領袖不应对这种事負責；采取这种消极破坏态度的結果，使共产党人坐收漁人之利。”（見 1958 年 3 月 31 日“印度教徒報”）

特拉凡哥尔邦邦議会的第 一 次 大 选 是 在 1948 年 2 月 举 行 的。当时国大党的威信非常高，因而在选举中輕而易举地就取得了除去一席以外的全部議席，而且当选的那位唯一的无党派人士不久以后也加入了国大党。的确；国大党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邦，都没有取得过像在特拉凡哥尔邦这样彻底的胜利。

1948 年 3 月，邦国大党主席巴頓·丹努·皮萊宣誓就职，成为特拉凡哥尔邦国大党的第一任总理（“首席部长”这一名詞到后来才逐渐流行起来）。这是一个由三位部长組成的小內閣，另外两位部长是邦国大党的老党员斯·克薩万和特·姆·維尔吉斯。現在他們两人都已結束政治生活，而巴頓則仍然是邦国大党的主席。

巴頓自然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看法。1948 年 4 月，在一次傳統的送神入海典礼游行中，这位未来的人民社会党領袖，身上只穿一件曼都（Mandu，喀拉拉邦男子常披的一种圍布。——譯者），手持脫鞘宝劍，在土邦大君的面前大踏步地走过。特·姆·維尔吉斯是一位基督教徒，无法参加这次游行，而斯·克薩万則是一位納拉雅納格魯社会学派的社会改革領袖，因而拒絕参加，他說他是人民的公僕而不

是土邦大君的奴僕。

巴頓·丹努·皮萊就職後不過幾個星期，就掀起了一次鎮壓共產黨的浪潮，逮捕并監禁共產黨人。他又和在特里凡得琅游行示威的學生發生衝突，學生一度因包圍他的汽車，而遭到警棍的毆打。

不出四個月，風波便開始發生了。由於克薩萬和維爾吉斯攜手合作，巴頓就不聲不響地拉了四位人士宣誓就職新部長，事先根本沒有征求他的同僚的意見。這四位是：克·姆·柯拉、阿·阿朱坦、格·拉馬強得琅（現在是甘地村的領袖）和普·斯·納塔拉扎·皮萊。維爾吉斯和克薩萬以辭職相威脅，但是在犧牲普·斯·納塔拉扎·皮萊的條件下，雙方取得了某種和解。於是普·斯·納塔拉扎·皮萊在四十八小時以內便被拋出內閣。

但是，邦國大黨的內部不和與派系傾軋依然存在，因為邦國大黨的情況一向如此，而且直到今天還是這樣。不過，喀拉拉邦歷屆政府的垮台，一直是幕後巨掌所干的勾當。每當他們的既得利益遭到危險，那怕是一點點危險的影子，他們總要推翻舊政府，建立新政府；而一旦採取行動的時機到來，喀拉拉邦那些專搞派系活動、渴求權勢的國大黨庸俗之徒總是甘願充當工具而唯恐不及。

1948年9月，巴頓·丹努·皮萊的第一任內閣垮台了，這時距該內閣成立只不過六個月，在喀拉拉邦人民的心目中，這次垮台是與一件他們幽默地稱之為“阿比安·普拉斯塔那姆”——即“簽名運動”——的事件聯繫在一起的。這次，幕後巨掌之所以決定採取行動，是由於一個以斯·克薩萬為首的內閣委員會提出了一份主張土地改革的報告。克薩萬委員會的報告始終沒有發表，但是人們相信，該委員會

的有关土地改革的建議一般說來性质是温和的。該邦的天主教反动势力，在教士的领导下，和基督教种植园主的資助下，决定进行攻击，而这批种植园主則受到在喀拉拉邦統治大片种植园的外国人的支援和教唆。据說，从柯塔揚姆地方的一个种植园里开出了一輛汽車，四处征集邦議員的签名来反对巴頓的领导。而领导这次签名运动的桑庫·皮萊最近竟加入了同是由巴頓领导的人民社会党，这真是一个很大的諷刺。在推翻巴頓內閣的时候，他扮演主要角色，并得到其他人士的得力支持，其中有現任喀拉拉邦議會反对党——国大党——領袖普·特·查科。

在国大党内，反对巴頓的一派是由特·克·納拉揚納·皮萊和他的助手克·阿·干加哈拉·梅农领导的。他們提出这样一个論点：邦国大党主席和邦首席部长不应由同一人担任。巴頓所控制的多数席位被削減了。据說，在国大党的一次會議上，他在盛怒之下撕毀了所有的文件，宣布辞去一切职务，然后他一面走出会场，一面声称：在人民再度号召他的时候，他还要回来。

接着特·克·納拉揚納·皮萊便宣誓就任新首席部长，直到1949年7月1日，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合并时才下台。已故的阿·季·約翰是他的內閣的一員。为了酬謝自己的助手克·阿·干加哈拉·梅农的勞績，特·克·納拉揚納·皮萊竟采取了一种絕无仅有的方式，甚至当梅农仍然是邦議会的議員时，就任命他出任特拉凡哥尔邦的首席檢察官，这真是法律程序上聞所未聞的事。当人們反对这一彻头彻尾違反宪法的粗暴行为的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特拉凡哥尔邦的首席檢察官一职才被取消，但干加哈拉·梅农竟又当上了高等法院的法官！

特·克·納拉揚納·皮萊再度当选为新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国大党領袖。他的新內閣閣員多半还是以前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的那些部长，其中包括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帕南帕利是柯欽邦的伊堪达·依·沃利尔所領導的四人內閣的一員；当公众对那件牵涉到五十五万卢比、随后又臭名四播的“椰油舞弊案”进行抨击时，他不得不首当其冲。事实上，从此以后，“安查拉·拉克沙姆”（五十五万卢比）一語在喀拉拉邦便成了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人格的同意語了。

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合并的結果是，在喀拉拉邦国大党人之間早已存在的无休无止的派系紛爭之外，又加上了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之間傳統斗争所造成的爭端。那里永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風波，使邦政府不能稳定。不久以后，在1950年，特·克·納拉揚納·皮萊不得不下台而只在斯·克薩万所組成的新內閣中担任部长之职。克薩万被选为国大党的新領袖。克薩万的內閣一直維持到1951—52年的大选。

在独立后的岁月里，全印国大党組織本身也并不是沒有內部傾軋和爭吵的。1948—49年，国民大会社会党从母体分裂出来，建立了印度社会党。巴頓·丹努·皮萊自从1948年9月下台以来，一直在等待机会，以便东山再起，因此便加入了社会党，并在該党的旗帜下参加了1951—52年大选的竞选。

此外，在1951—52年大选以前，阿查雅·克里帕拉尼<sup>①</sup>也退出了国大党，并組織了农工人民党。喀拉拉邦的老甘地信徒，克·克拉潘和克·阿·丹默达拉·梅农也加入了农工人民党（他已回到国大党，目前担任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員

会主席)并用該党的政綱参加 1951—52 年的大选。

共产党和該邦的其他左翼党派(即喀拉拉邦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組織了左翼党派統一战綫,以便在特拉凡哥尔—柯欽地区 1951—52 年的选举中竞选。共产党和农工人民党在馬拉巴組織了統一战綫。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特拉凡哥尔南部有一批要把南部四个主要泰米尔族税区并入泰米尔納德的国大党人也退出了国大党,在大选中以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人的身份参加竞选。

1951—52 年的大选表明,1948 年那个所向无敌、至高无上的国大党在几乎不到四年的時間中,地位已一落千丈,而且下降到令人震惊的地步。在一个共有一〇八个議席(包括一名指定議員)的議會里,国大党只获得了四十四席,因而处于少数党的地位。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却获得了特拉凡哥尔南部的全部十个席位。

巴頓的社会党集团获得了十二席,其中有半数是依靠特拉凡哥尔—柯欽邦左翼党派統一战綫的支持而取得的。左翼党派統一战綫共得三十八席,其中有三十一席屬于共产党或共产党支持的无党派人士,六席屬于革命社会党,一席屬于喀拉拉邦社会党。还有四名天主教徒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当选。

虽然国大党并没有获得絕對的多数,但是,該党已故的阿·季·約翰却是邦議會中最大的单独党团的領袖,因而被邀組閣。不过,两年以后,另外一个印度邦——安得拉

① 克里帕拉尼曾任印度国大党总書記和主席。1951 年 5 月,他脱离国大党另組农工人民党,自任主席。1952 年 9 月該党与社会党合并而成人民社会党,他被选为主席,至 1954 年 12 月为止。現在他仍是人民社会党領袖之一,他认为潘查希拉(和平共处五項原則)是在“罪恶中产生的”。——譯者

邦——却頑固地拒絕这样作，因为当时最大的单独党团是共产党。

1952年3月14日，阿·季·約翰宣誓就職。他曾与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协商，并达成了協議，內閣中包括一名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人。后来有两位議員退出巴頓的社会党集团，加入了国大党，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国大党的地位。因此，在这个共有一〇八席的議會中，国大党（包括一名指定議員在內）便掌握了五十五票。人民社会党人克·普·尼拉堪塔·皮萊当选議長；他后来也加入了国大党。

約翰所領導的內閣執政到1953年9月为止。就在这个时期前后，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集团，由于国大党不願意支持他們想把特拉凡哥尔—柯欽邦南部的四个稅区分割給泰米尔納德的要求，便脫离了国大党，从而酿成了一场危机。他們提出了不信任案，并获得通过，于是政府垮台，但仍受命作为看守政府，繼續职守，直到規定在1954年1、2月間举行的另一次大选为止。

重新划分选区的結果，使現在的邦議會拥有一一八个席位（內有一名指定議員）。包括共产党、喀拉拉邦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在內的左翼党派再一次結成了統一战綫，并且和巴頓·丹努·皮萊建立了同盟。这时，巴頓正領導邦的人民社会党，該党是继阿查雅·克里帕拉尼的农工人民党和过去的国民大会社会党在全国範圍內合并后組成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也参加了竞选，他們的口号是：把泰米尔地区划分出来，与馬德拉斯邦合并。

在1954年的大选中，国大党再一次遭到失敗，只获得四十五席。在共产党积极支持下的人民社会党获得了十九席，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获得十二席。左翼党

派統一戰綫獲得了四十席，其中共產黨占二十八席、革命社會黨占九席、喀拉拉邦社會黨占二席。無黨派人士僅有一人當選。共產黨的議會實力的削減是由于該黨竭盡全力，以圖獲致左翼黨派間的團結，並與人民社會黨結成同盟，結果便犧牲了許多有把握的選區。

帕南帕利·戈溫達·梅農當選為國大黨領袖，但是他為糾合議會多數而作的全部努力却是徒勞無益的。與此相反，人民社會黨與左翼黨派統一戰綫的聯合倒有出現的可能，這種聯合在共有一一八席的議會中就占五十九席。這意味着將要成立一個有共產黨參加的左派政府。對於這種前景，國大黨最高當局自不能無動於衷。因此，國大黨在該黨最高當局的指示下，同意支持一個人民社會黨的政府，但本身並沒有參加這個政府。於是，喀拉拉邦便經歷了這樣一件顯然很荒唐的事件：在一一八席的議會中，僅僅有同黨議員十九名的巴頓·丹努·皮萊竟組織了政府。

1954年3月，巴頓·丹努·皮萊的人民社會黨政府宣誓就職，執政十一個月，於1955年2月辭職。在巴頓當政期間，帕南帕利是國大黨的領袖，他無時無刻不在伺機插足政府。

特拉凡哥爾的泰米爾納德國大黨為分割特拉凡哥爾南部四個泰米爾稅區而煽起的暴動突然間爆發起來了，結果巴頓政府開槍射擊，因而有數人死亡。

與此同時，主張採取進步農業政策的農業兼財政部長普·斯·納塔拉扎·皮萊提出了一項農業議案，這個議案除其他措施外，其中有一項規定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此外，在人民社會黨黨員和共產黨人的壓力下，巴頓政府逐漸改變政策，轉而支持工人階級和工會的要求。這激怒了反

动的基督教种植园主——喀拉拉邦真正的政府操纵者。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宣告了人民社会党政府的末日。

帕南帕利的手法很高明，竟能使两位人民社会党議員背叛自己的政党而倒向国大党，并且又取得了那位唯一的指定議員的支持。意味深长的是，在巴頓的社会党执政的时候，該政府所采取的亲劳工的态度引起了国大党的叫囂，指控該政府不能維護“法律和秩序”，这和喀拉拉邦共产党执政时，由于政府采取了傾向劳工的政策，国大党便大肆叫囂，說什么“法治无存”，来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沒有两样。

这样，帕南帕利打算登上首席部长高位的设计正好和既得利益集团企图推翻人民社会党政府的决定相吻合。这再一次証明喀拉拉邦国大党是怎样充当特权剝削階級的奴仆的。另一件有意义的事实是，为了与所謂“法治无存”的状况作斗争，国大党竟又号召組織“服务”队。为时不久，这些“服务”队便出而破坏罢工运动，簡直与当代的克里斯托弗武装队<sup>①</sup>无異。在某些种植园的罢工中，某些人竟濫用殘酷和高压手段来破坏工人斗争，这些人在某些人的眼里是“服务”队派来的亲信，而在另一些人的眼里，則是国大党一位領袖——普·斯·怯里安——花钱雇用的爪牙。事实上，这种破坏罢工的活动已經达到了危險的地步，共产党工人坦加潘竟在某地被暗杀了。

在这种形势下，帕南帕利在获得两位人民社会党議員的支持后，便又在幕后与占有十二个議席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达成協議。几方面糾集起来，使帕南帕利在一一八个議席的議會中得到了六十票的支持。于是，

---

① 參見本书第六章。——譯者



因警察开枪一事而对巴頓早已怀恨在心的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便对巴頓提出了不信任投票的动議。共产党为了挽救人民社会党政府，曾与巴頓进行协商。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规定释放彭納普拉—瓦雅拉尔地方的犯人<sup>①</sup>，并提出有关禁止夺佃的法案。人民社会党政府一面下令释放犯人，一面却在第二点上縮手縮脚，因而協議又告破裂。

在这次不信任投票的动議中，国大党支持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而共产党則保持中立。纵使共产党支持巴頓，也挽救不了这个政府，因为有两名人民社会党議員背叛了本党而投向国大党。这样，巴頓·丹努·皮萊的政府在經過一个很短暫的时期以后便再度垮台，从而使他变成了一个更加意气沮丧的政客。最近在評論国大党的这种行徑时，“观察家”在1958年1月7日的“印度快报”上，曾这样写道：

“喀拉拉邦的群众是不会輕易忘怀这个为了选票甚至連惡魔也同样想加以利用的国大党的，他們記得它那种导致人民社会党政府失敗的自私自利的无情作法。不仅如此，国大党連控制自己的伙伴的力量都沒有，特拉凡哥尔的泰米尔納德国大党竟背叛了它，这招致了国大党政府的失敗。”

3月是决定喀拉拉邦的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政府命运的月份；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經過一年处心积虑的阴谋策划，终于宣誓就职，成为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首席部

<sup>①</sup> 这里所談到的犯人实际上是彭納普拉和瓦雅拉尔这两个沿海地区的英勇工人和农民，他們与特拉凡哥尔前土邦首相斯·普·腊馬斯万米·埃亚尔爵士的专制政权进行了斗争。

长。但是他在任只有一年，到 1956 年 3 月便垮台。

在帕南帕利执政期间，贪污舞弊和族阀主义的腐败情况已经司空见惯。政府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使得六位国大党议员公开叛离，其中有阿·尔·梅农博士、特·姆·维尔吉斯和克·姆·柯拉。他们退出了国大党，另组“革命国大党”。这样就使支持帕南帕利的议席由六十席减少到五十四席，因而他不得不辞职。现任南布迪里巴德内阁卫生部长阿·尔·梅农博士，由于一尘不染的廉洁，声望很高，最近他在奥甘姆地方的喀拉拉邦协会发表演说时曾说道：“在参加国大党三十二年之后又脱党，是由于国大党既不允许他出来为他所指控的国大党政府内某些要人的贪污勾当作证，而党本身又没有去清洗这种罪名。”（见 1958 年 1 月 12 日“印度快报”）

纵使这类事件已经宣扬出去，国大党政府的行径依然使舆论为之哗然。在喀拉拉邦，各方面都不愿意由总统来治理。抱了这个目的，人民社会党便和左翼党派统一战线达成了一项协议。他们获得了两位“革命国大党”议员的支持，在邦议会里享有五十九位议员的拥护，从而取得了显然只多一票的多数。但是，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左翼党派统一战线的一位革命社会党议员——纳拉扬纳·波梯——突告失踪。各方面都以为他遭到了劫持。事实上，某些人向邦长报告说，他被拘留在克里夫大厦里，于是便下令对该大厦进行了搜查，这时前任首席部长还没有从里面迁出去。但是，警察两手空空地回来，没有找到任何符合波梯像貌的人。而这位迫不及待的邦长并没有等事情弄清楚，便通知总统说，他没有办法建立内阁，因此不久以后，总统的治理便强加在喀拉拉邦身上了。

也許有人要問：在国大党統治的十个年头中，喀拉拉邦如果有任何进展的話，进展究竟表現在哪里呢？几乎沒有一件称得上成就的事情值得指出。有的只是有关貪污賄賂、为了金錢而濫发執照和許可証、大成問題的森林买卖合同和购买公共汽車等一大堆令人吃惊和作嘔的事例，这便是国大党在喀拉拉邦統治所留下的遺產。

因此，喀拉拉邦的計劃和发展問題以及迫切的行政改革和提高效率問題完全沒有受到重視，原是不足为奇的事。国大党的領袖們比較感兴趣的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修筑一条道路或一所学校，而对于整个邦的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可行計劃却不大关心。事实上，当共产党政府在1957年4月就职的时候，曾向計劃委员会抱怨說，喀拉拉邦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分配很不恰当，把重点放在非生产部門。这时有人对共产党政府說，“这个委员会的确不只一次地向喀拉拉邦的議員（他們当然是邦国大党人）指出，他們过分強調非生产性活动，而对生产則不够重視。”（埃·麦·斯·南布迪里巴德著：“喀拉拉邦：問題和可能”，第16頁）

喀拉拉邦政府的效率越来越低，相互間的傾軋抵消了这个政府的力量。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1958年1月4日发表了該报特派記者塔卡希·奥加发自特里凡得琅的一則电訊，他說：“一位天主教的大主教說道：‘国大党的領袖（除喀拉拉邦以外，在印度各邦都是多数党）在这里已經失去了人心，因为当他們执政的时候，他們貪污腐敗’”。奥加接着又报道說：“这里的一位中央政府官員說，在前几届政府的統治下，虐政累累，只要共产党履行政府的正常职责，那也是胜过以前历届政府的一种改进。”

## 二 “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縫”

在高哈提，国大党主席德巴勇敢地把喀拉拉邦“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縫”出現的責任挑在自己的肩上，大有湿婆神<sup>①</sup>一口喝下烈性毒药的气概。喀拉拉邦国大党已經成了一种阿达拉姆党员<sup>②</sup>的淵藪，社会生活中所有的反动分子都紛紛来归，情况之严重比任何其他地方更甚。这个組織充斥了机会主义者、野心家、昔日忠心耿耿于旧統治而現在搖身变为爱国者的人物以及当权后只热衷于中飽私囊、施惠亲朋而毫不为国家着想的角色。国大党的机构是为了一小撮上层分子擴張势力而存在的，其余的人都是默默无言的旁观者和积极的附和者，后一种人无时无刻不在伺机钻进上层集团，而这个集团的内部却又不断地在勾心斗角，尔虞我詐。每当一位党魁被推翻，新的霸主便又毫无例外地得到新德里的承认。在任何情况下，效忠的对象都不是人民，而是新德里。于是野心勃勃的事业家便卷进了这个以百万豪富的种植园主为靠山的国大党。

問題还有另外一面：喀拉拉邦的国大党（也許馬拉巴那一部分除外），簡直就无法开口說自己承继了为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傳統，它与那些过去直接处于英国統治下的印度

① 是印度湿婆教所奉的神，又名破坏神。——譯者

② 1860年，当英国議會提出扩大选举权的問題时，有一部分自由党議員脫离了本党而加入保守党，这部分議員便称为阿达拉姆（Adullamite）党员，意指叛离本党、趋炎附势的投机之徒。——譯者

省邦的情况不同。当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老百姓终于随着千百万印度人的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高潮，而大踏步前进的时候，那些后来加入共产党而且组织了今天的领导机构的人们，就是当时的主要鼓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和巴顿·丹努·皮莱、斯·克萨万、特·姆·维尔吉斯等等一道前进，但是后面这些老战士现在已经被后起之秀替代了。

同时我们还要记住另一个因素：人们曾说，虽然世代不断更替，但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政治的面貌。喀拉拉邦的国大党人，正像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拿过去为自由作斗争的光荣当本钱，到处搜罗选票的，并把共产党在那些日子里所做的或没有做的当作笑柄。不过，事实证明，过去的光荣是没有用处的。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最近的所作所为，在马拉雅利族人民的心目中并没有留下疑窦，他们清楚，如果这两党再度当政，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们无法忘怀，甚至在1948年，当国大党在议会里拥有全部议席的时候，该党所组成的政府也只不过六个月就垮台了。

因此，在1956—57年的大选中，国大党一开始便遇到声势日落这个主要的不利条件。他们疯狂地争夺选票，因为他们确信，正像安得拉邦共产党在1954年的选举中，在议席上实力已经削弱一样，喀拉拉邦共产党在选举中也会遭到失败。“国大党的前途毕竟还是很难逆料的。”接着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类事件，于是他们抓住这件事，把共产党描绘成嗜血的凶手。他们又断定，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虽不是在全世界、至少在喀拉拉邦，已肯定把共产主义吹出九霄云外。有了这一切因素，国大党人便觉得有了挽回颓势的希望。争夺选票的行径在国大党内竟蜕变成恶劣无

比、聞所未聞的混亂和派系活動。

為了應付這種局面，國大黨指派了那位大家公認是黨內最出色的競選主持人——斯魯德·克·帕梯爾——前來喀拉拉邦，組織這次競選運動。他在安得拉邦曾經耍過一套花槍，因此喀拉拉邦國大黨人便深信，他在喀拉拉邦一定能再顯身手。國大黨最高當局選派帕梯爾出任喀拉拉邦競選主持人一事實際上更加劇了爭奪選票的活動。不過，帕梯爾很快就体会到，他所面臨的是一種極其棘手的局面。於是他想出了一條計策：建立一條國大黨和穆斯林聯盟、喀拉拉邦人民黨（包括會造成帕南帕利政府垮台的“革命國大黨”在內）的統一戰綫，如果可能的話，還把人民社會黨拉進去。

國大黨力圖與非共產主義政黨（甚至連穆斯林聯盟也包括在內了！）建立統一戰綫，這不啻是對國大黨實力下了一個悲哀的注釋。尼赫魯總理過去有一次會對共產黨和其他左翼政黨建立統一戰綫的努力大肆嘲笑，他說：“三個癩子聯合起來，並不等於一條壯漢。”當時他決沒有想到，竟有這麼一天國大黨最出色的競選人居然也力謀建立這種癩子聯盟！

由於人民社會黨以往曾在班加羅爾作出了不得與其他政黨結成同盟的決議，<sup>中</sup>同時由於人民社會黨領袖巴頓·丹努·皮萊和喀拉拉邦國大黨領袖之間仇恨很深，因此，帕梯爾游說人民社會黨的努力終告失敗，於是集中全力，向穆斯林聯盟下工夫。帕梯爾的建議遭到國大黨一般黨員特別是遭到國大黨穆斯林的強烈反對。

儘管如此，據稱帕梯爾還是和穆斯林聯盟取得了某種諒解，可是，在印度年會上，當這件事全盤擺在最高當局

的面前时，他們并没有支持这种作法。与喀拉拉邦人民党的联盟本身就是国大党无法调和的派系之争的产物，因此，这个联盟也遭到了冷遇。自此以后，国大党的宣传机构便在喀拉拉邦摆出了一派正经的姿态，说什么它不准备缔结任何联盟。不过，喀拉拉邦的人民非常清楚，这不过是吃“酸葡萄”的一个例证罢了。

下述事实说明了喀拉拉邦国大党处理竞选的悲剧性的情况：直到1月27日，也就是说直到提名候选人的最后四十八小时，这个组织还没有决定十多个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他们仍在进行疯狂的努力，企图为那些国大党不一定能获胜的选区“发掘”适当的候选人。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大党居然声称它是能够为新建成的喀拉拉邦提供稳定的政府的唯一机构；这种说法只有引起公众的讥讽和嘲笑。

国大党竞选运动刚开始，党内的工作人员便又发生了另一种类型的争吵。有传说，国大党议会委员会曾拨给喀拉拉邦大宗款项，分发给各候选人和各选区应用。随着这些谣言而起的是一片控诉、反控诉和互相责难的声音，他们说竞选费用曾被这个或那个国大党人吞没。

限于篇幅，我们不能描述国大党在选举中所采取的宣传方式。国大党最高领导曾指示国大党人必须采取高尚的宣传方法，而不要落到卑鄙下流的地步。但是人们看出，事实正适得其反。

国大党主席德巴曾来喀拉拉邦进行竞选活动。在他所到的地方当中，他竟在阿力培这个共产党治理的据点中，大发雷霆：“在莫斯科的图书馆中，就没有一本书谈到如何管理印度省邦政府。”他企图用这样一番话来故意奚落共产党人，政治不是儿戏，如果共产党竟能管理一两个市政机构，

那末就沒有理由不可以由他們來接管邦政府。在另一個由共產黨支持的無黨派人士的選區中，這位國大黨主席在宣傳中竟淪落到相當卑鄙的地步。他把這些無黨派人士比作向不同黨派賣弄風騷的妓女，並且警告大家說這些“無黨派人士”是國家的最大危險。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幾天以後，前國大黨喀拉拉邦首席部長帕南帕利·戈溫達·梅農竟在卡撒爾哥德，施展口才，支持在洛克薩巴選區與阿·克·高普蘭競選的無黨派人士沈諾伊博士。

關於國大黨在喀拉拉邦的競選運動，還有一點值得提起，那就是天主教教士和基督教的種植園主給予國大黨的支持。天主教的主教們事先就曾發出教書，勸告忠實的教徒不投那些不信神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票。後來，當他們看到共產黨對壟斷政權的國大黨展開嚴肅的挑戰的時候，他們的勸告就變本加厲了。教會方面的指示現在變了，它勸告那些忠實的信徒只投國大黨的票。像馬拉雅利文的“曼諾羅摩報”這種既得利益集團的喉舌在為國大黨進行宣傳時，也同樣是有作用的，這家報紙專門對喀拉拉邦選民大談特談：萬一選民把共產黨選出來執政，這可能給喀拉拉邦帶來多大的損害。這個種植園主的喉舌除了談這種事情之外，還孜孜不倦地宣傳說，“計劃委員會正在考慮”在喀拉拉邦開辦六個大型工業的決議，而這項決議的實施主要取決於國大黨在該邦的前途。

針對國大黨的無能、混亂和舉棋不定，喀拉拉邦共產黨的競選機構提出了與上述情況成鮮明對比的奮鬥目標。與國大黨不同，共產黨無法調動大批資金和其他財力。這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因為資本家決不會像他們對國大黨那樣對共產黨慷慨解囊。針對國大黨那種既不理智而又陳腐



的論点，共产党人从一个不同的水平出发，来与邦里的文化和知識程度都很高的选民接近。共产党邦委员会的一个研究小组用了好几个月的時間拟定了一份建設新喀拉拉邦的經濟計劃。共产党邦委员会的当时書記（現任財政部長）斯·阿朱达·梅农写了一本小册子，把有关經濟計劃的研究結果发表出来。这本小册子估价了喀拉拉邦的天然和人力資源，分析了人民的經濟困难，同时也提出了可以在印度宪法范圍內付諸实现的具体而又切实可行的建議。邦共产党的宣言也提到了这几點；这份宣言是作为印度共产党竞选宣言的补充文件而发表的。国大党的宣傳人員多半依靠他們的嗓門大，簡直沒有談出任何称得上是与喀拉拉邦那些具体而又迫切的經濟問題有关系的東西，而共产党的宣傳則直接涉及馬拉雅利族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碰到的經濟問題。

国大党和共产党宣傳在质量上的这种区别对选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大党的黨員由于根本不了解国大党的經濟綱領，所以只能重复一些不着边际的一般原則，而且后来竟蜕化成为露骨的誣蔑和謾罵。在必要的时候，他們还毫不犹疑地挑撥种姓情緒，例如国大党反对“天主教的”蒙达塞利教授（現任教育部长），而支持一位反对他的伊茲哈瓦的候选人的宣傳，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共产党的队伍忍受了所有这些挑衅和誣蔑，并且耐心地向选民解釋各个政党的政策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实际意义。

喀拉拉邦共产党在处理竞选事务上具有一个令人贊叹不已的特色，他們在选拔候选人时显示了从容不迫的步調。事实上再也沒有另外一件事比国大党和共产党选拔候选人更能尖銳地說明这两党之間的截然不同的基本区别。国大

党的最大弱点证明是共产党的最大优点。共产党内没有争夺选票的现象，没有为此目的而造成的派系和集团活动。恰恰相反，这里的情况是，同志们诚恳地急于想退让，让位给最适当的人。国大党不挑选工作中有成绩的人，而挑选为地方党领导或上级首脑所宠爱的人；与这种选拔方式不同，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是根据下级委员会的推荐来选拔候选人的。早在提名候选人的日期以前，他们就完成了这项重要工作，而且全党像一个人一样投入了竞选运动。

因此，在两个影响竞选的最重要问题上，也就是在宣传和纪律上，都证明共产党比国大党优越。另外，他们还敏锐地从他们的同志于1952年在安得拉邦所犯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当时安得拉邦共产党人为了争取几乎全部的议席而分散了自己的精力，这次喀拉拉邦的共产党则限制自己只争取一百个议席。再者，在国大党所吸收的“新血液”中，只有少数人参加过全国性的斗争，而共产党向选民提出的候选人却是一群在多少次斗争中久经考验的老战士，即使是他们的敌手也得承认他们是一些廉洁无疵、忠诚老实而勇于牺牲的人。在共产党的候选人中，我们不妨举几人为例：埃·麦·斯·南布迪里巴德、阿·克·高普兰、斯·阿朱达·梅农、克·普·尔·柯普兰、克·斯·乔治、特·斯·纳拉扬纳、纳姆比阿、特·弗·托马斯以及尔·苏加坦。

在最后决定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前，共产党曾竭尽全力与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达成建立某种统一战线的协议，并且对它们作了重大的让步，如果根据这两党的政治影响和群众影响来说，这种让步原是太过份了。与此同时，共产党还试图与阿·尔·梅农博士——今天的邦卫生部长——这类正直无私而经事实证明的无党派民主人士达成协议。

我們沒有必要在这里詳細贅述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在談判中所特具的那种拐弯抹角的談話和爭奪地位的手法。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明确地发出了更換政府的号召，而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以期在上述口号的基础上，来实现某种左翼团结。但是，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竟誤会了共产党的立場，认为共产党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和自己达成協議，并认为自己在討价还价上处于有利的地位。当共产党看到这两党的要求已經超过了合理的限度时，談判終告破裂。

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沒有能和共产党达成協議，証明对它們是极其不幸的。革命社会党在所竞选的二十八個議席中，連一席也沒有得到。人民社会党过去在特拉凡哥尔—柯欽邦議會中占有十九席，而在喀拉拉邦議會中，实力已降低到九席，即使在这九席中，还有两位——斯·詹拿达南和約瑟夫·查茲济卡德——仅仅是由于得到共产党的支持才当选的。“政治家报”（新德里，1957年3月20日）的一位特派記者从特里凡得琅报道說：“經過这一段时间以后，再来分析选举的結果，誰也无法駁斥共产党在选举前所发表的議論；在前一次——即1954年——的大选中，为了爭取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来組織反国大党的統一战綫，他們曾毫无必要地牺牲了一些席位。但是，要証明革命社会党在喀拉拉邦的政治中大勢已去，要証明当共产党要求在选举前建立联盟时，人民社会党所提的議席要求是不合理的，却需要在选票上进行一番苦战。”

至于国大党，那怕是党员中最悲觀的人也沒有預料到它所遭到的慘敗，在特拉凡哥尔—柯欽邦議會中，国大党曾占有四十五个席位，但是这一次纵使把那个給邦議會带来四十九位議員的馬拉巴地方包括在內，国大党也不可能获

得这样多的席位了。正如“政治家报”的记者所指出的：“即使在国大党的‘堡垒特里朱尔地区’，国大党也分崩离析，国大党最后一位首席部长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在他本选区的失败对国大党的威信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的确，这项著名而惊人的失败消息，使喀拉拉邦各界人民，包括一些国大党人在内，无不称快，近年来还很少有几件这样令人高兴的事。对于喀拉拉邦的人民来说，帕南帕利正象征着国大党的贪污腐败和族阀主义。

喀拉拉邦亲国大党的主要日报“祖国报”在3月21日发表了一篇有关选举的专论，谴责该邦的国大党领袖是寄生在一棵根基一度很稳固的大树上的寄生虫。同时还指出了共产党之所以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该报说道：

“喀拉拉邦的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土地上已经根深蒂固，而且经常受到该党活动家的照顾和注意。在每一个偏僻的村庄中都有共产党的活动家，他和受践踏最惨的人民保持最密切的关系，并且和这部分人打成一片。我们可以说这位活动家并不一定是著名的人物，他可能象一位流浪汉到处飘流。可是，在他的村子里，他每天都和所有的人接触，并且把党的话传达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他有一个使他不断受到鼓舞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自我牺牲，献出自己的力量。美妙的明天也许是一种幻想，但是对他来说，这却是不折不扣的现实。而且他在共产党中找到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共产党就是他的身体和灵魂。”

喀拉拉邦共产党在评价这次伟大的胜利的时候，也显示了他们所具有的现实主义的特性。从一开始起，他们就认识到，除了自己的可靠的实力以外，他们的胜利大部分是由于喀拉拉邦有头脑的选民愿意给他们一次机会，因为选民

已經发现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是不足以信任的。姆·納·戈文丹·奈尔在斯·阿朱达·梅农就任共产党內閣的財政部長以后，便继梅农出任共产党邦委員會的書記，他說：“人民对于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政府以及總統直接統治的滋味是尝过的；他們对于作为斗争的領袖和地方行政机构領導者的共产党人的作法也是有過經驗的。許多选民有这样的趋向，虽然他們并不一定亲共产党，但是他們认为不妨让共产党試一試。”（見1957年4月号“新世紀”月刊奈尔所写的“喀拉拉邦的挑战”一文）

与前一次大选相比，共产党所获得的选票从17.5%增至36.5%，而国大党的百分比却从42.3%降到38.2%，人民社会党也从20.3%降到10.8%。共产党的百分比还不包括共产党所支持的无党派人士所获得的选票。在喀拉拉邦議會会里的六十五位共产党或共产党支持的无党派人士当中，有三十三位是取得自己选区的投票总数50%或更多的选票而当选的。邦內其他政党的相应数字是：国大党二十三席，人民社会党三席，穆斯林联盟三席。

3月30日，共产党議員在埃納庫兰姆举行會議，选举他們的領袖；埃·麦·斯·南布迪里巴德获得全体一致的拥护而当选。在埃納庫兰姆，这一天成了一个节日。巨大的人群从附近各地区涌进这个城市。人民的热情是空前未有的。他們一面欢呼、唱歌和跳舞，一面繞市游行。一列长达三哩的游行队伍从城的一端移向另一端。行列的后面是广大的人群。人群中，只見紅旗、彩飾和旗帜飞舞，其余什么也看不见。鑼鼓声、口号声和爆竹声响成一片，其余什么也听不见。在游行結束以后，群众繼續載歌載舞、敲鑼打鼓、鳴放爆竹，直至深夜始散。

喀拉拉邦的人民正在庆祝他们的胜利，因为“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缝”同时也正是喀拉拉邦平民的胜利。在整个这片古老的印度土地上，这很可能是平民胜利的先声。的确，历史将来也许会这样记载：喀拉拉邦这条“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缝”必不可免地是印度人民得到最后胜利和命运的先决条件。

### 三 喀拉拉邦共产党內閣就職

首席部長埃·麥·斯·南布迪里巴德的十一人內閣在1957年4月5日宣誓就職<sup>①</sup>。在舉行宣誓典禮以前，各部長驅車至特里凡得琅以北將近一百哩的彭納普拉地方，在那里舉行簡單儀式，向喀拉拉邦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奠基人和領袖普·克里斯納·皮萊的臨時紀念碑獻花圈。紀念碑建築在皮萊被蛇咬死后舉行火葬的地方。沿途站着一群一群的農民和漁民，他們對南布迪里巴德和其他部長歡呼、喊口號、放爆竹，同時揮舞着無數的紅旗和其他旗幟。

共產黨在喀拉拉邦的勝利是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它的回聲響遍了全世界。“紐約時報”報道說：“印度共產黨不象國大黨政客們所預料的那樣，它拒絕躺下和死去。”英國工黨左派的“論壇”周刊指出：“喀拉拉邦标志着共產黨第一次通過民主方法取得政權。”“論壇”周刊又說：“國大黨的中央政府不能採取一種不合作和企圖阻撓共產黨的態度……相反，如果允許共產黨遵循完全合乎憲法的途徑，並通過與國大黨的合作，而為人民作好事，那末，共產黨人和崇拜暴力革命的膚淺人士的那種幼稚傾向就可以得到糾正。”

甚至連倫敦的“經濟學家”周刊也要求新德里和特里凡得琅進行合作。“經濟學家”說道：“……喀拉拉邦的共產黨

<sup>①</sup> 1959年7月31日，印度聯邦總統根據以尼赫魯為首的內閣的報告，解散了印共領導的喀拉拉邦政府和該邦立法議會。——譯者

人必然会表现得极其良好……。他们知道全印度都在注视着他们……。他们很可能选择像土地改革这类有实际内容的措施来建立声誉，避免和新德里发生冲突。……”

“新闻纪事报”（英国）评述道：“……它（共产党）简直是以一种煞费苦心的审慎态度来迎接这个新的局面——在同意的基础上进行革命……。共产党人声称，即使是局限在宪法的范围内，他们也还有几条锦囊妙计。但是，他们的初步目标并不是什么秘密；他们准备让自己的纪律和组织发挥作用，以一种出奇的纯洁性在这个邦里首创一个唯一的前所未见的稳定政府，从而使邦政府能够在—一个贪污腐败显然已司空见惯的地区里做到既有效率而又廉洁。”

以上是国外的评论，印度国内报纸的反映也提供了大量证据，说明印度的民主非常健全。主要的几家印度日报，虽然当时对共产党是否能遵照宪法办事还没有信心，但大体上都认为选民的决定必须尊重；在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和在中央的国大党政府都必须彼此检点，而且要学习共处之道。这种论调是由“政治家报”驻特里凡得琅的特派记者提出来的：“由不同政党执政的中央和邦政府的共处是印度的新尝试，但是为了议会民主制，这是很值得一试的。双方方面都需要克制、容忍和谅解。”

“印度教徒报”说：“共产党的领袖们最近一直在强调他们愿意在宪法的范围内从事工作……。既然选民把他们选出，成为邦议会中的最大的独立政党，同时在五位无党派人士的支持下，又控制了议会的多数席位，那末，就必须按照他们所发表的宣言的表面价值把它接受下来，给他们组织政府的机会。”

“印度时报”的政治专栏作家要求“新德里方面要有高



度的机智和外交手腕，同时还要有坚定的态度”，他說道：“如果共产党确实能給喀拉拉邦建立一个真正有效率而又廉洁的政府，那末他們就理应得到人民的真正爱戴。至于他們在實踐中是否尊重民主的原則，也将受到人民的考驗。”

“自由新聞”說：“喀拉拉邦共产党的胜利在首都所引起的最好的反映是，我們的民主不是虛假的；它是不折不扣的純真的制度，它忠实地反映了人民的意志。”这家报纸接着又說：“对于印度共产党來說，喀拉拉邦不但給他們提供了一次机会，而且也向他們提出了一次冷酷的考驗。”

代表印度境內英国大企业的加尔各答的“資本”周刊，虽然害怕喀拉拉邦共产党的胜利会把外国投資者吓跑，但是它也說“大約从去年以来，共产党已經改变了，特别是在印度。我們現在倒有机会看看它究竟改变了多少。”

在这片健全的民主大合唱声中，只有那位臭名昭著的反动和反尼赫魯的英薩夫(Insaf, 笔名。——譯者)彈出了不同的調子，他是比尔拉系統亲国大党的“印度斯坦时报”的專欄作家。他提出謬論說，中央的利益在共产党邦政府的手里是不牢靠的，因此他号召建立一支联邦警察来“保障联邦利益”，并且“要經常向中央提供情报”——換句話說，这就是監視邦的事务。他的話事实上就是要求中央“重新調整与邦政府当局的关系”，他甚至要求中央政府对机密文件进行“分类”。

喀拉拉邦共产党的胜利使印度的資本家惶恐万状，不可終日；这一点施里曼·納拉揚曾恬不知耻地表示了出來。納拉揚是由馬华里的企业家和金融家所組成的国大党巴札集团豢养起來的，后来他也加入了这个集团，而且竟設法爬

上了国大党总书记的高位，虽然他并没有称得上是为国效劳的履历。他指控共产党政府对“法纪荡然”的现象放任不管，又说共产党企图用他所谓的极权主义的手法来推翻宪法，而这时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就职还不满三天；因此，甚至连他的最亲近的朋友和顾问都对他这番话感到惊讶不置。3月8日，他在埃纳库兰姆举行的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员会的会议上说道：“令人震惊的是，新政府的头几项措施之一便是，减轻那些证据确凿并判处死刑的凶手的处刑以及释放那些并不单纯是拘留、而是由于纵火、施用暴力和进行暗杀等严重罪行而遭到控诉和惩罚的所谓政治犯。”

施里曼·纳拉扬倒健忘了释放彭纳普拉—瓦雅拉尔罪犯的命令以前原是由巴顿·丹努·皮莱的政府发布的。阿·克·高普兰在一次声明中曾指出，彭纳普拉—瓦雅拉尔是那些英雄们用胸膛来抵挡斯·普·腊马斯万米·埃亚尔爵士的冲锋枪的地方，而且每一个马拉雅利人对这些殉难者都感到自豪，就像每一个印度人对巴加特·辛格<sup>①</sup>感到自豪一样。而这时，纳拉扬对马拉雅利人竟进一步加以侮辱，把彭纳普拉—瓦雅拉尔的英雄们比作一般罪犯和凶手。

问题是：共产党政府在这三天里究竟作出了什么事情，以致要这样加以攻击和诽谤呢？这里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在南布迪里巴德内阁宣誓就职前后，邦里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为了使自已相信共产党能够掌握议会的多数，邦长决定分别召见五位无党派人士，以便确定他们是否支持共产

<sup>①</sup> 巴加特·辛格(Bhagat Singh)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从事反英活动，1929年4月因在印度中央议会大厅投掷炸弹被捕，翌年10月被英国殖民当局判处死刑，1931年3月就义。——译者

党。其实这五位无党派人士这时已经公开作过这样的声明，已经参加了議員选举南布迪里巴德作为領袖的會議；而且也已经通知过邦长，他們是共产党議會党团的成員。共产党邦委员会的書記处在—項決議中，明确指出邦长的这种行为是“对共产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領袖的一种侮辱”并且“对这种不民主的行为提出抗議”。

在共产党人就职以前，邦长的另一行动也显示了他的惊惶失措的情緒。邦长事先既沒有和喀拉拉邦英印混血种人的各个代表团体进行商議，也沒有征求被邀組閣的政党領袖的意見，便委派了一个他所喜爱的人参加議會。共产党邦委员会書記处的決議认为，这种匆忙的行动是唐突的。決議說：“在过去，邦长的这种委派是用来加强国大党的势力的，他的借口是国大党正在执政。而現在竟干脆拒絕征求行将执政的政党的意見。”

第三个不当的匆忙行动便是：在共产党政府执政的前夕，邦长竟下令增加邦政府高級官員的薪俸。共产党邦委员会書記处指出邦长的这种行动是“对某些有利害关系的人让步，以使用既成事实来和共产党政府为难”。

書記处的決議最后說：“党的書記处之所以指出这些事实，是由于想保持民主的慣例。在喀拉拉邦，共产党已经当政，这种发展今后还可能在其他各邦出現。在邦和中央由不同的政党执政的新形势下，为了維持中央和各邦的健康关系，民主的慣例必須严格遵守。”

我們必須再一次頌揚印度民主的基本力量，因为正当印度民主輿論的健康声音盖过了施里曼·納拉揚的調調的时候，中央政府的一位发言人也发表权威性声明說：“喀拉拉邦的共产党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到歧視”。这项声

明打击了这些不健康的事例。当然，这些事例是在新德里某些方面的唆使下才出现的。

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在就职时便发表了一篇有关政府政策的声明。他强调群众合作的重要性，保证立刻采取行动制止夺佃行为，并且进行土地改革，确保工业中的和平秩序，保证采取步骤使马拉雅利语成为邦语，并发展地方自治政府等等。特别重要的是，他肯定部长在从事工作中会遇到一重巨大障碍。他说：“如果产生这样一种看法，以为部长们的亲戚、朋友和公共工作中的同事能够给他们以很大的压力，那么要建立一个健全和廉洁的行政机构就会碰到巨大的障碍。我们每一个人都将极力避免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

不久以后，邦政府便减轻了被判死刑者的判决，释放了政治犯，并且撤销了政治案件中的传票，这些措施标志着总统统治的结束和新政府的开始。

共产党政府还扣下了前届政府在上任前夕所通过的增加高级官员薪俸的命令。这项命令把高级官员的薪俸从一千一百卢比增加到一千六百卢比，从而使邦的财政部增加了二百万卢比的财政负担。

除上述情况外，在过了三天以后，当部长们刚在办公室里安顿下来的时候——事实上工人们还在忙着为他们布置秘书室，国大党总书记便呼神唤鬼，兴风作浪，说什么“极权主义”侵袭喀拉拉邦，玩忽法律和秩序。对头脑清醒的人来说，这种武断说法的荒谬和虚假是清清楚楚的。

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不但得到了本邦而且得到整个印度的祝贺。这一事实从4月5日——南布迪里巴德政府宣誓就职的一天——印度各地举行的游行和集会中得到了证

明。这一天，喀拉拉邦的群众也举行了庆祝会。喀拉拉邦的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都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和群众集会，保证全力支持政府实施那些受群众欢迎的政策。当天晚上，民主万岁和喀拉拉邦政府万岁的呼声响彻喀拉拉邦的天空。

## 四 教育政策和成就

施里曼·納拉揚对喀拉拉邦政府的咆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它基本上是印度国内反动派为了打击和推翻共产党政府而发出的头一炮。它反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惶恐不安的心情，而这批人已经开始摆开攻击和推翻共产党政府的阵势。这位国大党总书记只不过是帮助加强和配合他们的活动罢了。为时不久，反动势力便开始露面了，并且在喀拉拉邦教育法案上首显身手。下面我们来谈一谈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1957年5月，喀拉拉邦的新议会为选举联邦总统和确定部长薪俸事宜举行了会议。共产党部长每月只拿三百五十卢比的薪俸，部长的其他津贴也被削减。与此同时，部长出巡时的警卫和其他仪式也大大地减免了。邦政府要求中央允许他们不在自己的汽车上悬挂国旗，这不但得到批准，而且变成了中央和其他邦政府仿效的榜样。

6月，邦议会为了通过预算——全印度在1957—58年度唯一有结余的预算——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携起手来，一致对政府展开攻击。反对党发表了两种相互矛盾的说法。一方面，他们抨击共产党的措施和活动缺乏新颖和革命性的东西，只不过是继续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政府过去做过的事情而已。另一方面，他们又指责共产党玩弄老谋深算、穷凶极恶的手腕，企图利用他们的政权来推翻邦和政府的民主制度，置法制于不顾，在邦内建

立“极权”制。其中最可笑的是，許多提出这种指責的人竟在同一篇发言中出現了这种“双重想法”！繼續人民社会党和国大党政府的政策和实行“极权主义”、推翻宪法这两件事究竟怎样才能齐头并进，对任何人來說也是一个謎！

7、8月間，邦議會为了制定大学法案和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再次举行會議。5月間，喀拉拉邦政府宣布准备提出在教育界进行改革的建議；这件事在某些集团中，特别是在包括天主教教士在內的私立学校的管理当局中，引起了一片騷嚷。5月28日，天主教教士，在埃納庫兰姆举行集会，决定发动一次瘋狂而猛烈的运动来反对这个法案。

事实上，当施里曼·納拉揚指示埃納庫兰姆的邦国大党与“极权主义的”共产党政府展开斗争的时候，天主教反动派就已决定与共产党政府干到底。这并不是一次偶合，因为自此以后，反动天主教和喀拉拉邦国大党早經存在的联盟便大大加强了。已經成为天主教和种植园主反动势力的忠实奴僕的喀拉拉邦国大党，現在更进一步地受他們左右。

在喀拉拉邦大約有一万所学校，其中私立的至六、七千所。在这些私立学校中，又有二千二百所是由教会和教士控制的。这些年来，他們一直把这些学校当作自己营利的商业企业来經營。他們的势力如此强大，甚至連那位声势赫赫的腊馬斯万米·埃亚尔爵士也奈何他們不得，尽管他很想整頓他們一下。可怜的教師們的苦难以及学校里倒行逆施的情况虽然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在国大党統治的十年中，並沒有碰这批私立学校一下，因为每一次提出这种动議，国大党內的天主教集团便有效地从中阻撓。于是，学校管理当局便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作是法律所不能約束

的。他們終于相信他們可以任意處理作為學費和政府補助金而收到的公共資金。應該注意的是，政府撥給特拉凡哥爾—柯欽地區（從教育程度上來說，比馬拉巴先進）的學校補助金從很小的比例數穩步增加到每盧比十四安之多，最後又增加到每盧比十六安之多。因此，當私立學校當局，特別是那些對待教師惡劣无比的天主教會派，發現他們的傳統既得利益受到嚴重挑戰的時候，他們就怒不可遏。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政府教育方案的本身，而是反對政府保證私立學校教員職位穩定的決定，正象埃納庫蘭姆的主教會議所說的，“為了有效地管理學校，學校管理當局在學校事務上必須有全權。”不久以後，叫囂又響了起來，說什麼憲法所保證的少數民族的權利受到侵犯。

在作進一步的闡述以前，有必要簡單地敘述一下喀拉拉邦教育制度中的弊端，這正是該邦教育法案鬥爭的對象。正如主要的親國大黨日報馬拉雅利文的“祖國報”所說的，學校主管人把他們所管理的學校看作是營利的商業機構。學校任用人員竟變成了一種可以拍賣的交易，得到教員職位的人也就是出價最高的人。喀拉拉邦的公正輿論也一致認為這是弊端。學校主管人把壓榨申請就職的人看作是自己的權利。在喀拉拉邦，平均每人每月的收入只有十五盧比，而一個不發畢業證書的中等學校畢業和受過教師訓練的青年人一開始的薪金就是四十盧比，這個數目當然是吸引人的。喀拉拉邦知識分子失業的情況既然那樣嚴重，因而爭奪教員職位、拍賣教員職位以及主管人對申請人和受雇者進行壓榨等等行為便成爲一種自然的事情了。

在任用教師的問題上，各式各樣的不公正的事情都干了出來，——忽視先來的申請者，而把優先權給予那些沒有



适当資格而背后有人代为拉綫或者能够滿足主管人金錢要求的人。教師簡直就沒有众所公认的工作条件，而且他們的工作既沒有保障，也沒有福利基金等。一个教師可以在最站不住脚的借口下，不經預先通知便被辞退。用当初雇用本来就是临时性质或別人已被提升这种借口突然將教師辞退的事件已經多到数不胜数。在这种情况下，难怪教師們总是想討好管理当局而唯恐不及。他們向主管人阿諛諂媚、叩头作揖，而主管人竟把他們当作家庭供使喚的僕役；但重視教師的福利和尊重他們的地位本应是任何文明社会的基础。

上述情况并不是所有私立学校都如此。而私人和天主教会的学校管理当局，在早期建立学校网和維持高度教育水平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能抹煞的。但是，这些弊病現已确实流傳很广，而且几乎成了風尚。事实上，学校是用政府所撥給的补助金来支付教師薪金的，然而政府在教師的任用或工作条件上竟沒有发言权。

應該注意的是，邦的全部預算的三分之一是为了办教育而准备的；教育界計有十万人以上。教育部門直接管理許多学校，教育部門的官員和工作者遍布喀拉拉邦各地。在国大党統治的十年間，这个每年要用九千万卢比的主要部門竟被放任自流，蜕化成混亂的机构。多少年来，教師的疾苦始終沒有得到解救，甚至連政府偶尔通过的法令也只是表面文章，因为，从任何方面來說，学校当局都不是非接受这些法令不可的。教育当局並沒有推行自己的決議的法律根据。

因此，喀拉拉邦教師的痛苦是无边的。他們的命运就是貧困。教師在执教中死去，留下嗷嗷待哺的子女，这已是

司空見慣的事。的確，在他們的印度兄弟中，他們是最不幸的一伙。邦教育部長約瑟夫·蒙達塞利曾宣稱：“政府打算結束本邦教師直到目前還遭受污辱的情況。教育法案將結束校方把他們當作奴僕看待的可恥的局面。”蒙達塞利的話是非常正確的。

的確，我們認為尊稱約瑟夫·蒙達塞利是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的工程師，是名正言順的。他本人曾在特里朱爾的聖托馬斯學院擔任教員達二十七年之久。在這個學院中，約瑟夫·蒙達塞利曾親眼看到他的同事們的悲劇式的生活。他看到了和他一道執教二十五年之久的一些教授在工作中死去，留下人口眾多的家庭，甚至連安葬死者的錢都沒有。教化學和物理的幾位教授、教歷史的教師以及其他許多同事都遭到了這種不幸的下場。蒙達塞利從心裡反對教會的專制，也反對那位神父兼校長。在一本用馬拉雅利文寫成的叫做“教授”的文艺小說里，蒙達塞利表達了自己的沉痛的心情。這本小說的作用是驚人的，它喚醒了公眾的良心。在它出版後不久，聖托馬斯學院便為教職員設立了一項福利基金的制度。

從各方面來衡量，蒙達塞利都不愧為一位老前輩。當他在聖托馬斯學院教學的時候，南布迪里巴德曾在他所教的中級班里念書。在今天的邦議會里，就有十多位議員是他的學生，其中有的屬於共產黨，有的屬於反對黨，象財政部長斯·阿朱達·梅農就是一位。蒙達塞利參加邦的教師運動在二十五年以上。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印度任何其他邦都不能大言不慚地說他們的教育部長是更有經驗、更宜於擔任教育部長之職的人。

蒙達塞利除了有長期任教的經驗以外，還有擔任議員

为期十年的資望。当柯欽邦的議会在1948年成立的时候，他便是議員，随后又是合并后的特拉瓦哥尔—柯欽邦邦議会的議員。他是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的同窗，帕南帕利曾拉他做柯欽邦議會国大党候选人。不久以后，他发现自己与喀拉拉邦国大党議會党团的行徑格格不入，于是便辞去了議員的席位。1954年，他在共产党的支持下，作为无党派人士而当选。

因此，他的教育法案能够击中喀拉拉邦教育积弊的根源，得到教师們的最大的支持，同时也引起私立学校主管当局最深的敌視，本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天主教教会百般指責，囂張无比，因为教会所受的影响最重。所以，有人企图謀害蒙达塞利，也就不足为奇了。

归根結底，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究竟打算做些什么？如果不是由于这种叫囂，它也許不会鬧得滿城風雨、尽人皆知，因为这项法案只不过是想为喀拉拉邦普通教育提供較好的組織，使它具有一个合法的基础罢了。其他一些邦政府在采取类似措施的时候，并没有引起注意，象安得拉邦就是一个例子，甚至新德里也从来没有想到宜于把这类問題提交最高法院。事实上，差不多三年以前，国大党就曾在喀拉拉邦曼吉利举行的一次會議上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現在发起这项动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而不是国大党领导的政府。

在这里提一下故弗兰克林·德·罗斯福总统对这个問題的看法，也許是很有趣的。著名的新聞記者埃德加·史諾在1942年曾数度訪問罗斯福总统，他作出了这样的报道：在一次評述国际局势的过程中，印度成了談話中的主题，这表明罗斯福对我国的关怀。罗斯福說道：“我认为我

們不仅要帮助印度破除宗教迷信以及宗教迷信的落后影响，我們还必須把我們本国的最反动的宗教势力清除出去。不久将来，我們將取締教会对教育的一切控制。那已經是历史陈述。所有的学校都應該由俗界来管理。”（見紐約“每月評論”，1957年1月第9期）

事实上，喀拉拉邦教育法案除了打算更好地为普通教育做好組織安排外，其中並沒有任何一項阻碍少数民族、天主教或其他人的宗教和文化的規定，因为在教育的内容上，也就是說，在所教的科目等方面，這項法案并沒建議作任何变更。

为了更透彻地了解這項法案，有必要简单地叙述一下這項法案的草案。

這項法案計分三部分，共三十六条。法案規定受补助学校的教員直接从政府或从政府所屬的机构領取薪金。受政府补助学校的主管人必須將所收的學費等款項上繳政府。为了維持和管理学校，政府將撥給学校主管人以补助金，其數額將时时予以确定。政府也將向学校主管人提供补助金，以购买校舍或购买建筑校舍的地基，以及其他必需設備。

這項法案要求政府建立一个邦內教师登記名册。凡未登入名册者，不得在任何公立或私立学校任教。凡已在邦內各学校任教的人員，都作为已登入名册論。私立学校主管人只能根据教員登記名册聘用教师。

政府可以将公立学校教师目前所享受的福利金、养老金以及保險等制度推广到受补助学校的教师身上。学校主管人无需对此項制度提供任何款項。

如果受补助学校的教师由于政府在有关教学科目、教

学计划等事項上所发布的命令而被裁减时，政府有权要求任何学校主管人在教师出缺时任用这些被裁减的教师，学校主管人必須遵从此項命令。

如果任何受补助学校的負責人未能履行這項法案所授予的職責，如果政府认为接管学校的步驟符合公共的利益，政府得接管学校，但期限不得超过五年。但是，在政府采取此項措施前，得給学校主管人以合理的机会，以便申述他們反对政府所拟采取的措施的理由。在紧急情况下，政府甚至可以不預先通知学校主管人，便采取這項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得付給受影响的人員以租金，租金的多少由稅務員按当地通行的一般租价加以規定。

为了使普通教育标准化、为了提高文化水平、或为了把任何类别的教育置于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政府在认为必要时，有权采取步驟接管任何一类受补助的学校。在政府根据此項規定接管学校时，得按市价給予补偿。

這項法案也禁止受补助学校通过出售、抵押、租借等方式轉让学校的任何財產。

为了在有关教育政策和教育部門的行政管理方面对政府提供建議，政府得設立一个包括官方人員和非官方人員的邦教育諮詢委员会。

政府也可以設立地方教育管理机构，以便教育行政机构与人民取得联系，从而維系和鼓励地方对教育事务的关怀。

政府得訓令地方教育当局管理教育行政；而对学校的檢查、管理和监督工作則由邦教育部負責进行。所有这些措施在設立这种机构的地区內，均不得影响或損害教师的权利、特权、債務以及义务。

教育法案的第二部分确立了有关义务教育的规定。法案规定设立地方教育委员会，其任务是推行本法案有关入学和有关保证就业儿童不至因就业而影响在公立或私立学校就学的规定。

在实行义务教育的地区内，儿童的保护人有送儿童上学的义务；儿童一旦根据本法案的规定入学，就必须修完小学教育的全部课程或就学到十四岁为止，否则不得离校。

凡儿童保护人过于贫困而无力供给午餐或购买书籍和纸张文具者，政府得根据地方教育委员会的建议，免费供给儿童午餐和必要的书籍文具。

教育法案还进一步规定，政府根据本法案所制订的一切规章，应于拟定后立即提交邦议会，议会\*\*有权加以修改。

纵使以教育法案的原草案为依据，法案的各项条款也和安得拉邦一年以前所作的相类似。安得拉邦国大党内阁在1956年所制订的安得拉邦教育制度法案授权该邦政府接管受补助学校的管理机构，并且在付给“合理的补偿”以后，接收校舍、设备和家俱。

因此，事情很清楚，尽管喀拉拉邦内外在大吹大擂地宣传说，喀拉拉邦政府已经开始了教育“共产化”的事业，教育“共产化”的建议是一些异乎寻常或闻所未闻的东西；又说什么民主和宗教都受到了危害等等，都是丝毫没有根据的。不过，共产党政府却以一种值得赞美的姿态来适应反对党。喀拉拉邦的教育部长和司法部长前往德里，和中央政府的内政部长潘特和司法部长赛恩商讨有关教育法案的措施。事实上，为了适应反对党，喀拉拉邦政府并没有按照它的原有计划在1957年7月通过教育法案，而是根据所提出的建议对法案的原有规定作了一些修订。

喀拉拉邦政府在8月19日发表了一项声明，宣布了所拟定的修改内容。此外，一个由五位国大党人、两位人民社会党代表以及像穆斯林联盟这样的反对党团体所组成的有关本法案的邦议会特别委员会，曾在邦内作了巡回访问，听取公众对本法案的意见。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中有邦议会反对党的国大党领袖普·特·查科以及人民社会党领袖巴顿·丹努·波莱。

共产党政府这种委屈求全的精神受到了普遍的赞扬。勒克瑙的“国民先驱报”（1957年8月21日）说道：“政府迁就反对党的努力，应该能够鼓励所有关心教育机构的有效管理的人士对该法案的规定作冷静的考虑。”“政治家报”（1957年8月21日）评论说：“如果喀拉拉邦以前的历届政府为改进教育事业曾经作出任何踏踏实实的工作，那末，对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发出这种气势汹汹的谴责，倒还有比较说得过去的理由……。喀拉拉邦长期遭人忽视的教师们普遍支持这一法案，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这是第一个保证向他们提供某种保障的法案。……教师的保障和待遇由私人来管理，已不再是可靠的事了。印度大部分地区的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此外，“看来，国大党是在利用反对这一法案的骚动作为他们推翻喀拉拉邦现行政府运动的一部分。”

在反对教育法案的反动骚动中，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拉拢勾结活动，使邦内清醒而中立的舆论感到震惊。喀拉拉邦国大党执行委员会和邦国大党议会党团在7月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反对教育法案的决议。正当邦内天主教所领导的反动势力在8月间把反对教育法案的骚动煽惑到狂热的地步的时候，国大党的某些领袖也和穆斯林联盟、反共战线以及其他一些来路不明的团体一道，在同一

个讲台上向集会发表演说。甚至在8月26日，当天天主教的克里斯托弗武装队在特里凡得琅举行“袭击邦首府”的示威游行而沿途受到公民的嘲笑和怒骂的时候，普·特·查科也大模大样地和穆斯林联盟的领袖一起登上讲台，攻击这项普遍认为替喀拉拉邦那些长期被忽视的教师主持公道的措施。

8月24日，喀拉拉邦教育部长把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提交邦议会。特别委员会在教育法案中加了一条补充条款；这一条款规定喀拉拉邦的教育法案不得影响宪法第三十一条赋予少数民族的权利，或影响宪法第三百三十七条赋予英印混血种人的权利。特别委员会又补充了一项规定：教育法案的各项规定不适用于私立学校以及未经政府承认和补助的学校。这样，一个受政府补助的学校当局便得到了选择的余地，可以在法案生效以后，作为一个经政府承认而不用政府补助的学校来经营。

特别委员会又把教育法案有关受补助学校得采用委员会讨论的制度来聘任教师的整个条款删去。根据新增加的一项条款：公务委员会有权在每年5月31日以前，根据下一年可能有的缺额，按地区为公立和受补助的学校遴选教师候选人，学校主管人只能根据这种名单聘用教员。这样，在遴选教师时既能作到公允，同时在聘用教师时，也可以有效地防止主管人员的独断独行和买卖教师职位的弊端。

教育法案还有其他一些有利的规定，保证学校主管人在不违背教师的安定和有效地管理学校的原则下，可以自由行事。然而，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领袖们仍然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后面附加了他们反对这项报告的备忘录。8月27日，当法案根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在议会中提出的



时候，国大党领袖普·特·查科竟公然维护学校管理当局的利益，而提出修正案。事实上，人们很快就看出，喀拉拉邦的国大党人并没有从他们的选举失败中得到任何教训。他们继续为既得利益集团和天主教反动势力张目，这种作法如果说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人民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同时这也只有帮助共产党提高威信。

可是，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唯一的例外是受到本法案影响的既得利益集团。虽然“祖国报”是一家亲国大党的日报，可是它并没有支持反教育法案的运动。喀拉拉邦的著名文人和教育家都起而支持这个法案。甚至在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党员中，也有许多人公然反抗各该党领导的意旨，而为这个法案奔走活动。

为了反对反共战线 8 月 26 日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反教育法案的示威游行，支持这个法案的人们便于 8 月 28 日在首府举行了一次极其庄严而动人的示威游行。教师、工人、农民以及学生在特里凡得琅的街头大踏步前进，大批的妇女也参加了这支队伍。特里凡得琅市的学生也成百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

9 月 3 日，喀拉拉邦的民主力量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一天，邦议会通过了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士气沮丧的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竟不敢投反对票。执政的共产党的威信提高了；老百姓充满了信心，感到自豪。对喀拉拉邦教育界了如指掌的蒙达塞利，以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口才，终于把反对党所提出的连篇鬼话粉碎无遗。蒙达塞利同时宣称教育法案的制订意味着不仅在于喀拉拉邦，而且在全印度，将为教育史开闢新的一章。

事实上，自发地支持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的呼声响遍了

印度各地，他們並沒有受到共产党人的任何鼓动。就是这样，在8月26日，阿拉哈巴德中等学校教师联合会为了这一法案向喀拉拉邦致贺，同时指责所有反对这项法案的人“不仅仅是教师和教育事业的敌人，而且也是社会的敌人。”（见1957年8月27日“国民先驱报”）。9月2日，高级中学教师联合会的勒克瑙分会也为这一法案向喀拉拉邦政府致贺；并且要求北方邦政府制订同样的立法（见1957年9月3日“国民先驱报”）。印度的许多主要城市——纳格浦尔、波保尔、加尔各答以及巴特那——都纷纷举行集会，支持这个法案。

喀拉拉邦的教师为了向邦教育部长蒙达塞利表示他们的谢忱和敬意，在柯钦附近的帕录鲁蒂为他举行了一次群众接待会，参加这次集会的约有十万人，他们向这位部长热烈地欢呼鼓掌。蒙达塞利在演说中说道，教育法案并没有革命的成分。他说，其他邦的国大党领袖和部长们都很重视这项措施，而且有许多人还要求提供有关这项法案的更多资料和详细情况。他又说，喀拉拉邦国大党反对这项法案之所以使他感到惊讶，原因也就在这里。

教育法案在邦议会通过以后，便送交总统批准。在此期间，反动派加强了他们反对这项法案的骚动，备忘录和抗议书雪片般地向中央政府飞去。国大党最高的执行委员会的狂热反动分子完全抹煞了这项法案的真正进步的和非宗教性的目的，拖延了这项法案后来的批准手续，并且把整个事件当作有效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进行毁谤。在联邦议会里，当有人提出有关总统同意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的问题时，所得到的只是含混其词的回答。与此同时，喀拉拉邦的教师们对于批准法案的拖延感到无法容忍，于是

便組織了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促使教育法案的迅速批准。到了12月底，总统终于根据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将这项法案提交最高法院。

这样，喀拉拉邦的教育法案便成了留名史册的大事，因为总统把这类事件提交最高法院，这还是第一次。总统这种作法立刻引起了某种反应。1958年1月2日，总理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时说，喀拉拉邦政府已经“大部分接受了”中央政府对教育法案所提的建议，同时也“拒绝了一部分”。在解释把教育法案提交最高法院一事时，总理说：“毫无疑问，私立学校当事人会对这项法案提出挑战，”又说：“既然这个问题（教育法案）一再被提出，由最高法院对这件事提出意见，显然是合乎人们的愿望的。”由于事先就预料到这种作法很可能被解释成中央政府的不合理的干涉，因而总理又匆匆忙忙地补充说，中央政府决不希望限制邦的自治权。

总理的论点显然没有使喀拉拉邦政府和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满意。当时南布迪里巴德正在新德里，他会见了中央内政部长潘特，表示喀拉拉邦政府反对这一行动。不久以后——1月11日，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书记处在特里凡得琅发表了一项决议，强硬地抗议中央政府的这一行动。决议驳斥了那种认为征求最高法院的意见可以避免私立学校当事人进一步起诉的论点，指出最高法院所表示的任何意见都无法阻止任何人在法院对教育法案提出控诉。书记处的决议明确指出这一行动是为了统治政党的利益而“滥用职权和宪法条文”的做法，同时也是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政府的“政治歧视”。

把教育法案提交最高法院这一行动阻碍了喀拉拉邦教

育事业的进展，是不容置疑的。这项法案是在1957年9月初在邦议会中通过的；甚至在十个月以后，当作者在1958年6月执笔叙述这一事件的时候，教育法案所建议的全部迫不及待的教育改革距付诸实施还遥遥无期。<sup>①</sup>

尽管在教育事业的进展上遇到了这种严厉的限制，共产党政府在执政的短短十四个月中，仍然在教育领域中作出了足以自豪的优良成绩，而这种成绩是喀拉拉邦历届政府所望尘莫及的。事实上，这种进步深深打动了中央教育部长克·耳·斯里马里。最近——5月31日，他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一次教育家集会上发表演说时，就曾“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在教育领域中所作的工作表示敬意”（见“印度快报”）。

下面我们有关教育的工作简单地叙述一下：

特拉凡哥尔—柯钦邦在1948年合并以后，大学的改组问题立刻便成了必须解决的事，但是前任历届政府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早在1957年10月，共产党政府就已经重新草拟悬而未决的大学法案，并予以通过。现在，喀拉拉邦大学在新副校长约翰·马特海博士的英明指导下，很快就发展成为喀拉拉邦一切高等教育活动的神经中枢。

<sup>①</sup> 1958年5月最高法院对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审查的结果是，说邦政府有权接管少数民族私立学校的规定是违反宪法的，要邦议会重新修改。同年11月28日，喀拉拉邦议会作了相应的修正后再次通过此法案，修正的地方是邦政府在接管或接收任何学校时，英印混血人的学校和少数民族的学校不在此例。1959年2月印度总统批准此法案。喀拉拉邦政府定195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邦内的国大党、人民社会党、穆斯林联盟等反对党和一些天主教、印度教组织仍反对这项法律的实施，并且以此为借口，在1959年6月发动推翻邦政府的运动。1959年7月31日，印度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被解散后，教育法案中引起争论的条款已被修改。——译者

小学教师的待遇被提高到低级办事员的水平，也就是提高到每月四十到一百二十卢比的水平。邦政府对于把馬拉巴地区的高等小学教师的待遇从三十五到八十卢比提高到四十到一百二十卢比的问题，也作了同情地考虑。邦内得有学位并受过训练的教师在现在则享有八十到一百六十五卢比的较高的待遇。取得学位但未受过训练的教师的待遇则从六十五卢比开始。

政府也决定增加大学教师的薪金。公立大学的讲师今后将根据大学补助金委员会的建议定级。私立大学也得到了政府的经济支援，因而那里的教师也可以按照提高了的薪级领取薪金。至于大学教职员中的非教学人员，也按照大学补助金委员会所建议的数额发给薪金。

此外，为了使教育偏重于技术方面，邦的教育组织正在进行改组。在特里朱尔正在创办一所工学院，三所私立工学院也即将建立。政府也采取了步骤按不发毕业证书的中等学校水平来组织工艺研究工作。每一县至少有一所工艺学校。在工艺学校的下面有初级工艺学校，专门训练从高等小学转过来的志愿生。从1958年7月开始，将有十所这样的学校开始教学。

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的地区已经扩大了。政府公布的政策是，在今后五年中，在全邦实行十一岁以下的免费义务教育，这也就是说，在实行这个计划上，要比印度其他各邦提前五年。在1957—1958年度，免费供给午餐的办法已经推广到另外两个县——阿力培和科济科德，其他的县在不久的将来也将实行这个办法。

为了满足极北部的坎拿迪加斯少数民族的需要，已在卡撒尔哥德开办了一所大学。

共产党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就是实现了划分教育部门权限的计划。每一县的教育活动现在全部由县的教育官员控制，政府授给他更大的权限。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协作，最高一级的机构也重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工作布署。

在准备和发行教科书方面，也采取了新的方案。政府已任命了人员，组成一些委员会，从事教科书的准备工作，这类教科书将由政府出版社印行。教科书的发行工作将完全由学校合作社办理。这一步骤受到了普遍的欢迎，因为这消灭了该邦在教科书问题上所沿袭下来的无数缺点和弊端。

为了给小学教育提供基本的楷模，政府决定将基本教育审议委员会的五点方案付诸实施，这个方案是为了适应邦内的普遍情况而制订的。1958年5月30日，联邦教育部长斯里马里在埃纳库兰姆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盛赞喀拉拉邦政府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根据这个方案，喀拉拉邦政府准备在邦内的每一所学校设立一个工具室，将当地的工具收集在一起，利用当地的手工艺人来培养男儿童的手艺。斯里马里说这是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

事实上，喀拉拉邦教育法案之所以会留名史册，不仅是由于它被提交到最高法院，同时也是由于在庄严的法院里那种拥护和反对这项法案的辩论方式。喀拉拉邦政府的行动自始至终受到很高的评价。正象斯里马里在特里凡得琅所说的，喀拉拉邦的行动“不但引起了波澜壮阔的激辩，同时也帮助澄清了某些问题”。他同意，喀拉拉邦无疑要保证学校里不再会出现倒行逆施的现象，教员们会得到公平的待遇，并且会维持一个最低的标准。斯里马里还补充说，据

他所了解，“把私立学校的管理当局从教育领域中赶出去，并不是喀拉拉邦政府的意图。他们只希望在学校中维护某些道德标准，这是任何一邦都可以行使的权利。教育法案的某些条款也许必须加以修改，但是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法案的社会目的。”（见1958年6月1日“印度快报”）

1958年4月29日，有关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的案件受到最高法院的一个宪法法庭的审议，该法庭在5月22日宣布了它的意见。正如一位著名的评论家所说的，这项法案“实际上并没有改动”（见1958年5月26日“印度快报”中的“印度见闻”栏的“目击者”一文）。

有关教育法案的争执焦点是：在少数民族根据自己的选择建立和管理学校时，是否享有绝对的权利，以至政府只能提供补助，而不能附加任何条件。如果有这种绝对权利的话，那末这种权利授予少数民族的特权和权利将会超过多数民族自治区所享有的权利。正如最高法院所指出的，管理学校的权利并不包含那种毫无效率地管理学校的权利，而且一个学校如果要求邦的补助，就必然要服从政府所规定的某些条例。最高法院断定，喀拉拉邦教育法案所规定的条件并不是不合理的。

最高法院一方面批驳了那种认为教育法案是为了反对少数民族利益的观点，一方面也认为喀拉拉邦这项法案的第三条第五款——有关政府将来承认教育机构的规定——是违反少数民族的权利的。法案第三条第五款规定：“在本法案开始生效以后，新学校的建立或任何私立学校高级班的举办，得遵守本法案的规定以及根据本法案所制订的规章。凡不遵照此项规定而建立的学校或举办的高级班，政府不得予以承认。”

讀者可以清楚地看出，這項法案實質上並沒有任何變動，斯里馬里在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值得贊揚的目標也絲毫沒有受到損害。

但是，這樣的事卻發生了：天主教反動勢力和既得利益集團在喀拉拉邦國大黨和新德里的反動的反共朋友的支持下，已成功地把這一顯然公允的措施的實施日期推遲了將近一個年頭。

“印度時報”（1958年5月24日）在回顧最高法院的判決時，曾向喀拉拉邦國大黨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忠告。這家報紙說：“喀拉拉邦國大黨自己可以考慮一下，它反對教育法案的理由是否經過慎重的考慮。其他邦的國大黨政府也遭遇到同樣的立法問題，—拉賈斯坦和北方邦的政府甚至成了最高法院控訴案的當事人。另一個教訓當然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和民主的利益，喀拉拉邦國大黨在反對共產黨時，必須保證自己的反對政策是受既符合憲法、而且也能引用憲法予以支持的原則和方法所指導的。”

但是，喀拉拉邦國大黨是否會吸取這個教訓，卻是問題。



## 五 劳工政策和成就

就工业发展来说，喀拉拉邦和印度许多其他地区比较起来，是远远地落在后面的，那里现代化的大工业非常少；但是，喀拉拉邦的工人阶级却已很好地组织起来了，而且在邦的政治生活中是一支主要的力量。目前，喀拉拉邦有许多工会，各个工会的会员从不滿一百名到一万名，甚至超过一万名以上。工会大多数隶属于全印工会大会。革命社会党所领导的一些工会则隶属于统一工会大会。

在阿力培县，共有七十五个工会，共有从事各种工业活动的会员近三万人。其中最大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特拉凡哥尔—柯钦椰皮纤维工厂工人工会，这个工会拥有会员一万名。在柯塔扬姆县——主要种植园地区，约有四万名种植园工人在工会下组织了起来。在奎龙县，将近有一百个从事漆树子、椰皮纤维、种植园以及其他工业的工会，这些工会几乎全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

我们可以说，从埃纳库兰姆到阿威伊一带是喀拉拉邦最重要的工商业地区，柯钦港就在这个地区，这里有肥料、人造丝、稀有土、玻璃和机器制造等现代化工业。在七万五千名劳动大军中，约有三万二千名加入了隶属于全印工会大会的各个工会。在喀拉拉邦的马拉巴地区，共有六十多个工会，拥有会员六万五千多名。因此，今天的喀拉拉邦工会运动比 1935 年壮大多了，当时出席第一届全喀拉拉邦工会大会的只有三十个工会。

作为喀拉拉邦工会运动的創始者和組織者，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以后，自然應該遵循一种和历届政府迥然不同的劳工政策。在过去的十年中，历届政府的部长簡直就說不上有任何劳工政策，除非我們把他們所遵循的陋习陈規也說成是一种政策。国大党政府支持印度全国工会大会，而穷凶恶极地压迫其他工会，从而分裂了工人，削弱了集体談判的力量。其次，按照既定的官僚主义的作法，在一切劳資糾紛中，他們总是认为資方有理，而且还用政府的法律和权力来支持資方。

共产党政府的政策与这种陋习陈規完全不同。它主張承认和巩固一切工会，主張促进工人階級的团結，主張加强工人集体談判的力量。共产党政府对待工人階級斗争的态度以具有創造性而著称，和过去存在的一切方式有根本的区别。喀拉拉邦首席部长曾就这种态度作了明确的說明。他认为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有責任帮助千百万劳动人民“更有效地进行他們的斗争，来改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并且通过这种斗争来实现他們当前的和最終的目标。”（見喀拉拉邦政府出版物：“喀拉拉邦在前进中”一书中南布迪里巴德所写的序言，第七頁）

但是現在，劳动人民为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而进行斗争的問題，和警察在这种斗争中扮演何等角色的問題は分不开的。从傳統上來說，警察一向利用“預防拘留法”第一百零七条有关安全措施的规定、第一百零四条有关禁令的规定、不經审讯程序的拘留、警棍的毆打以及开枪射击等手段来鎮压所有的群众运动。在独立以前的岁月中，英国政府曾經用这些办法来对付国大党和人民运动，而在独立后的年代中，国大党政府竟也肆无忌惮地利用这些办法来

镇压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

与这种传统的对待问题的办法完全不同，共产党政府的政策是与劳动人民的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自然发展相一致的；共产党政府严肃地宣布，工人和农民同雇主的争端根本上是劳动部门和其他负责调解、裁决和公断的部门来处理的问题，而不是由警察来处理的问题。共产党政府决定，只有在劳资纠纷已经使任何一部分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危害的时候，警察才能出场。

总而言之，这个新的政策表明，在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的关系中，政府所起的作用已经有了变化。这种政策是从这样一个基本前提出发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以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关系等等，原本是一种应该由这些阶级自己去解决的问题。政府希望，争端能够通过个人之间的协商以及通过各方面人民的集体谈判得到和平解决。

换句话说，喀拉拉邦政府在那个通过警察来维护法律和秩序的政府部门和那些负责调解各方面和各阶级之间的纠纷的机构两者之间，划了一条鲜明的界限，后一种任务不是由警察而是由劳动部门和政府机构中负责调解、裁决和公断的部门来承担的。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是，这一具体政策并没有超出印度宪法的范围，不能把它看成是“阶级斗争”和“极权主义”的凶暴计划，使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对立。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印度国民增产计划所规定的任务。当全印工会大会去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埃纳库兰姆举行成立二十五周年庆祝大会时，南布迪里巴德致开幕词时说道：“喀拉拉邦政府正在竭尽全力使喀拉拉邦产生一种和谐的气氛，来促使工业进一步地发展，在这种工业发展中，正像

工人階級的合理利益和權利得到保障和受到維護一樣，實業家也會得到可以謀取工業利潤的保證。”（見1957年12月26日“印度快報”）

南布迪里巴德指出，就利用警察這個問題來說，這種政策幫助了工會和農民協會，因為這種政策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以往用來同工人和農民討價還價的“實力地位”。現在，勞動階級已經能夠在“平等的關係上不受威脅地同資本家和地主進行談判了。”儘管有人對這一政策大嚷大叫，但是它不但沒有使工業的動蕩局面惡化，反而大大地緩和了局勢。

喀拉拉邦政府勞工政策的第二個重要方面是，它鼓勵用互相協商和談判的方法來解決勞資爭端。以往慣例是，如果在糾紛中調解辦法失敗，就將爭端提交勞資法庭進行強制裁決。這樣，爭端往往拖延好幾個月，有些案件甚至拖延了好幾年，因而工人自然反對強制裁決。實際上，這種方法結果只是使糾紛不得解決；同時由於它妨礙工人採取直接行動，因而也就間接地幫助了僱主。

在對待勞資糾紛的態度上，共產黨政府是從更深入的基礎出發的。共產黨政府認為，只是當有關增加工資、紅利和其他問題在這個或那個工業中發生的時候，解決個別的糾紛是不夠的。它決定了一項在整個工業和全邦的基礎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以便在勞工部門的官員的幫助下，使僱主和被僱者之間達成比較長期的協議。勞資關係委員會在椰皮纖維、榨油、機器製造、紡織、磚瓦、化學以及種植園等重要工業部門中建立起來了。因而，共產黨政府在執政的頭六個月中，就能通過三方談判的方式解決了百分之九十的糾紛。

这一决策也是为了通过种种使工人和业主密切合作的建設性的政策来促进邦内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勒索”或“强力压制”资产阶级的意图。南布迪里巴德在全印工会大会上，强调了在整个工业和全邦的范围内长期解决劳资关系的必要性，他向大会说：“工人阶级的这方面的問題是很重要的，就如同妥善地解决工资、紅利等問題一样重要。除非这个問題能够在全国的基础上得到解决，除非邦和私人资本家的资源、甚至普通人民的財力全部发挥出来，从而使現有的全部工业单位不仅能維持下去，而且还能进一步扩充和巩固，并进而建設新的工业单位，否則，喀拉拉邦的工人阶级便不会得到拯救。”

这种态度的正确性是显而易见而不容置疑的。但是值得注意而且令人遺憾的是，把自己党的利益放在邦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的喀拉拉邦国大党竟发动了一次气焰万丈的运动来反对这种劳工政策。他們的論点是，共产党政府支援和鼓励有組織的工人阶级，帮助他們达到合法的要求的政策，是喀拉拉邦工业化的一道障碍，而且只要这种政策繼續下去，建立新工业单位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当一些私人企业家提出具体的建議的时候，他們还想尽办法用一些虛构的鬼話来劝阻他們。

为了把这种三方談判的政策在喀拉拉邦全境内推广，喀拉拉邦政府便組織了一个劳资关系委员会。該委员会的一个小組委员会考虑到有必要使雇主和工人了解他們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于是便提出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的大多数論点是以一致的理解为基础的。报告中的建議包括工资、紅利、工厂委员会、談判机构、工业中的紀律規章以及工业的和平秩序等类問題。为了滿足工人的合法要求，报告

提出了下列建議：(1) 为所有的工人規定一个邦內的最低收入的标准；(2) 規定在工人年老退職或自动退職时，发給养老金；(3) 規定邦內各个工业单位不論盈余或亏损，均按工人的年收入发給百分之六点二五的最低保証紅利，同时每年要从工业单位的利潤中发給盈余紅利。

毋需指明，这些建議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因为这些要求都曾为国际劳工組織和印度政府的劳工部所接受。当去年12月摩拉尔吉·德賽——当时的联邦工业部长——前来喀拉拉邦訪問，并发表与印度政府劳工部理解不一致的觀點时，喀拉拉邦工会會員和工人階級之所以感到惊讶，道理也就在这里。他曾向劳資关系委员会发表談話，表示不同意該委员会小組委员会的建議，甚至反对其中的許多主張。

共产党政府充分認識到，只有在邦营工业单位給予工人以公平的待遇时，邦政府为滿足工人的合法要求而作的努力才能成功，于是共产党政府便对邦营企业的工人特別照顾。喀拉拉邦政府大大增加了邦运输部門全部雇員的工資，并且按全年收入的百分之八点三三发給最低保証紅利。邦政府又使全部有关劳工的法律都适用于这个部門的工人，同时还建立了一个有工人代表参加的管理委员会。

在邦营特里朱尔斯塔拉姆紡織厂，政府发給了工人約十三万卢比，作为預付紅利，又增加了物价津貼，同时还把将近一百名被裁減的工人重新吸收到工厂里来。在邦营科齐科德肥皂厂、鯊魚魚肝油制造厂和氫化工厂中，工資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左右。在肯达拉陶瓷工厂、彭納魯尔胶合板工厂、电器联合工业等工厂中，工資也有了提高。对于公共事业部門的工人們，从扫街工人起，都給予了很大的优待。

福利金計劃推广了, 房屋方案也在着手进行, 休假的福利也和其他等級的职业取得了一致, 工厂委员会也建立了起来。

喀拉拉邦政府 1958 年 1 月决定, 凡因与雇主发生糾紛而在等待裁決或公断期間由于可疑的理由而被解雇或撤职的工人, 均发給經濟補助。这是印度在这方面的首次嚐試, 因而是有重大意义的。所規定的補助按照当事人在解雇或开除前一个月所支取的平均工資的百分之五十按月发給, 最多以六个月为限或直到裁決当局或公断人作出决定为止。如果工人得到复职并补发了工資, 必須偿还所領取的經濟補助。这样, 正如政府声明所指出的, 劳工“在劳資糾紛中”便能“和資方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关于喀拉拉邦广大的种植园, 已經建立了一个由工人和雇主代表組成的委员会来規定公平的工資率。在最后决定尚未作出以前, 一个暫时的工資率已經确定下来, 受惠的种植园工人达二十万人。根据 1958 年 1 月 6 日在柯塔楊姆所达成的協議的条件, 将按照下列比率提高工資:

(种 类)	現行工資率			增加后的总工資率		
	(包括物价津貼)					
	卢比	安	派斯	卢比	安	派斯
最低工时工資率,						
(1) 田間工人						
男子	1	9	6	1	11	6
妇女	1	3	3	1	5	0
儿童	0	12	9	0	13	9
女采汁工	1	6	6	1	8	0
少年	1	0	0	1	1	0
(2) 工厂工人						

男子	1	13	0	1	14	0
妇女	1	6	0	1	7	0
少年	1	2	1	1	3	0

保証工时工資率将按下列标准发給

(1) 男子	0	12	6	0	14	0
(2) 妇女						
(i) 采汁工	0	12	6	0	14	0
(ii) 非采汁工	0	9	6	0	11	0
(3) 儿童	0	6	3	0	7	3
(4) 少年	0	7	10	0	9	0

对于那些已經得到一卢比十三安以上工資的工厂男工，将根据現有工資增加一个安。上述工資增加率也适用于种植面积在一百畝或一百畝以上的茶园和种植面积在二百畝或二百畝以上的橡胶园。在其他种植园的成年工人的工資，不論是最低工时工資或保証工时工資一律增加一个安。少年和成年人的工資分別增加九个派斯和六个派斯。

这些工資率比馬德拉斯邦的工資率要高，該邦已实行了直到1961年为止的工資冻结。那里也沒有計件工資制，因此也就沒有保証工时工資。除此以外，喀拉拉邦的种植园工人不但得到了最低工資的保証，而且在沒有正常工作的日子里也得到了工作的保証。在雇主不能給工人以任何工作的日子里，雇主也必須发給保証最低工时工資。不但如此，喀拉拉邦政府还修改了根据种植园法所制定的規章，使种植园主有义务在所有种植园中开办学校，这些学校既将受邦教育部的行政控制，也将得到它的积极帮助。同样，所有种植园已經联合起来开办医院，設有一定的床位和对产妇的照顾，对于兒童教养也作出了規定。另外自1958年



3月开始，政府也为小豆蔻种植园的工人规定了最低工资。

共产党政府也作出了同样积极的努力，把最低工资法案推广到数目在日益增加的工业中去。凡是列入计划的各种工业都已规定了最低工资。此外又有五种工业置于这个法案的管辖之下。而且政府已经决定把这个法案推广到另外七种工业中去。举例来说，即便是那些遭到忽视的采椰子汁工人、从事公共工程的工人小组和砖瓦业的工人现在也遵照政府的命令规定了最低工资。在漆树子工业、木材工业、印刷业和手工纺织业中也成立了委员会，正在规定最低工资。的确，印度任何其他一邦都不能像喀拉拉邦这样由于替工人阶级的福利作出的一系列成就而感到自豪。

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也没有被忽视。为从事农业工作的各种农业工资收入者也规定了如下的工资标准：

#### 八小时工作日的最低工时工资率：

	卢比	派斯
1 平常的农业工作		
(i) 男子	1	50
(ii) 妇女	1	00
2 为种植椰子树挖坑或作畦 (在沙地工作除外)	1	62
3 为种植塔皮奥卡菜(topioca)或甘蔗掘 地或耕地、筑丘埂或挖盆地(在沙 地工作除外)	1	62

#### 摘椰子的最低计件工资率：

每棵椰子树 0 44\*

#### 耕地：

1 用劳工的耕牛耕地，每日工作四小时	2	75
2 用业主的耕牛耕地，每日工作四小时	1	50

### 移植工作：

最低工資應與任何平常勞工相同，但是在近水地方筑壩開墾耕地的地區，工作五小時，在其他地區工作六小時。上面規定的工作時間是真正工作的時間（也就是說，不包括集合、到工作地點去的來回時間以及休息等時間）。

### 收割和打谷：

在通常發給的叫做“日爾普”(Theerpu)或“維拉姆庫迪”(Vel-lamkudi)的工資以外又發給所收的稻谷的九分之一。如果沒有打谷場的設備而由工人自帶谷袋者，有權取得補償，每收割兩千帕拉<sup>①</sup>的稻田給一帕拉。

(如果上述工作的所有或任何一項現行工資率高于上述規定，則應繼續按較高的工資率支付。)

- 每采二十五棵椰子樹或其中的一部分發給椰子一枚。

喀拉拉邦政府的另一項嶄新的政策是，把邦內的勞工和建築合作社聯合起來，目的是運用大批還沒有被利用的人力資源，從而幫助人民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以前政府的建築工程一向都是交給私營承包商承造的，受惠的只有一些承包商和少數的技術工人。共產黨政府斷定，在與其他部門合作的條件下，勞工和建築合作社可以分階段地代替現有的承包法，從而在收入上和就業(為該地區的發展而進行的工程所提供的職業)上，使每一地區都能得到最大可能的利益。為了這個目的，一項作為試驗性措施的方案擬定出來了，計劃組織二十五個合作社，在二十五個全國農村服務推廣計劃地段的地區里各設一個。方案注意到，在正確的路綫上，組織這些勞工建築合作社，同時也注意到在合理的條件下向建築合作社提供工作的機會，並對它們進

<sup>①</sup> 重量單位合九十磅。——譯者

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

在考虑向其他地区推广这项计划以前，将首先对这二十五个试验性的合作社进行为期一年的观察。主管当局将把其他部门主管的房屋和道路的保养、林业部门的筑路、修建下水道和建筑学校、挖土方、平土、用沙土平路、用石块铺路、保养以及次要的修缮等等造价不满二万五千卢比的工程，以及不需要技术工人而可以合同方式承包的次要灌溉工程等交给这些劳工建筑合作社承办。同时主管部门也向合作社提供了按核准估价预付百分之二十五的造价，按通常发给承包商的比例提供铁、钢和洋灰等材料的种种便利条件。

这种别出心裁的试验具有很大的成功可能性，能够实现和平地消灭以腐败出名的承包商和保证增加工人收入的理想。

应该指出，当共产党政府遵循积极的政策来保证工人的合法权利和要求的时候，同时也提醒了工人阶级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当特·弗·汤马斯 1958 年 4 月 26 日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工人集会上发表演说的时候，就曾说：“社会有责任在各种活动的领域中保证工人享有适当而合理的生活水平。就工人本身来说，在他们就自己的权利提出要求的时候，也必须记住自己的责任，而且要认识到，只有在他们尽了责任以后才会得到权利。不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以罢工相威胁、妨碍工业的进展，并不能说明是工人的正确态度。对一切运动来说，群众的合作与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为了保证能够获得群众的同情，所提出的要求就应该是合理的。”（见 1958 年 4 月 28 日“印度教徒报”）。

## 六 关于喀拉拉邦“局面 不安定”的全部谎言

喀拉拉邦教育法案强烈地震撼了邦内的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实行解决劳资纠纷的新政策和授予警察的新任务，使既得利益集团失掉了传统助手，过去既得利益集团一向依靠这批助手，站在“实力地位”上，来对付劳工的要求。紧接着，1957—1958年度的邦预算又一变二千二百五十二万四千卢比的赤字而为七十三万三千卢比的结余。这项预算中规定对农业资产征税、对农业所得超过二万五千卢比的公司征附加税。这两项税收能分别征得一百六十万卢比和六百五十万卢比。所有这些措施都足以使喀拉拉邦的壁垒森严的强大资产阶级疯狂而有余，他们不愿意俯首贴耳地按照这些措施办事。于是金钱的力量便发挥了作用。他们的战斗口号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出现了“不安定的局面”。在报纸上、在讲道坛以及演讲台上，“局面不安定”已经成了口头禅。什么“共产党要下毒手了”、“共产党正在推翻宪法”、“喀拉拉邦的现状是法纪荡然、生命财产没有保障”等等叫嚣，不仅在喀拉拉邦，而且在整个印度，都一步一步地加强起来了。

的确，资产阶级的惶恐不安是有理由的。在这个邦里出现这样一个真诚地履行自己竞选诺言的政权，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这个政权在保卫进步事业和千百万劳动人民利益的斗争中是毫不妥协的，它没有服服贴贴地听信豪富

們在招待会上和种植园主在鋪着紅色地毯的幽靜宮殿里举行的宴会上所发出的甜言蜜語。一句話，这些掌握政权的人是一种既得利益集团完全无法对付的人，对付他們的唯一办法便是把他們从那个由群众的选票把他們抬上去的权力宝座上推下来。

不仅如此，共产党政府的群众政策恰似吹来了一陣疾風，它吹动了长期遭受痛苦的劳动者的潜在力量。喀拉拉邦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劳苦大众为他們的党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群众的热情和觉醒的浪潮席卷了整个喀拉拉邦，其情况就像 1937 年国大党政府取得政权时人們在英屬印度各省所看到的情景一样。在那些日子里，群众的洋溢着得意神色的觉醒浪潮是惊人的，它表现在农民和工会对那批长期压迫他們的人所进行的斗争中。比方說，纵使在那个时候，北方省的那批大君和地主以及他們在勒克瑙所办的日报，就曾声嘶力竭地大嚷大叫，说什么在国大党的統治下法紀蕩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在共产党执政以后，喀拉拉邦也开始经历同样的过程。既然共产党政府不准邦的武力像过去那样去支持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討价还价的力量便大大地削弱了。于是工人和农民群众便能够赢得許多利益。

正和 1937 年一样，今天劳动人民的崛起也引起了“法紀蕩然”的叫囂。既得利益集团无法应付劳动人民的要求，于是便开始大叫“局面不安定”。不过，所不同的是，国大党对于 1937 年大君和地主的叫囂并没有加以重視，而在 1957 年，喀拉拉邦的国大党組織本身竟也吹起了种植园主的調調。

在馬拉雅兰姆，大約有二十七家日报，其中只有三家是

共产党报纸。除共产党报纸以外，其中最有力量的几家不是属于国大党的豪富，就是属于天主教会。除了有限的几家以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加入了这个“法纪荡然”的大合唱。尽管爆发出来的全部群众斗争运动都没有越出合法的范围，但是这些报纸却大肆渲染。对于在种植园、工厂和乡村所发生的斗争，它们总是抓住这里或那里所出现的一些事件，广泛地进行宣传。在好几次事件中，这些报纸的报道完全是夸张的，但是它们竟把这些报道贯穿起来，去证明“法纪荡然”的情况遍布全邦。

谁也不否认，在劳动人民和他们的直接雇主或压迫者之间，曾经发生过几次冲突，有时这种冲突还很严重，甚至也很激烈；但是这毕竟不是什么离奇或异乎寻常的事情。即使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以前，这种冲突就曾发生过，就如同在其他各邦所发生的一样，并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也正像报纸经常报道的一样，这些冲突是我们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的不平衡状态的直接结果。任何不偏不倚的观察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喀拉拉邦的法纪并没有恶化的特殊现象。

在“局面不安定”的叫嚣后面，基本上存在着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共产党政府的存在而产生的惶恐不安的情绪。他们不能容忍共产党政府，尽管共产党政府是在宪法的范围内办事的。南印统一种植园主协会主席卡尔德伍德先生也许是由于一时的不小心，在对该协会第六十四届年会发表演说时，就曾流露出这种心情。他说：“这个（共产党）政府不论怎样受到我们的民主联邦体制的约束，但是对各种私人企业来说，它的存在，无疑还是重重忧虑的根源；共产党政府的思想体系是坚决反对私人企业的。”他表达了种植园

社会的忐忑不安的心情，他們深恐喀拉拉邦政府可能把种植园收归国有，接着他便滔滔不絕地臆造出連篇“藐視权威”、“种植园暴民”压制經理、甚至还有什么“暴力行动”等等的謊言。由此可見，使他感到痛心疾首的无疑是种植园主对劳工的剝削已經遭到了威胁。

南印統一种植园主协会主席在下面一段声明中暴露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共思想和他們的利潤是怎样密切地交織在一起的，这整个事件与那种痛恨“武力”和“外国”势力的說法又是怎样巧妙地連系起来的。他說：“我們的恐惧是，那种同我們絕大多数人民平时的目的、信仰和宗旨完全不同的、受外国左右的主义可能通过法律进行傳播，并且通过武力加以执行。正是从这种恐惧出发，我在喀拉拉邦今天的稅收趋势上看出，共产党政府并不是决心建設或扶植我們的工业，而是要用狡猾的經濟手段来破坏我們的工业。”（見1957年8月28日“政治家报”）

事情很明显，既得利益集团并不打算俯首貼耳地遵从共产党政府的政策。种植园主、地主、还有天主教会已經不能再利用警察的傳統助力来鎮压人民为滿足自己的要求而进行的斗争了；他們为学校里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感到痛心。于是他們便决定采取建立私人武装力量的政策，以便实现破坏工人罢工、夺回耕种者的田地、制止种植园主的教会和其他方面所深恶痛絕的游行和集会等目的。既得利益集团既不能再依靠警察来进行这种違反宪法的活动，于是便建立了“克里斯托弗”的組織，企图利用一个大規模的雇佣武装的組織来弥补警察的行为不苛給他們带来的損失。

在这个問題上，简单地談一談天主教教士所扮演的角

色，是很重要的。他們是种植园主用金錢支持的“克里斯托弗”武装队的主要組織者。自古以来，羅馬天主教會的教士一向就是反动势力的主力。这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的。从法国革命时代一直到今天，羅馬天主教會始終站在社会最反动的势力那一边。如果說在法国革命的时候，他們支持封建势力，那末在現代，他們就是佛朗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后台。当墨索里尼的軍隊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战争的时候，神圣的教皇就曾給他的軍隊祝福。由于果阿靠近我国，我們对于教會在帮助薩拉查鎮压果阿的行动中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的确，天主教會是一个世界性的集团，而且它們的行动一致。

比方說，我們不妨注意一下一位神父在遙远的大吉岭所发出的下列指責。1957年8月11日，当喀拉拉邦的天主教反动势力正在埋头对喀拉拉邦政府发动攻击时，一位叫做法罗耳的神父便在大吉岭新加馬利地方圣約瑟夫·巴斯蒂教区神父教堂里发表了这样的談話：“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已經建立起来了，該政府正在压迫那里的基督徒，同时潘迪特·尼赫魯也是一位共产党人。尼赫魯的所行所为还不仅限于支持这个遭到痛恨的共产党政府而已。当他在芬兰和挪威旅行的时候，他就曾說过：‘喀拉拉邦的紅色政府正有礼有节地、公正无私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尼赫魯居然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說出这样一番話，要求一个共产党员說的話也不过如此！我們全印度所有的基督徒應該联合起来，組織一支十字軍，我們不仅要声討共产党人，而且要反对那个有意識偏袒共产党的尼赫魯政府。”

毫無疑問，喀拉拉邦天主教教士們已經決定了一項对共产党政府展开无情战斗的政策；那支私人雇佣的“克里斯



托弗”武装队正是为了这一目的而組織起来的。至于他們是怎样想出“克里斯托弗”这个名字的，人們的看法各有不同。不过，人們都知道，“克里斯托弗”是天主教会为了推翻人民所选举出来的共和政府和帮助佛朗哥將軍，在西班牙所組織的那个半軍事性团体的名字。在喀拉拉邦的某些天主教中心，例如在特里朱尔县馬拉的柯塔穆利教堂，从1952年起，似乎便有了“克里斯托弗”組織。当时該組織的目的仅仅是为“社会服务”。

不过，可以肯定，“克里斯托弗”目前的武装暴力組織形式，在共产党政府成立以前，在特里朱尔或柯塔揚姆——該組織目前的主要据点——并不存在。不錯，1957年8月26日，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反对教育法案的示威游行中，这些“克里斯托弗”队员就是游行行列的主体。不过，据一般推测，正是在反对喀拉拉邦教育法案的期間和以后，天主教教士們似乎才决定把这个組織改变成反共的武装队。1957年10月22日，天主教教士公开宣布了“克里斯托弗”的組織，企图“拆穿”人們所指控的它是一个为了可疑的目的而建立的私人組織这一說法。到这时，“克里斯托弗”組織已經成了一支受軍事訓練的武装队了。

尽管“克里斯托弗”組織就这样装上了合法的門面，但是从它所有的实际目的来看，它仍然是一个从事秘密活动的組織。据消息灵通方面称，在柯塔揚姆县的天主教中心——蒙达卡揚姆、坎吉拉帕利、潘巴迪、昌甘納彻利、卡魯卡丘耳、眠納契尔、依拉土皮塔以及依土曼努尔——聚集着为数在五十、一百、二百、甚至三百的歹徒。“克里斯托弗”組織只吸收信奉天主教的男子，他們进行軍隊式的訓練和操演，由国家軍訓团的教练、退伍軍人等負責訓練。操练是

晚間在教會的場地上進行的。

“克里斯托弗”組織的基本單位叫做小队 (desavayoo-ham, 即十人一队)。再高級的單位便帶有軍隊的成分了——每十個人有一位頭目, 每十個單位有一位司令等等。據說還有一位也是由主教任命的總司令。在小隊上面是小隊長 (desadhipan), 再上面便是大隊長。每一個地區有一個區長官 (mekhaladhipan)。“克里斯托弗”隊員的精神顧問便是教區教士。

“克里斯托弗”隊員在訓練中使用羅望子木棍。在出席群眾集會的時候, “克里斯托弗”隊員總是身穿藍白色的制服, 攜帶着這種長達三尺的木棍。

天主教教士在政治上和精神上領導“克里斯托弗”組織, 把它當作一支私人的武裝隊加以利用。每當既得利益集團“有請”的時候, 他們便欣然到任何指定的地方去, 動手鎮壓勞動人民。不論什麼時候, 只要“克里斯托弗”隊員受到“邀請”, 總備有汽車載送他們。他們並沒有正式的月薪。但是每當他們“出勤”的時候, 在本縣內每天就可以得到三個盧比, 而到縣外的地區去就可以得到六個盧比。

“克里斯托弗”組織雖然主要集中在柯塔揚姆, 但是其他縣也有分支組織, 不過除了在特里朱爾縣以外, 其他地方的分支組織都不大重要。在特里朱爾縣, 人們相信“克里斯托弗”的單位分布在帕利塔札姆、瓦達孔穆利、阿蘭杜爾、文努爾和瓦利阿帕蘭巴茨等地; 但是有時他們也在“青年聯合會”、“公民權利保護團”、“社會偵察兵”、“民主戰綫”等等不同的名稱下從事活動。在上述大多數地方, 他們都得到國大黨主要人士的支持。

12月, 司法部長弗·爾·克里斯納·艾雅對邦議會說,

“克里斯托弗”組織就像是一支“私人武装队”，人們担心这种武装队是“国家的威胁”，因此政府正在密切地監視着它的活动。他說，根据政府所接到的报告，在柯塔揚姆县，有一支一万四千五百九十八人的“克里斯托弗”武装队，在特里朱尔县也有这种人存在。艾雅說，他們在“教会的圣洁的場所”由退伍軍人和前馬拉巴地区特別警察加以訓練，而在經濟上則有主教給予支援。他們还領有木棍，必要时立刻可以把这种木棍变成武器。（見1957年12月22日“印度快报”）

尽管“克里斯托弗”武装队目无法紀、横行霸道和威胁和平的情况是事实，但是天主教反动势力、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竟联合起来，大嚷大叫，說什么共产党政府鼓励党的小組擅自执行法律，在喀拉拉邦放手实行地地道道的“恐怖統治”，听任和平居民的生命財產时时受到威胁等。他們信奉了希特勒的格言，认为謊言之所以显得真实，正是由于它的夸大，于是他們就捏造了什么“私設的法庭”正在农村把人命当儿戏，并且主宰着一切等等的連篇鬼話。一家屬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急于討好的报纸就大肆宣傳这种謊言謬語。把政府将公地分給嗷嗷待哺的无地农民一事說成是一个使共产党队伍进一步渗透的恶毒計劃；把成立各級群众委员会来帮助行政当局一事編造成一个深謀远虑的危險政策，企图使所有的官員都陷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并把整个政府机构变成一个巨大的“极权主义”的杀人制度。的确，謊言越是荒誕无稽，也就被宣傳得越厉害。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就在这种謊言的后面推波助瀾，而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人也就随声附合。

一位評論家——当然不是共产党的朋友——說得好：

“在一大堆针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而发的言论中，人们很容易看出愤怒、仇恨以及对这个肥缺的垂涎的情绪。不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社会党，根据他们过去大权在握的时代的情况来判断，都没有向共产党政府挑衅的资格。”（见1958年1月21日“印度快报”的“印度风光”栏的“目击者”一文。）这位评论家又说：“关于法律和秩序的鬼话，任何党派都不配提。印度各邦都同样布满了邪神恶鬼。在喀拉拉邦，正是由于某些受人重视的古老权利破灭了，才对警察的正常作用撒下游丝网的。从丹努·皮莱如何运用邦的警察权来对待抱不同意见的泰米尔族人民一事来看，对警察的正常作用进行责难，至少不应出自人民社会党之口。”（同上，1958年1月7日）

的确，关于喀拉拉邦“共产党目无法纪”的谎言，至少有一段时间，竟变成了整个印度的主要话题，因此对整个事件值得进行周密的研究。而捏造谎言的“成就”必须归“功”于国大党总书记纳拉扬。

很显然，这位国大党总书记完全没有认识到警察武力连同军事武力构成了邦组织的核心，而一个邦的性质又取决于使用警察的目的和方式。此外，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斗争中，这种“共同繁荣”式的头脑对于利用“预防拘留法”第一百零七条和一百四十四条以及其他警察高压手段是感到心安理得的，他认为所有这些规定非常自然而且合理，因而在他看来，那项宣布邦的武力不再站在资产阶级的一面而进行干涉的声明，只不过是鼓励无政府状态和制造法纪荡然的局面的东西罢了。

人们只有记住这位总书记思想上的这些局限性，才能够了解为什么甚至在南布迪里巴德于1957年7月23日发

表极其明确的声明以后他还說，“混乱的状态”越来越“恶化”。南布迪里巴德宣布：“共产党政府希望向各有关方面明确，言論、出版、集会或組織的权利是民主的不可或缺的要素，我們共和国的宪法保証了这些权利，因而国内的每一个政党都可以行使这些权利，警察在引用法律的条款和履行維護法紀的职責时，不允許镇压或限制任何党派的民主活动，不論这个党派是大还是小。”

我們的問題是，尽管共产党政府的公众行为正确到无懈可击的程度，为什么还会在全印度的范围内发生什么喀拉拉邦的“法律和秩序”的叫囂呢？我們已經在上面叙述了在喀拉拉邦起作用的各种势力。金斯萊·馬丁在“新政治家报”发表了一篇有关他1958年年初訪問印度的印象的文章，他写道：“共产党的最頑强的敌人便是教会的首領——大主教，这个教会以历史为理由，要求人們退回到圣湯馬斯的时代和公元第一世紀。这位大主教是一位非常受人欢迎和好客的健談者，詆毀共产党政权的手法非常高明。他为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教育法案而临时成立的組織也非常有效。”（見1958年4月16日“印度时报”）

印度国内反动势力所組成的反共十字軍也加入了神圣的大主教所发动的反共“神圣十字軍”；如果我們記住了这件事，上段所提出的問題，也就得到了答案。正当喀拉拉邦天主教反动势力已經准备好火力，决定和教育法案火拼到底的时候，納拉揚就在1957年7月向国大党主席提出了他那份关于“喀拉拉邦法紀无存”的报告。这并不是沒有意义的事；这份“报告”始終沒有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但是“报告”的“摘要”却神秘地泄露給新聞界了，于是馬华里的一些百万豪富所拥有的几家日报便大加渲染。

不过，“报告”所泄露出来的东西仅仅暴露了这位国大党总书记的反共歇斯底里罢了。他再一次侮辱了馬拉雅利族人民，把那些被釋放的政治犯和那些原判死刑而得到減刑的人叫做一般的“罪犯”和“凶手”。他顛倒黑白，任意歪曲共产党政府的警察政策，目的是要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极端的无政府状态已經成了喀拉拉邦的常态。

札雅·普拉卡斯·納拉揚用不偏不倚的証言駁斥了这种宣傳。他是最早揭发“法紀蕩然”这种謊言的一位。由于喀拉迪地方的共同繁荣會議和温罗巴的周游喀拉拉邦徒步旅行的关系，札雅在喀拉拉邦逗留了一段时间，随后他就回到了加雅。1957年8月，在加雅和印度新聞社的特派記者进行单独談話的时候，札雅·普拉卡斯說道：“我喜欢他們（即共产党政府）办事的方式。”至于有关法紀以及警察的作用的問題，他认为某些国大党領袖“过份喧囂”。他說，他知道过去在維護法紀的名义下，曾給予警察特殊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却被用来保护既得利益和鎮压人民。他說，事情很明显，喀拉拉邦所禁止的只是警察的反群众行为，而不是警察打击普通罪犯和危害社会者的行为。

就在同一时期前后，联邦議會議員——印度革命社会党总书记——特里迪布·乔杜里站了出来，有力地駁斥了施里曼·納拉揚的謊言。乔杜里說，他曾在喀拉拉邦的大部分地区旅行过，“看到人民来来往往从事他們的日常工作”，那里“并沒有所謂法紀蕩然的迹象”。他接着又說：“看来同样令人吃惊的是，施里曼·納拉揚先生所提出的控訴，与南印統一种植园主协会的一位发言人所提出的指控竟如出一轍。”特里迪布·乔杜里根据自己的調查所揭露的事实，詳細叙述了种植园的情况，接着便說：“我不得不作出結

論，施里曼·納拉揚先生实际上是在為邦內的既得利益集團進行辯護。”在結論中，他提醒各有關方面注意“種植園豪富、天主教既得利益集團以及國大黨某些主要執行委員之間所結成的奇怪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正是今天喀拉拉邦在幕後操縱有關教育法案和所謂法紀無存這種騷動的組織。”

現在讓我們對局勢作一番更具體的觀察。印度政府內閣秘書處所發表的“每月統計摘要”明確地揭穿了誹謗喀拉拉邦政府“法紀無存”的謊言。這本摘要第一百一十七頁登載了一份關於“印度可審理的違法行為”的特別統計表格R，表格指出了1957年印度各邦的嚴重犯罪行為。我們不妨把喀拉拉邦的情況和其他一些邦的情況比較一下：

	人口(千萬)	謀殺犯人數
安得拉邦	3.12	206
孟買邦	4.8	489
馬德拉斯邦	2.99	218
賣索爾邦	1.94	151
喀拉拉邦	1.35	70

這裡可以看出，人口比喀拉拉邦多的賣索爾邦的謀殺犯人數比喀拉拉邦多一倍以上，而人口比喀拉拉邦多一倍以上的馬德拉斯邦竟有三倍以上的謀殺犯。在孟買邦人口雖然比喀拉拉邦多兩倍半，而謀殺犯的人數竟比喀拉拉邦多六倍。

1957年的“結伙搶劫案”在安得拉邦有十六起，孟買邦一百八十六起，馬德拉斯邦二十起，賣索爾邦三十起，喀拉拉邦六起。關於“搶劫案”的數字是，安得拉邦五十一起，孟買邦六百四十一起，馬德拉斯邦七十六起，賣索爾邦四十五

起，喀拉拉邦三十三起。我們可以看出，按照人口比例來說，喀拉拉邦的數字是最低的，孟買邦的搶劫案竟高出二十倍之多。

關於“騷亂案”的數字是：安得拉邦四百二十一件，孟買邦四百九十五件，馬德拉斯邦四百六十二件，賣索爾邦一百二十六件，喀拉拉邦一百九十六件。

在包括謀殺、結伙搶劫、搶劫、侵入住宅、偷竊、騷擾以及其他罪行（例如綁票、誘拐、欺騙、違反信託和偽造）的“各種犯罪行為”的名目下，“每月統計摘要”發表了下列數字：安得拉邦八千一百三十件，比哈爾邦（人口三千八百萬）一萬六千四百六十四件，孟買邦兩萬八千三百六十八件，西孟加拉邦（人口兩千六百萬）一萬六千三百四十件，馬德拉斯邦一萬三千二百九十六件，賣索爾邦四千五百零一件，喀拉拉邦三千二百八十二件。

這些數字就足以說明問題了，但是究竟能否制止有關“法紀蕩然”的謊言却是疑問，因為大嚷“局面不安定”的叫囂還不時能聽到，更何況在1958年3月，當喀拉拉邦農業關係法案在邦議會提出時，這種叫囂又有越來越凶之勢。

我們還有許多更光明正大的證據來說明喀拉拉邦并非法紀無存。“觀察家”在勒克瑙聲望素著的“國民先驅報”（1957年9月15日）每周專欄“各邦動態”中，精確地評價了共產黨的針鋒相對的聲明和反對黨有關“法紀無存”的指控以後，接着寫道：“看來，按傳統方式利用警察力量和他們的反羣眾行為在某些邦里仍然繼續存在；如果喀拉拉邦像札雅·普拉卡斯先生所相信的那樣，已經有了改變，其他各邦政府應對這一范例進行研究。它們並沒有盲目加以仿效的必要，不過它們也許會同意不應該像以往英國統治時期



所作的那样在煽动者挑衅行为所激起的怒潮中使用警察力量。”

另外，新德里“政治家报”（1957年8月31日）的一位“特别代表”从喀拉拉邦曼戈兰治所发出的报道说：“我到喀拉拉邦来是为了寻找我们在北方经常听到的那种有关法纪蕩然，一片混乱的情况的，但是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够找到。”同一家报纸的一位特派记者在一个星期以后也从特里凡得琅发出了一篇报告他的“印象”的报道说：“虽然可以肯定法纪并没有崩溃，但是有产阶级一般对政府的意图疑惧不安，而工人们则认为‘自己的政府’已经建立了，应该有权享受优惠的待遇。”

正是由于有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既得利益感到惶恐不安，所以才发出“法纪蕩然”的叫嚣。如果这位特派记者的报道把这一点包括进去，就更加客观了。喀拉拉邦惶恐不安的有产阶级在印度国内反动势力的支援下，对共产党政府摆开战线，企图把它推翻。这时，甚至连英国人所拥有的“政治家报”（1957年9月7日）都说：“由于喀拉拉邦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就对那里的情况感到惊慌不安，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认为唯一真正的危险就在于喀拉拉邦的共产党不会失败，反而有可能在不采取非法行为的范围内减轻这个文化水平很高的邦的贫困状态。对任何人来说，拒绝把曾经给予契迪·贾根<sup>①</sup>博士的机会给予南布迪里巴

<sup>①</sup> 贾根是英属圭亚那人民进步党左翼领袖。1953年4月人民进步党在圭亚那的第一次普选中获胜，贾根出任总理。他执政后发动修改宪法，但在1953年10月，英国凭借武力罢免了他的总理职务。1954年4月被捕，并被判处徒刑六个月。1957年8月大选时，人民进步党再次获胜，他出任工商部长。——译者

德，似乎都沒有什麼很好的理由可說。”

下面是金斯萊·馬丁關於喀拉拉邦的報告，我們對於他這段報告是會感到興趣的，同時也會認為是中肯的。當時馬丁正在訪問喀拉拉邦的一個英國人的種植園，由歐洲籍的經理陪同他參觀。馬丁說：“我問起他在勞工方面遇到了什麼問題。他說，根本就沒有什麼使他頭痛的事。不過，一兩年以前在附近的農場里曾經發生過一些糾紛。他又說，今天的工人都得到很好的待遇，給他們的暫定報酬是一盧比十二個半安。他與那位曾把這種報酬說成是令人憤慨的事的印度籍管理人不同，看來他似乎由於他手下的那些男女採摘工人感到相當滿意而覺得很高興。”

因此，難怪南布迪里巴德在那次受到全印度新聞界人士歡迎的令人感到痛快的答辯中，把施里曼·納拉揚的報告稱為“連篇累牘的謊言”，同時又說這些“所謂的報告”全部是從那些“製造謊言”的人那里搜集來的。德里一家日報的特派代表在報導南布迪里巴德和司法部長克里斯納·艾雅在首都舉行的聯合記者招待會時，說道：“事實上，除了他顯然不大歡喜提起國大黨總書記施里曼·納拉揚以外，南布迪里巴德先生的看法完全可能出自任何一位開明的國大黨領袖之口。”這位特派代表又說：“他（南布迪里巴德）讓那位看起來非常年輕的司法部長克里斯納·艾雅來說明那種有關喀拉拉邦法紀無存的強詞奪理的濫調。艾雅先生描述這些報告說：‘如果你信仰宗教，這些報告就是褻瀆神明；如果你對中傷有任何認識，這些報告就是毀謗。……’就在這時，南布迪里巴德先生就像事先經過排演一樣，立刻插嘴說道：‘如果你是一個人，這些報告就是一片彌天大謊。’”

在德維科倫，有關法紀無存的謊言已經全部被埋葬掉。

正像南布迪里巴德 5 月 20 日在特里凡得琅对印度新聞社的特派記者解釋德維科倫的胜利时所說的：“第一，我們約莫在一年以前就开始实行新警察政策，使这个选区的种植园工人得到了解救，这正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长期以来，他們一向是历届政府警察政策的牺牲者。因此，我把这次投票看作是对我們的新警察政策所投的票。我希望我們的反对者，至少从現在起不再說什么人民之間存在着‘一种不安全感’。如果这种感觉曾經存在过的話，早就会使这个选区的选民投国大党的票了。”

## 七 印度国内反动势力的伎俩

到了1957年10月中旬，有关法纪的叫嚣终于被彻底揭穿了：这种叫嚣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及其在各政党中的支持者所散布的无耻谎言罢了。那些一心想要推翻共产党政府的人们都失望了。不过，这种失望并没有能使沉迷在毁谤运动中的人们反躬自省。尽管共产党政府在宪法范围内恪尽职守，既得利益集团仍然把它看作是一种危险，因此他们决不甘心，而想尽一切办法来推翻它。这种情况，人们原是了解的；但是当人们看到主要的反对党——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所特具的那种不肯罢休的仇视和敌对态度时，仍不免感到惊讶。

从10月起，既得利益集团在共产党政府部长所到的地方举行黑旗示威游行以示反对，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向部长提交备忘录的借口下，国大党人或人民社会党人竟会横拦在部长的汽车前面，挡住去路。在这种盲目的狂乱行为中，他们竟拦阻了英国高级专员游历时所乘的汽车，以为它是某位部长的。当警察把他们拉开要他们为汽车让路时，他们就大嚷“共产党暴行”，接着一部分报纸就绘声绘色地渲染起来。

在这种示威游行中，他们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部长喊出了最下流、最粗野的口号。“清白的妇女们当心呀，部长们来啦！”就是这种口号中的一个；“我们不要口吃的人和瘸子所组成的政府！”也是这种口号中的一个。他们把劳工部长叫

做“凶暴的托馬斯”，又把博学的教育部长叫做“白痴蒙达塞利”。

应该注意的是，上面所提到的口号是仅有的几个可以见人的例子。在表现这种下流趣味时，各家报纸也都一马当先，唯恐后人。下面是报纸头条大标题的几个例子：“笨驴在嘶叫，走狗在狂吠；人民的圣殿变成了野兽的巢穴”（这指的是喀拉拉邦议会）；“喀拉拉邦共产党人颠狂、下流”；“喀拉拉邦的秘密警察将效法俄国”；“南布迪里巴德用拉札卡尔(Razakar)<sup>①</sup>的语言说话”；“我们菜园子里的眼镜蛇”。

报刊的社评作家也在同一个泥沼里打滚。我们不妨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在这些妖魔鬼怪前来统治我们以前，这里是一片昇平和安宁的气象……。但是这些过去遗留下来的祸害一旦掌握政权的时候，事情就变了样了。事情是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的。他们明确而不容怀疑地表示，他们和他们那帮该死的党羽是高居法律之上的……。我们已被圈在与外界隔绝的地区里，或者说我们已经变成绑在刑具上受九尾鞭抽打的奴隶。”（1957年12月8日“喀拉拉邦邮报”）

应该注意，这些“被圈在与外界隔绝的地区”中的可怜虫竟能在埃纳库兰姆发行的周报上发表上述滥言，而埃纳库兰姆就是在那批“该死的妖魔鬼怪”所统治的喀拉拉邦里！

我们必须弄清楚，这家周报是爱国大党支持的。我们并不是从马拉雅兰姆的报纸上引证上述的言论，因为这地方的许多报纸的标准是不够高的。事实上，喀拉拉邦国大

<sup>①</sup> 过去海德拉巴士王的武装部队。——译者

党人的发言越来越具有煽惑性，刺激人民去胡作非为和使用暴力。南布迪里巴德在特里凡得琅以质責的口吻說道：“我准备选择一些有关邦内著名国大党領袖所发表的演說的报纸报导，送交总理或国大党主席德巴去审阅。让他们来判断一下这些言論是否构成一种煽动暴力的行为。”（見1957年12月11日“印度快报”。）接着南布迪里巴德又說：“我曾亲耳听到有人喊过‘当心你的脑袋，南布迪里巴德！’我也曾听到我的朋友們告訴我，在国大党著名領袖所领导的示威游行中，人們也喊出了一些含有挑衅意味的口号。如果把国大党所领导的这些示威游行中所喊过的煽动口号搜集在一起，那末对任何民主組織來說，这都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更不必說那些曾經宣誓不采用暴力的領袖所领导的团体了。”

事实的真相是，这种反对共产党部长的深仇大恨和盲目地反共思想就是喀拉拉邦反对党策略背后的推动力量。眼看共产党坐在权力的宝座上，是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領袖所不能容忍的；当他们大权在握的时候，曾經监禁和用警棍毆打过这些共产党人，并斥責和辱罵他们是为社会所不容的暴民。在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执政期間，他們曾任意使用武力、警棍和枪械，而現在这些“相信暴力的”共产党甚至在受到最严重的挑衅以后，也拒絕使用邦的武装力量。正象喀拉拉邦首席部长1957年9月15日在馬德拉斯邦对新聞記者所說的，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永远不会采取那种“甚至在今天还在拉吉普尔、德里以及其他地方造成开枪射击事件”的政策。接着他宣称：“如果采用这种政策是一条法律，那末我們就要廢除这条法律，”接着他又說，如果人民在这个問題上叫共产党下台，共产党就下台，然后再为这个問

題进行斗争。

这个丝毫不夹杂任何其他成份的民主政策使反对党疯狂起来了，他们的新策略是通过某种办法去刺激政府使用警察的助力。事实上，有好几次，他们曾公然宣称要看一看共产党政府不利用警察助力的政策究竟能实行多久，不利用警棍和枪械的作法究竟能支持多久。

反对党的态度既然是这样，于是他们便利用各式各样的借口，企图“使反对共产党政府的情绪始终保持鼎沸宣腾的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用的主要行动便是卡塔姆帕利的不合作运动，问题的发生只不过是出于堪南诺尔中央监狱附近的一块七呎大小的公地。许多年来，未经许可便占有公地的事件，一直在发生。在新政府就职以后，这类事件还继续出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许比过去更严重了。为了结束这种不合法的行为，共产党政府决定采取一种把政府所拥有的可耕荒地有计划地分配给无地和贫苦的农民的政策。在和地区税务官磋商妥当以后，政府便在宣布这项决策的同时，禁止采取任何行动去驱逐在4月26日以前未经许可而私占公地的人。政府又颁布了一项命令，严禁今后私占公地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只能破坏政府把土地分配给那些理应领取土地的人们的计划。

在政府宣布了这项决定以后，反对党的领导集团忽然想起要组织一次非法侵占公地的运动，他们狡猾地把这种行径当作攻击政府的“双刃”武器。如果政府不采取任何行动，那末他们就可以大嚷“法纪荡然”；如果政府果真采取行动，他们又可以大声疾呼，说什么共产党政府“压迫”穷苦人民。

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革命社会党的领袖诸公果真组

織了这样一次非法侵占公地的运动，而政府也的确及时采取了行动把这批侵占者驅逐出去。在查瓦拉（奎隆县）、特里凡得琅稅务区以及其他一些县里，未經許可而私占土地的人都被驅逐了出去。

1957年7月15日在邦議會中，政府在反对党探口風的情况下，就分配卡塔姆帕利公地的問題作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回答；政府說，它正在积极考虑这个問題中。这是一件值得注意，而且也很有趣的事，因为沒出三个星期，一位国大党負責領袖（邦議會議員康汉普）便在1957年8月7日組織賤民非法侵占公地，蓄意为共产党政府制造困难。

我們同时應該記住，在1947至1957年国大党政府統治的十个年头中，該党政府始終就沒有一次实行过把政府的荒地分配給賤民、其他无地的劳动者以及穷苦农民的政策，虽然他們都有这种要求。国大党人在印度其他各邦自然都沒有发动这种侵占政府土地的运动。

在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慫恿下，有四十二家賤民移入了卡塔姆帕利的公地上。司法部长亲自会見了他們，向他們解釋这块土地是用来建筑政府机构的，其中还包括一个儿童游戏場。接着，除了九家以外，其余各家便出面針對卡塔姆帕利这一事件大肆叫囂起来，說这是“共产党暴行”。開場鑼鼓打得震天响，同时办事周到的人民社会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又指示举行一个“卡塔姆帕利日”，不过，到底有几个地方真正举行了，人們就不得而知了。

在这个問題上，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无耻透頂，讀者可以从下列事实中看到。在这九戶賤民中，大半戶数都在附近亲国大党地主的庄园上有自己的住处。由此可見，这是一个一箭双鵰的妙策。这样亲国大党的地主就可以把这



些寄居在自己土地上的賤民驅逐出去，否則他們是无法赶走这批賤民的，因为政府的禁止夺佃立法不允許这样做。而另一方面，这宗交易又提供了毀謗和中伤他們所痛恨的共产党的大好机会。

不久，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这段毫无实际内容的公案便彻底暴露在馬拉雅利族人民的面前，而整个事件也进一步使这些声势日落的政党在喀拉拉邦丧尽威信。当地的一百二十戶賤民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揭露了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宣傳。“不合作运动”絕大部分是由拿錢雇来的人和“克里斯托弗”队员所組成的，其中簡直就沒有賤民。为了挑衅，那些宣誓“不采取暴力行动”的人們都浸沉在暴力中了。在一場激烈而令人难以容忍的乱擲石头的騷乱以后，警察一度不得不利用警棍稍事彈压。于是报纸便把这种行为說成是“开枪”，因为这时恰好有几声鞭炮的响声。国大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洋洋得意起来了，因为他們至少已經使共产党“开枪”和利用“警棍”了。

卡塔姆帕利的“不合作运动”是以不平凡的鑼鼓声开場的，但是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的机智，这种机智在每一点上一直打击着喀拉拉邦国大党。共产党政府向九戶非法侵入政府土地的賤民解釋了全部情况，随后这九戶賤民同意迁回原来的住处。但是那些亲国大党的地主竟把棚屋鎖了起来，不准他們搬回去。共产党政府告訴他們說，按照法律这种驅逐行为是不允許的，同时答应免費給予法律帮助，使他們重新得到迁回原来棚屋居住的权利。这九戶賤民同意了这种做法。

共产党政府处理問題的办法使“不合作运动”失去了立足的余地，于是反对党便設法向政府謀求協議。共产党政

府永远是願意用和平方式来解决所有爭端的，因此，便立刻釋放了所有被捕的人。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南布迪里巴德真誠地對於在卡塔姆帕利使用警察力量表示遺憾，不過他也指出，國大黨和人民社會黨當時的做法是令人難以容忍的，要求他們理智一些。

喀拉拉邦國大黨為反對共產黨政府而策動的每一項陰謀都被擊敗和揭穿，因而他們的士氣自然也就低落下去了，而且下降到空前未有的最低點。就在這個時候，那位反共十字軍戰士——施里曼·納拉揚再一次在喀拉拉邦出頭露面。

國大黨執行委員會在埃納庫蘭姆召開的會議顯然是在施里曼·納拉揚的指導下進行的；這次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再一次發表了“法紀無存”的連篇鬼話。這項武斷的決議虛偽和空洞到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地步。喀拉拉邦政府再一次被指控“在公共生活中有煽惑使用暴力的趨向”。這項決議硬說：“共產黨政府蓄意對公務人員施加政治壓力”，又說，在共產黨統治的八個月里，“人民一直在受暴力和無法紀的折磨。”這項決議號召人民對“共產黨破壞印度憲法所保證的民主自由的囂張行為”提出抗議，因為“如果這種使用暴力的傾向不及時加以制止，整個和平的生活將成為不可能，而一個危險的局面也將隨之產生”。

因此，為了“及時制止採用暴力的傾向”，同時為了保證“和平的生活”，一幕戲劇就這樣在喀拉拉邦上演了。就這幕戲的演技和無恥來說，在印度還是首屈一指的。

反對黨策劃了一次收買共產黨邦議會議員的陰謀。他們向共產黨的一些議員各出十萬盧比，企圖誘使他們倒戈，以便在1957年12月12日開幕的邦議會冬季會議上通過

对南布迪里巴德內閣的不信任案。这是一个肮脏的阴谋，邦議員尔·巴拉克里斯納·皮萊揭露了这一阴谋，同时指出某些非常有势力的人物阴谋推翻共产党政府。限于篇幅，这里不能引述巴拉克里斯納·皮萊那篇詳尽的声明。不过，我們可以談一談这篇声明所揭示的两点。第一，这篇声明显示了共产党人如何机智地对付了那些企图收买他們的人。直到最后一刹那，那些阴谋家还絲毫不知道那些共产党邦議會議員是和党保持着密切联系的，他們故意摆出一付姿态，以便找出誰是这次阴谋背后的出錢老板和主謀者。事实上，这批阴谋者把“及时制止采用暴力的傾向”和保証“和平的生活”看作非常有把握的事，以至在12月9日，也就是全部阴谋被揭穿的头一天，一个以喀拉拉邦的一位老政客为首的在野党內閣已經組織成功了，这个“內閣”是以“民主党派”——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联合为基础的。甚至连部长的职位也已經內定下来了，他們一切准备停当，专等12月10日，也就是在邦議會議員提交“辞职书”的时候，宣誓上任。

第二，这个卑鄙无耻的阴谋也說明了反动既得利益集团在盲目仇視共产党的情緒中，究竟能走到什么地步，同时也說明了，他們在利用肮脏的手段企图推翻一个由群众选出、根据宪法办事的政府的奔忙中，究竟能堕落到什么程度。

在这一无耻的阴谋被揭穿以后，喀拉拉邦首席部长指控国大党也卷进了企图用收买的办法拉走共产党的一些議員，以削減政府在邦議会的多数席位。这一指控使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员会主席克·阿·达莫达拉·梅农感到痛彻骨髓，他說这一指控是“荒唐的”，并且要求喀拉拉邦首席部长

証明他的論斷。

一家在特里凡得琅发行的英文周刊——“新喀拉拉邦”——的記者詳盡地发表了一些“历史性的資料，这些資料涉及到以国大党为积极参加者的反喀拉拉邦政府的活動”。應該注意，这位記者的資料是从在科齐科德地方发行的著名的国大党報紙“祖国报”的許多报道里搜集来的。我們不揣冒昧把“新喀拉拉邦”周刊記者那篇确凿的、說明真相的揭发全文引証如下：

“(一)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書記施里曼·納拉揚·阿加瓦尔先生于1957年12月4日抵达埃納庫兰姆（1958年12月5日‘祖国报’的报道）。

“(二)同日，施里曼·納拉揚参加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和喀拉拉邦国大党議會党团的联席會議，會議通过決議一項，其中引証特拉凡哥尔—柯欽地区医学协会之決議，并号召人民起而拯救民主（1957年12月6日‘祖国报’的报道）。

“(三)次日（1957年12月5日），施里曼·納拉揚先生在阿力培与人民社会党領袖巴頓·丹努·皮萊先生就反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成立国大党—人民社会党联盟問題举行秘密會談。据悉邦議會反对党領袖普·特·查科先生亦曾参与这次會談（1957年12月7日‘祖国报’的报道）。

“(四)据悉为达到共同之目的，即推翻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而准备采用之步驟已在會談中作出決定。該邦邦长将取得一份議員名單，說明邦議會中大多数議員均主張成立国大党—人民社会党联合政府（閣員席位中有四、五位議員已被‘拉过去’），并要求邦长下令組閣。詳細計劃业經全部拟就，即部长人选亦已內定。至于此次非暴力政变之时

間將按南方地区委员会举行會議之預定日程安排，俾联邦內政部长潘特(国大党要人)能于新人民社会党—国大党联合政府宣誓就职时亲临参加。

“(五) 12月5日深夜，施里曼·納拉揚返回埃納庫兰姆后，又与国大党高級領袖作进一步商談，参加會談者有帕南帕利·戈温达·梅农先生和戈文丹·奈尔先生。

“(六) 国大党总書記于1957年12月6日飞返德里前，曾在埃納庫兰姆举行記者招待会，声称喀拉拉邦許多地方曾发生暴力行动。总書記指出此类暴力行动均含有政治意义，为在印度其他省邦执政之国大党政府所不允許者，而喀拉拉邦共产党竟鼓励共产党人用暴力对待其政敌(1957年12月8日‘祖国报’的报道)。

“(七) 与此同时，国大党联邦議会党团于1957年12月6日在新德里举行特別會議，由喀拉拉邦国大党邦議会議員报告該邦之‘发展情况’。会上发言者有柯塔揚姆国大党邦委员会主席普·克·怯里安等人士。联邦內政部长亦曾出席此次會議(1957年12月8日‘祖国报’的报道)。

“(八) 12月8日，施里曼·納拉揚先生返抵德里。

“(九) 1957年12月10日‘印度斯坦时报’以三栏篇幅刊登該报特派記者于12月9日从德里发出的一項消息。茲將該項消息全文引証如下：

### 无党派人士有倒戈之势

#### 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面临威胁

据新德里星期一电訊，喀拉拉邦議会各反对党正积极从事推翻共产党政府之活动，共产党之議会多数席位有两面受威胁之危險。

据悉支持南布迪里巴德之五位无党派人士中，已

有两位改变政見，預料将在邦議會下届會議中倒戈。

此外，国大党与人民社会党已采取积极步驟，就选举問題致致諒解，避免在将来补缺选举中发生竞争現象。据有关方面称，此即印度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总书记施里曼·納拉揚先生与喀拉拉邦人民社会党領袖巴頓·丹努·皮萊先生最近举行會談之結果。

根据选举法庭所作之裁決判断，此項諒解具有重大意义。該裁決已取消两位議員之席位，其一屬於执政党，另一屬於反对党。各該取消資格之議員，已就該法庭裁決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

“直到 1957 年 12 月 11 日，喀拉拉邦的公众才第一次听到这个企图推翻他們所选出的政府的陰謀，这时报纸刊登了共产党邦議會議員巴拉克里納·皮萊先生揭发有关企图收买他本人和另外四位議員退出邦議会的駭人听闻的消息。

“在施里曼·納拉揚返抵德里的第二天，‘印度斯坦时报’就已經获悉了这件事，該报是从深信这次陰謀必然会成功的方面获得这项消息的，因此該报便发出了特訊。

“人民，特别是喀拉拉邦的人民，并不需要具备許多政治知識，便会得出結論，对于这次陰謀，喀拉拉邦国大党无法摆脱干系。”

## 八 灌溉計劃和電力發展

共產黨人並沒有由於種種旨在推翻他們的統治的嘗試和陰謀而躊躇不前，他們對於邦內群眾的支持滿懷信心，為了履行他們在選舉中向人民所作的保證而繼續努力。在邦內的所有政黨中，只有共產黨為建設喀拉拉邦的經濟擬訂了一份計劃大綱。

1956年6月共產黨在喀拉拉邦召開的會議以及後來共產黨邦委員會發表的競選宣言都指出，在喀拉拉邦所擁有的全部自然資源中，河流居于最首要的地位。喀拉拉邦共有二十六條河流之多，每一條河流都可以利用來發電、灌溉、航行和作別的用處。共產黨邦委員會的競選宣言曾說過，如果當選執政，共產黨政府就一定“進行詳盡的勘測工作，擬訂一份有關灌溉和水力發電的計劃，以便充分而又恰當地利用喀拉拉邦所有的河流水力資源”。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以前，喀拉拉邦並沒有主要的灌溉計劃。據估計在四百三十萬畝的耕地中，約有七十四萬四千畝左右已經利用渠道、池塘、水井等等進行灌溉。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估計造價達一億四千四百七十萬盧比的八大灌溉工程已着手進行，以滿足整個地區的二十八萬一千畝稻田的需要。這八大灌溉工程是：馬拉姆普茲哈工程、瓦拉伊雅水庫工程、曼加拉姆水庫工程、皮契工程、恰拉庫迪（第一階段）工程、伐茲漢尼工程、丘坦納德（叟塔帕萊）工程以及尼伊亞爾（第一階段）工程。不過，在第一個五年計

划期間，上述工程沒有一項完成，这主要是由于政府的不穩定，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原因。在一亿四千四百七十万卢比的預算支出中，已有一亿零四百一十萬卢比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用掉了。在省邦重划以后，某种程度的扩充和改进已經成为可能，因此，上述工程的估价改为一亿六千六百六十萬卢比，同时受益的面积估計也可以提高为三十二萬四千畝。共产党政府特別关怀这几項工程的完成，預計早在第二个五年計劃完成之前，就可以提前完成这些工程。

除了这些計劃以外，第二个五年計劃还包括三項新的工程，这就是明卡拉、契拉庫茲希以及珀里雅流域三处的工程。这三項工程可以灌溉七萬二千九百六十畝的土地，估計需要四千五百二十萬卢比，为了这三項工程，另外又补发了三千万卢比。后来，由于共产党政府的努力，第二个五年計劃又增加了三項工程，这就是卡塔姆帕利、帕桑第以及散尼尔馬康姆威水壩三处工程，并补发一千七百一十萬卢比。

这样，目前邦內計有十四項重大灌溉工程在不同阶段上进行着，所需費用計二亿四千万卢比，受益土地面积达四十一萬畝。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喀拉拉邦需要进行灌溉的面积是非常大的。在全部土地中，可供种稻的約有二百五十萬畝。在这一面积中，实际耕种的有一百九十五萬四千畝，实际得到灌溉的只有八十一萬一千畝。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可耕地需要用某种人工灌溉的方法进行灌溉，这样便能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双季甚至三季作物，同时也可便于进行密集耕作。目前米的产量是八十九萬二千万吨，一般还缺少七十万吨之譜。共产党政府进行了仔細的研究，认为生产很容易就能加倍提高，不仅可以消灭不足的现象，而且还能略有剩



余。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喀拉拉邦政府决定对喀拉拉邦的水力资源进行勘察，找出充分利用这种水力资源的可能性。为了研究利用喀拉拉邦全部河流水力的可能性，一些独立的调查小组已经建立起来了。共产党政府的最終目的是拟訂一个邦的总灌溉规划。中央水力电力委员会的灌溉设计委员克·克·拉奥博士指导工程师們进行搜集、整理和组织资料的工作。目的是拟訂一項发展电力、灌溉和航行的綜合性计划。

喀拉拉邦 1958—1959 年度的預算为七項新计划的准备工作提供一笔十八万卢比的款項。这些计划还没有得到计划委员会的批准。这些计划一共需要两亿卢比左右，預計可以灌溉将近二十五万畝的土地。

喀拉拉邦把印度政府所謂的次要灌溉工程——造价低于一百万卢比的灌溉工程——划分成中等、較次要、次要几类。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間，为中等工程和較次要工程撥出了一千三百三十六万卢比，前項工程計八百六十万卢比，后者計四百七十六万卢比，同时又为次要工程撥出了一笔小的款項。

通过乡議會进行的次要灌溉工程計有經費七百二十万卢比。计划兴建的工程共有九十五处，这些工程的受益面积为八万九千畝。不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中，也就是在总統直接統治的时候，所能运用的款項只有四十五万卢比。共产党政府执政后，立刻便在这方面大力推进。迄至目前为止，大約有八十項工程經过了調查而且得到了批准，有四十三項工程已經开工。預計 1957—1958 年度的修訂預算是一百九十三万四千卢比。1958—1959 年度的預

算为实施七項新工程提供了二百三十五万卢比。

在喀拉拉邦,另外一种重要灌溉的方法是“揚水灌溉”。喀拉拉邦的地形和其他条件适于从四季水流不断的河床中把水抽起来,进行大面积的灌溉。在第一个五年計劃中,已經兴修并完成了五十五項揚水灌溉工程,造价达二百二十万卢比,可以灌溉一万一千畝。不过这些工程都是在阿威依附近的帕里雅河流域。

但是,水利部門的顧問团认为这些工程不經濟,特别是在有关增收水利特稅的立法还没有制訂的时候,更不經濟。因此顧問团便采取了暫緩进行的政策,同时指示对整个問題重新进行研究。

共产党政府沒有批准这种做法,因而改变了顧問团的政策。政府决定在揚水灌溉方面大力进行,同时也要求受益的人繳納特稅。所有的旧計劃已經恢复,同时新的計劃也已經开始。这样,除了已經完成的五十五項工程以外,又有三十項新的工程正在进行,很可能在1958年6月底完成。这些工程需款一百五十万卢比,受益的土地达九千畝左右。每年用在新的揚水灌溉工程上的費用可能达到二百五十万卢比之譜。預料过一些时候,当揚水灌溉工程順利地进行灌溉以后,可以逐步使农民承担这些設備的管理和运轉責任,这样这种灌溉設備在开支上就更加經濟并可以自給自足。目前政府已經制訂了一項計劃,而且已經付諸实施,旨在鼓励农业合作社兴建小型揚水灌溉工程,并利用政府的援助和津貼来維持这些工程。預料經過一段時間,揚水灌溉工程可以显示出惊人的結果,粮食作物不但可以增产,經濟作物产量也可以提高。

由于喀拉拉邦西部山地的地形和非常丰富的雨量,邦

內大多數河流都蘊藏着豐富的水力，而這些水力又可以非常經濟地加以發展。一項切合實際的有關水力發電資源的查定說明，可以在每瓩設備能力造價為六百五十到八百五十盧比的代價下，使電力發展到二百二十五萬瓩。不過，水利部長弗·爾·克里斯納·艾雅於1958年2月3日在散尼爾馬康姆灌溉工程的調節裝置工程開工典禮時致詞說：“對這種豐富的潛在能力，我們的開發工作還沒有達到十分之一。”他主張組成一個包括馬德拉斯、安得拉、買索爾以及喀拉拉邦在內的、把各邦電力系統聯繫起來的南部發電網，“這樣我們喀拉拉邦便能夠向南部各個需要電力的邦輸送電力，只要我們的埃迪基、潘巴、索拉雅三項巨大工程是從全國着眼，同時又注意到區域發展的。”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特拉凡哥爾—柯欽地區已經有七百四十四個新村庄電氣化了，有電力消費者五萬一千四百五十六人和街道照明電燈一萬七千五百盞。發電能力從二萬八千五百瓩增加到八萬五千五百瓩，每年所發的電力也從一億五千一萬萬度提高到三億五千萬度。從過去的經驗來看，邦內對電力的需要每五年就增加一倍。因此，第二個五年計劃就必須滿足這個日益增長的需要。

在第二個五年計劃中，已經分配二億三千六百萬盧比作為電力發展之用。其中一億一千二百萬盧比將用在水力發電工程上，其餘的款項則用在有關進一步發展輸送和分配電力網以及農村電氣化的工程上。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要完成的新水力發電工程有奈里阿曼加拉姆、潘尼厄、和索拉雅三處。這些工程計劃將為邦的電力系統增加十二萬九千瓩的發電能力。另外一套八千瓩的發電設備的安裝工程也要在這段期間內完成。當這些工程完成以後，電力系

統的总設備能力将达到二十四万六千五百瓩，这将足以滿足預計的需要。同一期間也計劃开始潘巴水力发电工程，这将成为邦內最大的工程之一。这项工程的最后設備能力是三十万瓩，将分两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即发电十万瓩的工程，将立刻开始，計劃在第三个五年計劃的初期完工。第二个五年計劃也規定勘测若干新的水力发电工程。

第二个五年計劃所包括的电力輸送和分配計劃仍旧是优先完成电力分配和农村电气化工程，在这兩項工程上将要动用将近七千六百三十万卢比。又将有一千三百四十四個农村地区将得到电力的供应。另外又将有十万零五千二百六十个消費者和这个电力系统建立联系。一个另外安装五万零九百九十五盞路灯的綜合性計劃也将包括在工程之內。

第二个五年計劃已經飞跃般地开始了，帕林加耳庫素地方的三套发电設備——每套发电能力为八千瓩——已經在第二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年底投入生产了。佩利伐薩耳和森古拉姆两处水力发电工程的各种結束工作也已經完成。奈里阿曼加拉姆、潘尼厄、索拉雅的水力发电工程正全面施工中。几項电力輸送和分配工程也在順利地进行中。从森古拉姆到佩娄姆，再从佩娄姆到孔达拉长达一百八十电路哩的一百千伏电压的輸送干綫也已經敷設完毕，而且在第二个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已經送电。虽然这几項工程都包括在第一个五年計劃以內，而且是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开工的，但是这些工程的各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在第二个五年計劃期間完成的。

在第一个五年計劃結束的时候，邦內的年发电量已經从三亿五千万度增加到四亿三千万度。将近有四千个大、

中、小型工业单位都由这个电力系统得到电力的供应。用电力抽水机在水涝地区排水的工作也开始了。这样，仅仅在喀拉拉邦的丘坦納德和柯里地区，便已有将近七万畝水涝地变成了可耕地。三万畝左右土地上的揚水灌溉設備也得到了电力供应。現在邦內已經有一千二百个农村享受着电力的便利，滿足了大約十万零二千六百个消費者的需要。到了現在，計劃用在电力輸送、分配和农村电气化上的一亿二千一百九十萬卢比中，已經使用了三千四百四十萬卢比。迄至目前为止，在电力工程上，已經动用了—千五百六十萬卢比左右。

第二个五年計劃目前所提供的发电能力恰好够滿足日益增长的需要，如果在任何一項工程的施工中发生任何障碍，就会为电力供应造成困难，而且很可能产生严重的缺乏电力的現象。有必要立刻采取的两項步驟是：(一) 发放电力站和某些其他建筑工厂所需要的外汇，以便进行潘尼厄工程；(二) 迅速解决馬德拉斯邦政府提出的关于那項拥有五万四千瓩設備能力的索拉雅水力发电工程的爭执問題。

这些問題的順利解决取决于中央政府和馬德拉斯邦政府，但喀拉拉邦政府也正为这些問題进行协商。

另一个問題是着手进行埃迪基工程。喀拉拉邦政府的发言人曾数度表示遺憾說，虽然喀拉拉邦拥有廉价的水力資源，但是为喀拉拉邦兴建任何巨大的水力发电工程却始終沒有考虑到，这种工程不但能使喀拉拉邦，而且还能使临近各邦获益。喀拉拉邦政府目前已經获得中央水利和电力委员会同意，会同邦的工程师，对埃迪基工程进行詳細的勘察。完成这种勘察工作看来还需要一些時間——預料只有到明年才能获得結果，但是估計這項工程的成效所需要的

主要資料都已齊備。這項工程的潛在能力是五十萬瓩，可靠的發電能力將達四十二萬瓩，因而將能證明是一項非常經濟的發電工程。共產黨政府正敦促中央水利和電力部積極考慮着手興建這個電力站和以四百千伏或更高的電壓將一部分電力從這個電力站輸送到薩蘭附近某處的問題。與此同時，喀拉拉邦政府也與中央政府就建立南部特高壓發電站的建議進行商談。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共產黨政府認識到發展水力資源在喀拉拉邦經濟中的決定性作用，因而對這一方面給與了莫大的重視，而且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 九 共产党政府的土地政策

共产党政府就职后不久便宣布把政府現有的全部土地永久分配給无地和貧苦的农民耕种,以提高农业产量,并尽量使沒有土地的农户能够定居下来。根据初步估計,政府共有七十五万畝可耕荒地和其他未耕地,其中还不包括林地。

政府在9月14日发布命令,把政府所有的土地分配給邦内无地和貧苦的家庭。这项命令指示,凡是政府或公共事业所不需要的土地均按登記名册予以分配,凡政府或公共事业将来可能需用的土地則通过短期租借或特許方式供給农民耕种。在每一个农村的現有土地中,至少要保留25%的土地供政府将来使用。城市范围内的土地則不受此项命令的約束。

此外,政府还命令,在可分配的土地中,要保留25%分配給已按計劃登記的表列种姓<sup>①</sup>家庭。

此项命令說,在平原地区,每一家庭所能分到的水田将不超过一畝或旱田不超过三畝;在山区,水田不超过二畝或旱田不超过五畝。命令規定,凡領取土地的人自己拥有一

<sup>①</sup> 印度的种姓原有四个,即婆罗門(僧侶、教师等)、刹帝利(統治者、武士)、吠舍(商业和銀錢业者)、首陀罗(雇农及其他劳动者),但随着社会經济的发展,各种姓内又分成許多种姓。各种姓之間界限极严,如不能通婚、往来等。1950年印度国会曾通过廢除种姓制度的議案,但这种制度实际上仍沒有清除,特別是在农村中。这里所說的表列种姓是印度最低层种姓“賤民”,也被辱称为“不可接触者”。——譯者

些土地，而他对这些土地享有所有权或根据拟议中的土地改革享有租佃保证权或其租佃权将得到确定者，则在许可其登记时，应将这些土地计算在内，而只配给不足限额的部分。

此项命令又规定，凡根据此项计划分得土地者，不得将土地出售、抵押、出租、赠送或通过其他方式转让，但所分得的土地可以由子女继承。如违反此项规定，即行收回所分配之土地。此外，凡拥有超过限额的土地而不上缴政府者，均不得登记。政府将来可能加以利用的土地，将租给落后村社的成员和贫苦的家庭，但每户最多不超过三亩，租佃期限每次不超过两年。

最后，在决定领取土地者的资格时，为了保证作到民主，共产党政府命令在每一个税区成立谘询委员会。

从分配土地这一名词的真正意义来说，这正是在印度实行大规模土地分配的第一次尝试。

喀拉拉邦政府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激进的土地政策，是由于该邦有在强大的农民协会的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人民。这个运动是由共产党创导和发展起来的，并曾为农民的权利进行过多次光荣的斗争。不仅如此，这个运动是由南布迪里巴德领导的，他以精通印度土地问题而著称，也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优秀的一位作家，同时又是全印农民协会的一位领袖。

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就职后不久，就注意到制订一项全面的土地立法。喀拉拉邦人民对土地的迫切要求以及土地占有的极端不平衡现象是人所共知的。马拉巴租佃委员会(1938年)根据综合性的统计资料估计，在马拉巴，价值七千万卢比的农产品中就有三千来万作为地租落到地主的腰



包中去。这还不算，农民还要负担偿付债主利息的重担，这种利息的平均率高达10%，总额計为一千五百万卢比。甚至到了今天，馬拉巴的情况仍然未变。特拉凡哥尔和柯欽地区的情况也沒有什么不同，在这两个地区，农产品总值的一半以上是作为地租和利息落到地主和高利貸者的手中。

在这种以土地进行剝削的制度盛行的情况下，必須針對土地問題的各个方面，深思熟慮，找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共产党政府就职还不到两个月，便举行了一次共产党邦委员会和共产党議會党团的联席會議，討論喀拉拉邦土地立法的綱領。报纸报道了有关这次會議的情况，于是邦內的地主便恐慌起来了。他們按照老一套成立了自己的組織，大嚷大叫，反对拟議中的土地法案。喀拉拉邦地主协会副主席德·赫·南布第利帕得甚至还率領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德里，去会見潘迪特·潘特、格·耳·南达以及弗·特·克里希納馬查里。

共产党政府从其他邦的經驗中获得了教益，于是便在1957年8月26日发布命令，禁止一切夺佃行为，因为在那些邦里，地主們預見到拟議中的土地改革法案即将制定，便事先采取了大規模夺佃的步驟来阻止佃农由于耕种他們的土地而获得权利。不久，1957年的喀拉拉邦禁止夺佃法案就制定出来了。法案規定，在土地改革立法未制訂前，土地占有者和土地耕种者的現狀应予維持。对于佃农、寄居在地主土地上的农户、按照伐娄姆(Varom)、散巴帕通(Sambalpatom)或其他制度种地的人們，法案都給予了暂时但是可靠的保障。法案的有效期限原訂为1957年10月11日，但是政府又下令延长六个月。到了1958年3月，邦議會又进一步延长了該法案的有效期限，并作出了若干修正。

我們有必要簡單地談一談共产党政府的這項法案。這項法案是以它的尖銳而明確的規定而著称的，它有效地制止了喀拉拉邦的夺佃行为。我們知道，夺佃行为实质上是一笔勾銷了国大党政府在印度各邦采取土地改革措施后为农民所带来的全部利益。正像联邦計劃部部长格·耳·南达在提交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會議的一份备忘录中所說的，在孟买，受保护的佃农只有 3.2% 能够购买他們所耕种的土地而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在海得拉巴，从 1951 到 1955 年，受保护的佃农人数竟减少了 57%，而他們所占有的土地則减少了 59%；在孟买，从 1949 到 1953 年，繼續保有土地的佃农所持有的土地只相当于原来租佃面积的 58.1%。正像南达所說的，“在絕大多数的情况下，佃农并没有訴諸法律；他們交出了土地，因为地主要收回去。”（見 1957 年 9 月 15 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經濟評論”）

为了把佃戶所租佃的土地固定下来，制止夺佃行为的蔓延，共产党政府制訂了一項有效的法律。在其他各邦，尽管有法律的限制，这种行为还是层出不穷，屡見不鮮。当然，喀拉拉邦這項法案在法律条文上沒有留下漏洞，因而地主无法加以曲解或利用狡猾的办法来进行欺騙。法案中也沒有偏袒既得利益集团的“保留条款”和“豁免事項”。

共产党的禁止夺佃法案比 1950 年国大党政府所制定的“保留(制止执行判决)法案第八号”要先进得多。前特拉凡哥尔—柯欽邦的這項法案只是制止法庭判决的执行。但是，在法庭之外，地主們却任意摆布，使那些多少年来通过繳納地租而持有土地的实际耕种者都变成了每年訂約一次的耕种者和分益佃农。共产党的這項法案沒有給地主开这样的方便之門，甚至对散巴帕通、庫利帕通(Koolipa-

ttom) 以及其他类似以谷物繳租的分益佃农, 也給予了保障。

喀拉拉邦財政部長克·尔·戈利在契特稅区的卡塔曼杜地方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說, 到那时为止, 已制止的夺佃行为就达到一万四千多起。(見 1957 年 11 月 15 日“印度快报”)

在 1948 年至 1957 年間, 国大党在前特拉凡哥尔邦和柯欽邦的統治, 除了廢止了四項世襲地产权以外, 在土地改革方面簡直就沒有作出任何称得起是土地改革的事。看来他們的唯一成就似乎就是土地稅收政策委员会在 1950 年所发表的一份报告。在該委员会的十一个委員中, 有九位是国大党人, 而沒有一位共产党人。該委员会完全忽視了国大党土地改革委员会的报告中和其他国大党高級組織所发表的声明中的土地政策。該委员会认为, 对現有的土地持有畝数規定一个最高限額是不明智的, 至于未来的土地占有数額, 則必須規定一个五口之家最多不得拥有“五十畝双季稻田、七十五畝单季稻田、五十畝椰子园、七十五畝旱地”, 每增加一人得增加十畝限額, 但总数不得超过一百五十畝。該委员会一方面表示反对为現行的土地持有畝数規定一个最高限額, 但是同时又說, 如果要决定这样做, 就应该按照“目前通行的市場价格”給予补偿。这份报告对于地主为进行“真正的”自种而收回土地所作的規定是很寬大的, 对于收回土地的限制竟松弛到地主很容易就可以欺騙过去的地步。該委员会也沒有就公平地租提出建議。

人民社会党在执政的十个月內, 作出了較好的事情。該党政府所拟定的土地改革法案是进步的, 規定了持有土地的最高限額, 也規定了公平地租等等, 但是对于土地的所

有权却没有作出任何规定。接着上台的帕南帕利(国大党)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结束了普贾尔(Poonjar)、范季普哈(Vanjipuzha)、基利马努(Kilimanoor)和埃达帕利(Edappalli)四项地产世袭权。这些地产世袭权和印度其他地区的“柴明达”(Zamindaris)<sup>①</sup>相像,所不同的只是不向邦政府缴纳任何地租或捐税而已。这四种地产共有十万零四千九百二十五亩。帕南帕利政府还制订了卡纳姆(Kanam)租佃法案。

从历届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的简单叙述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届政府所作的事根本连这个问题的边缘都没有接触到,因而,共产党政府事实上就不得不从头做起。

为了对各个政党的成就作适当的评价,有必要在这里简单地谈一谈喀拉拉邦的土地制度。

在马拉巴,有三种主要的土地所有制,这就是真蒙(Jenmom)、库济喀南姆(Kuzhikanam)和佛劳姆帕汤(Verumpattom)。真蒙就是土地的绝对所有权。享有这种所有权的土地主叫做真密(Jenmi)。在马拉巴,由于英国人在解决税收问题中所采取的权宜办法,所有的土地,甚至林地和山地也不例外,都看作是真密的土地。在库济喀南姆制度下的土地持有者叫做喀南达(Kanamdar),这个名字是从真密演变过来的。他的租佃权一般都是以缴纳地租为前提的十二年为期限的租约。后来许多喀南达把他们的土地租给佛劳姆帕汤达(Verumpattomdar)。佛劳姆帕汤是一种以一年为期的简单租佃制。佛劳姆帕汤达实际上是一种可以随意退租的佃农。他们可以从喀南达租地,也可以直接从真密租

<sup>①</sup> 柴明达是一种法定的世袭地主,又称“中间人”,政府向柴明达收税,而柴明达则向农民收地租。——译者

地。在特拉凡哥尔和柯欽地区，真密制度以及随之产生的喀南达制度一向是这里的傳統土地制度。在这种租佃制度之下，后来又产生了不同的附加制度——佛劳姆帕湯、帕納亞姆(Panayam)、阿奴豪加姆(Anubhogam)等等。

租佃制度的基础就是地租剝削。后来，由于馬拉巴、特拉凡哥尔和柯欽各地区处在不同的政府之下，因而各种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就形形色色，各有不同了。

在英国人統治期間，馬拉巴在有关佃农权利方面有了比較进步的方案。通过 1929 年馬拉巴租佃法案、1946 年馬德拉斯保护佃农和农民法案以及 1951 年馬拉巴租佃法案修正案，各种佃农的租佃权都被确定下来了。不过，也給了地主收回土地的权利。这一权利以及佛劳姆帕湯达需要預付一年的地租以确定其租佃权的規定，却把耕种者本来可以得到的利益大部分都取消了。水田的公平地租由原来占产品的三分之二确定为二分之一，园地的地租也略有减少。不过，当时設立起来的地租法庭却有权根据地主的要求增加地租。感謝馬德拉斯邦議會中馬拉巴地方的共产党議員，由于他們的努力，这个法案又作了有利于佃农的进一步的修訂。地主收回土地的权利受到了限制，佃农的自耕地不得收回，預付地租的規定也被廢除了。

在柯欽，通过一些公告和法令，到了 1937 年所有的喀南达的租佃权都被固定下来了。通过 1943 年的一項法令，佛劳姆帕湯达的租佃权也得到了确定。

特拉凡哥尔的情况就不同了。远在 1829 年和 1867 年的皇家公告就已經把这里的喀南达的租佃权固定下来，但是他們得交付地租。1933 年，特拉凡哥尔把喀南达必須向真密繳納的各种租稅都廢除了。这些向地主繳納的租稅都

是按一定数量的货币计算的。这种交纳租税的方式后来就叫作真密卡拉姆(Jenmikkaram)。此外，政府还代地主征收这种真密卡拉姆租税。这样，卡纳姆土地持有者实际上就成了具有转让权和继承权的土地的绝对所有者了。

因此，当喀拉拉邦在1956年组成的时候，马拉巴佃农的租佃权和公平地租以及柯欽地区佃农的租佃权都已经固定了下来，而特拉凡哥尔的佃农还什么也没得到。印度独立后，国大党在喀拉拉邦的统治并没有给农民带来丝毫的利益。

共产党政府对土地改革问题的热诚同过去的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制定禁止夺佃法案和下令把政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以外，共产党政府还在1957年10月底拟定了一项全面的土地改革法，提交计划委员会研究审核和提出建议。这还不算，11月21日，共产党政府又公布了减轻农民债务法案。这项法案把有关救济负债农民的各项法令综合起来，按比例削减了1940年1月1日以前所产生的债务，但欠银行的债务不在此例。同时还授予了农民比特拉凡哥尔—柯欽和马拉巴地区各项法律所授予的更大的利益。这个法案于1958年3月由邦议会的预算会议制定。

两天以后——11月23日，在一份政府特别公报中，又公布了一项废除特拉凡哥尔地区的真密卡拉姆的法案草案。草案涉及十五万公顷土地和五千五百名地主。草案规定，政府将按照不同的等级付给地主以补偿费。政府向佃农索取的代价将为他们交付真密卡拉姆地租的八点三三倍，全部价款可以分十六期付清，年利五厘。凡每年收入为五百卢比和五百卢比以下的地主，其补偿费为真密卡拉姆租金

的十二倍，而每年收入為七千盧比的地主，其補償費則為所得地租的四倍。補償費將用現金或年利四厘、六年還清的公債發給，或一部分用現金一部分用公債發給。草案所附的財政備忘錄說，政府在發給這項補償費和征收經費以彌補此項開支的措施上，將承擔約八百二十萬盧比的負擔。邦議會的1957年12月的會議把此項草案送交特別委員會審議，1958年3月又提交邦議會的預算會議討論，但是直到議會休會時，還未能通過。

1957年12月21日，邦財政部長戈利將涉及面很廣的喀拉拉邦土地關係法案提交邦議會。議會決定公布這項法案，以征求公眾的意見。1958年3月30日，當預算會議結束的時候，議會又重新討論了這項法案，並將其送交特別委員會審議。就在前一天，喀拉拉邦農民協會在特里凡得琅街頭舉行了一次規模很大的遊行，支持這項法案。

這裡還應該提一提另一方面的情況。法案公布以後，喀拉拉邦各地的農民對於法案中所建議的各項措施都進行了討論。在農民協會領導下，全體農民不分黨派，都聚集在村莊里，討論這項法案的各項條款，並提出修改的意見。隨後，邦農民協會也舉行了一次特別會議，並提出某些修改意見。群眾參加法案的討論確是一件絕無僅有的事，在印度任何一邦還找不到類似的範例。

這項法案嚴格地遵照了計劃委員會土地改革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對佃農作出了必要的保障，以免受那些設法逃避法律規定和破壞本法案宗旨的地主的欺騙。法案也適當地考慮了特拉凡哥爾、柯欽和馬拉巴三地現有法律的差異，法案還特別注意到有關小土地所有者的問題，他們擁有的土地都在五畝以下，而且在喀拉拉邦的鄉村人口中占很大的

比重。

这种有利于特拉凡哥尔—柯欽地区的小土地所有者的規定不适用于馬拉巴，也絕不适用于固定佃农所占有的土地。

所有佃农均将享有固定的租佃权，除非在法案严格規定的条件下，不得收回他們所耕种的土地。地主下面的伐兰达(Varamdar,特許耕种者)，凡所持有的土地超过最高限額，并在1957年4月11日以前已在同一地主之下連續耕种十年者，其租佃权被固定下来。

此外，任何耕种者，尽管他在証件中称为代理人或僕人，都可以提出要求，并提供証据証明自己是真正耕作的佃农，有权享有固定租佃权。这项規定使得大批在証件中被地主叫作僕人以逃避法律規定而实际上是耕种者的人都能够証明他們是向地主交租的佃农。

所有自耕佃农，不論地主所持有的契約或証件的性质如何，都有权要求享受法案所規定的有关固定租佃权的利益。

固定佃农所持有的土地不得被收回。收回土地的权利只能在特殊的租佃或轉让中行使一次。如果租佃有时期的限制，則土地的收回只能在租佃期滿时执行，并且这种权利也只能在一个农业年度終了的时候行使。

土地被沒收的佃农有权从地主那里获得賠償。凡佃农无法根据有关地主收回佃农土地得就佃农所作之土地改良給与賠償的法律規定而得到补偿者，則該佃农有权获得相当于一年地租的賠償費。

凡身为宗教机构首領而需要部分土地进行宗教礼拜場所之扩充的地主以及需要收回土地或土地之一部分为本人



或家屬建筑房屋或真正进行自耕的地主，均得为上述目的收回部分之土地。

但是，如果按上述規定收回土地而使佃农所保留之土地减少至一畝双季田或相当于一畝的土地时，則不得收回。凡佃农所保有的土地少于一畝，則地主为建筑目的而收回的土地只能以20%为限。在任何情况下，佃农得保有20%的土地，不得将其收回。宗教机构不得为建筑或耕种目的收回土地。

如果地主并没有按所申訴的目的使用收回的土地时，佃农得在規定期限內請求恢复被地主收回的土地。

在印度其他各邦，由于实施了固定租佃权的立法，地主以自耕为借口而收回土地的問題已經发生了严重濫用法律的現象；但是，在喀拉拉邦，为小土地所有者以下的佃农固定租佃权和規定公平地租的問題却迎刃而解，根本就沒有留下滋生不安和騷乱的余地。

法案規定，在喀拉拉邦的特拉凡哥尔—柯欽地区，有关小土地所有者收回土地或购买土地的問題，将由土地法庭进行調解，并加以裁决。

土地法庭將考虑下列問題：双方当事人的相对經濟情况、爭执的双方当事人有无其他謀生之路、双方当事人为改良土地而用去的劳力或金錢，以及为了使問題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而需要加以考虑的其他一切事項。凡小土地所有者的佃农，不論作为业主或作为佃农而所持有的土地多于該小土地所有者时，土地法庭得命令該小土地所有者收回全部土地。

任何土地的公平地租均不得超过法案附表所規定的最高限額，也不得低于最低限額；同时，政府有权为地方应受

最高和最低地租限額之限制的土地，規定公平地租率。當然，政府得考慮當地有關地租的情況和在本法案實施以前所通行的法令。

在佃農使用勞力把旱田改為水田的情況下，地租率為稻谷總產量的六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不等。至於水田的地租率，則為四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不等。同樣，對椰子園和其他園地的公平地租率，也作了規定。

土地法庭在劃定的地區內享有確定公平地租的裁判權。凡租佃契約中的地租低於法案附表中所列的地租率時，則以較低的地租為準。

法案還作了詳細的規定，使佃農可以從地主處得到收據，可以把地租存在法庭，并使換算率得到確定。法案對於地主和中間人如何分配地租的問題也作了明文規定。

法案還規定，政府在地主的請求下，得代地主向佃農征收其應繳付的地租。法案也明文規定，佃農在歉收的情況下得免繳地租。佃農欠地主的地租，得從佃農所持有的土地的收益中扣除，並享有優先扣除的權利。佃農的權利可以繼承，也可以轉讓。

凡佃農根據法庭的判決或命令，或根據任何法律或契約而應於1957年4月11日繳付地主的全部欠租，在履行下列條件以後，則所有欠租均作為全部清償論：持有土地少於五畝的佃農，繳付一年的地租；持有土地在五畝到十五畝之間的佃農，繳付三年的地租；持有土地在十五畝以上的佃農，繳付六年的地租。但佃農，不論作為所有者或租佃者，如其所持有的土地超過限額，則不得按上述規定享受權利。此外，凡已把上述應繳的地租儲存起來的佃農，則這裡所規定的有關奪佃的法令對他們不適用。

這項法案準備用發給補償費的辦法來廢除地主制度，因此政府將宣布某一天為“農民日”，在這一天，所有固定佃農都將被認為已經從地主手中把他們作為固定佃農而持有的土地買了過來，但不包括土地上的不動產。佃農行使此種購買權利以不超過規定的最高限額為限。政府所設立的土地法庭將研究有關佃農此項購買權的問題。

購買價格應為下列數項的總和：根據有關公平地租的規定而確定的最高地租的十六倍，地主或其他關係人在土地上所修建的建築物、井和堤的價值。

購買價款得加以平均，每年為一期，分十六期付清。如佃農準備一次付清全部價款，則其所付的數目只需等於上述每年付款額的十二倍。

凡由於土地法庭所確定的購買價格而受到損害者，得向土地委員會提出控訴，土地委員會的命令是最後的裁決。佃農可以把購買價款存入土地法庭，記入土地委員會項下，價款可以一次付清或按上述規定分期繳付。在佃農把購買價款一次付清或把分期付款的最後一期付清時，則土地委員會應把購買證書發給佃農。如佃農未能按照規定繳付所同意的價款，在某種情況下，購買將作為無效論。

地主在所享有的土地所有權終止時，有權得到補償。補償率規定如下：第一個五畝，為公平地租的十六倍；第二個五畝，十四倍；第三個五畝，十二倍；第四個五畝，十倍；再以後的三十畝，八倍，再以後的五十畝，六倍；其餘在一百畝以上的土地，五倍。補償費或不動產的價值將以現金或年利三厘的不可轉讓的公債發給。

但是，由公共宗教機構、慈善機構或托拉斯以任何其他處理方式租給或贈與佃農的土地，而土地的全部收入又撥

归該机构或托拉斯使用者，則上述有关购买权的規定不适用。

地主手下的中間人須將所享有的权利出售給佃农。

土地的“最高限額”为十五畝双季田或相当于十五畝双季田的土地，即二十二畝半单季田或十五畝园地或三十畝旱地。超过限額的土地，不拘多少，均应交給土地委员会。凡根据此項規定將土地交給土地委员会者，有权得到补偿費，其数额与把土地卖給佃农的規定价款相等。

超过五口人以上的家庭，其土地最高限額的基数为十五畝双季田或与此相当的土地。超过五口者，每人得增加一畝双季田或与此相等的土地。不过，每一家庭的土地最多不得超过二十五畝双季田或与此相等的土地。

此外，最高限額的規定不适用于政府、公共宗教机构或慈善机构所拥有的土地以及面粉厂、工厂或作坊所占用的土地。但政府在认为必要时，有权取消某种特殊土地的最高限額。

凡沒有土地和土地少于最高限額的人，均可向土地委员会申請分配土地。土地委员会将按下列次序优先將土地分配給申請者：(一)土地被收回的佃农；(二)由于法案的实施而丧失对土地所享有的权利，同时現有的土地又少于三畝双季田或与此相等的土地的地主；(三)农业合作社，其社員均为沒有土地的农业劳工；(四)农业劳工；(五)联合耕种者。土地分配法案的現有条款适用于本項規定的土地分配。土地委员会有权在分配以前經營上繳的土地。

本法案还包括絕對保障棚屋居住者的規定，除非在同一村庄給与修筑棚屋的基地和費用，不得將他們趕出棚屋。

为了防止破坏本法案的各项条款，法案規定凡拥有土

地超过最高限额者，如在1957年12月18日以后自动把土地卖给或赠与他人，则此种出卖和赠与一律无效。同样，凡持有土地超过最高限额的人，在1957年4月11日或以后，除开出于正当的考虑而作的自动转让，一律无效。禁止夺佃法案在本年4月开始生效时的现状不得加以改变。

在议会针对此项法案进行辩论时，人民社会党议员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查德蒂斯哈(人民社会党)认为这项法案并没有什么“进步的”和“革命的”东西，他认为这项法案甚至比马拉巴租佃法案还要“反动”。而普·尔·库腊普和斯·格·詹纳达南(都是人民社会党员)就欢迎这项法案。至于国大党，主要的议员都没有参加辩论，而国大党议员的领袖普·特·查科就根本没有出席。

事实上，喀拉拉邦国大党对于这项法案的态度是犹豫不决、推诿躲避。这说明，主要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国大党内部在两种互相冲突的意见中莫衷一是，左右为难。这项法案公布了很久以后，国大党的权威人士始终就没有对它表示过意见。报纸报道说，喀拉拉邦国大党成立了一个以前首席部长帕南帕利为召集人的委员会，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内就这项法案提出报告。但是，这件事到此为止，并没有下文。不过，在国大党最后提出的有关本法案的备忘录中，该党接受了法案的总原则。这项法案的总原则完全是以计划委员会土地改革小组的建议为根据的，它所要付诸实施的也只不过是印度独立后的年代中，国大党在土地政策中所宣布要实行的东西。

但是，国大党在备忘录中却建议对法案作某些修订。而这些修订实质上将一笔勾销法案所给与耕种者的全部利益。比方说，国大党备忘录建议，凡受到最高限额规定的影

响的人，应给与一年的时间，让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思去处理剩余的土地。这还不算，国大党还要求按市价发给地主以补偿费。国大党并没有给小土地所有者划一道明确的界限，但却要求允许他们（小土地所有者）收回佃农所占有的土地的一半，而且在某种情况下，甚至允许他们收回最高限额的土地。

对共产党解决土地问题的明确而不含混的作法和印度独立后国大党政府在印度其他各邦的处理土地问题的方式，大有进行比较的必要。尼赫鲁总理和国大党工作委员会的确曾多次表示不赞成国大党政府在实施土地改革中迟迟不前的作法。1957年8月30日，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以明显的坦率态度”，“注意到自从独立以来，土地改革的进展是缓慢的，同时也注意到，行政方面的软弱无能已经导致了普遍的夺佃行为”（见1957年8月31日新德里“政治家报”）。国大党主席德巴在普拉吉提希普尔（高哈提）的国大党年会中再一次强调说，应该给予土地改革“最大的优先权”，同时对于迟迟不能进行土地改革的情况表示深为不满。

尽管有上述这些事实，迟至1958年4月才发表的计划委员会有关土地改革进展情况的评论，却描绘出一幅令人忧虑的景象。根据该委员会的报告（见1958年4月23日“印度快报”），只有废除中间人这项规定可以说已经普遍实行了，而在总额估计为六十一亿四千万卢比的补偿费和复兴费中，到当时为止却只付出了八亿二千万卢比。谈到公平地租的确定，只有孟买和拉贾斯坦已经把地租的水平降低了六分之一。应该回忆一下，计划委员会曾建议地租应该削减到相当于产品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水平。在其他各邦，地租仍然是很高的；举个例来说，在西孟加拉，有些地

方的地租率竟高达 90%。

談到租佃的保障，只有北方省和德里給了佃農和間接佃農以充分的保障。在安得拉、馬德拉斯、奧里薩、曼尼普爾直轄區、中央邦等地，只採取了一些臨時性的立法來保護佃農。馬德拉斯和買索爾竟把收回土地的权利給了地主。不過，情況最糟的還得算有關規定土地最高限額的問題。幾乎所有的邦都沒有制定法律來規定現有土地持有的最高限額。在阿薩姆、孟買、中央邦、北方邦、西孟加拉以及德里，僅僅對未來的土地占有噸數規定了最高限額。

因此，難怪馬德拉斯財政部長曼尼卡佛路在 1958 年 4 月 1 日對邦議會說：“對土地最高限額作規定還遠得很呢。”（見 1958 年 4 月 2 日“印度快報”）也難怪安得拉的首席部長桑奇瓦·萊迪期期艾艾地向記者指出，該邦擬議中的土地立法“是很溫和的”，而且“它不會嚴重地影響到任何人”。（見 1958 年 5 月 3 日“印度時報”）

任何要求對土地最高限額作規定的建議，都遭到了國大黨人的公開攻擊，報紙對於這方面的報道是漫無限制的。我們不妨舉個例子來談談，當買索爾邦議會開始討論租佃和農業土地法律委員會的報告時，國大黨人就接二連三地起來攻擊有關規定土地最高限額的建議。納加拉納馬認為“耕者有其田”這個口號是不切合實際的和沒有意義的。格·希伐帕、克·納加帕·阿耳瓦博士以及其他許多國大黨邦議會議員都斬釘截鐵地反對就土地持有噸數作出最高限額的規定（見 1958 年 3 月 27 日、28 日“印度教徒報”）。報紙還報道說，奧里薩邦政府土地改革委員會里的國大黨人沒有同意對土地最高限額作出規定，而且認為對這一問題保持緘默是明智的（見 1958 年 4 月 20 日“印度快報”）。根據

来自賈浦尔的一項报道，“国大党議員今天在規定拉賈斯坦土地持有噸数最高限額的問題上，意見是分歧的。当議會重新討論土地最高限額委員會的报告时，执政党的議員分別站在針鋒相对的立場上。”（見1958年4月26日“印度时报”）

正好同这个說明国大党拖延躲避和犹豫不决的可悲而冗长的故事相反，現在我們要向讀者介紹一下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对待这个问题的令人振奋的态度。在参加喀拉拉邦議会有关土地关系法案的辯論时，他說：“我們不應該抱着一种专問这个法案究竟是否革命或进步的动机来看这个法案。問題是，我們必須以现实的方式来对待这个问题，而把我国現有的客观条件考虑在內。”南布迪里巴德強調說，如果认为現在就可以对土地改革下定論，那是錯誤的；他又說：“在我国的土地关系上，社会和經濟的力量都在活动，这种活动到处都造成冲突，同时新的发展也正在出現。”因此所提出的法案，不是，也不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后方案。①

① 喀拉拉邦印度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在印度宪法和中央法令的範圍内进行工作的，在土地改革問題上亦如此，如印度宪法規定，实行土地改革后，要付給地主补偿費。喀拉拉邦政府于1957年12月第一次提出土地关系法案，交議會討論，議會决定交付群众討論。1958年3月，喀拉拉邦政府再次将这一法案向議會提出，議會又决定将法案交由一特別委員會审定。1959年2月开始的邦議會預算會議上，喀拉拉邦政府第三次提出这一法案，国大党、人民社会党、穆斯林联盟等反对党百般阻撓，提出了許多修正案。如反对把超額土地分給农民，要求把超額土地交給由地主、富农把持的乡評議會；要求按地价百分之百付給地主补偿費；要求不要保护佃戶的租佃权等，但都被否決了。1959年6月10日，邦議會經過三讀通过了这一土地关系法案。法案的內容在本章內已有詳細的闡述，通过的法案曾作了一些修改，如超額土地的补偿費按市价百分之五十而不再按地租作价付給。按規定，法案将由總統批准后实施。这一法案受到了喀拉拉邦广大农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但反对党在这一法案通过后进一步展开了推翻印度共产党领导的邦政府的运动。——譯者



## 十 內战还是共处？

总的說来，邦立法議会的12月會議是沉悶的。往常听到的那种大嚷大叫的反对調調消声匿迹了。收买議員的阴謀也被彻底揭露了。卡塔姆帕利<sup>①</sup>的可耻退却又封住了反对党的炮口。它們一直保持着馴服的态度，甚至有时还表现出恭敬的神情。

尽管如此，12月的會議，以及在共产党执政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件，仍然引起了人們很大的忧虑。共产党已把喀拉拉邦帶領到几項非常重要和非常进步的改革的边缘。夺佃行为的禁止、“真密卡拉姆”的廢除、农业劳工最低工资的規定，以及体現在土地关系法案中的基本改革等等，都极其明确地預示着喀拉拉邦的社会和經濟状况即将发生变化。被踐踏的人們已經开始站起来了。每經過一天，每采取一个行动，共产党政府都在緩慢但又确实地贏得人民更加普遍的支持。

反动势力发现，他們的力量再也不能控制喀拉拉邦的命运，邦的武力再也不听他們的指揮。这种事实的出现在喀拉拉邦的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不仅如此，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的政策和行动正在一个接一个地迅速攻入反动势力的傳統所有权和特权的領域，而且力量还在日益增长中。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在进行这种工作时是毫无顾忌

<sup>①</sup> 地名，喀拉拉邦反对党曾在这里发动侵占公地的运动，但終于遭到了失败。詳見本书第七章。——譯者

的。所有阻撓共产党推行其政策的行动，不管是通过教会、“克里斯托弗”武装队，或是通过国大党内还比較受人尊重的人士所发动的，都恰好証明是浸了水的炸药。

对既得利益集团来說，局势的确是无法容忍的，这种局势簡直不能让它发展下去。正好在这个时候，国大党議會議員馬修·馬民揚加丹发表了可怕的預言，他說什么“西班牙的故事将在喀拉拉邦重演！”这位議員的这句话并不是沒有意义的。

必須再一次准备进攻。“巴格万通心粉” (Bhagwan macaroni) 这支歌曲，就是重整旗鼓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标帜。这支粗俗下流、不堪入耳的調調嘲笑共产党政府推广由参荖淀粉制成的通心面作为代食品的努力。推广代食品的計划原本是由中央政府倡議，并得到它的支持的，更何况还得到了高哈提国大党的十二点決議案的贊許。該決議案的第九点說：“應該有組織地推广代食品和鼓勵食用含有多种养分的飯食”。

報紙上天天刊登聳人听聞的誣蔑性大标题。如果这一天的報紙大书特书某个部长利用职权保留地产，那末另一天的報紙就捏造一段有关政府购买紙張印刷教科书的謊言，而第三天的報紙則又大肆渲染特里凡得琅医药协会的風波。喀拉拉邦卫生部长阿·魯·梅农博士去年12月在科齐科德的一次招待会上說得好：“嘿，先生！你們白天制造謊言，夜間編写謊言，到了早晨就发行謊言，而且还把它叫做報紙。”梅农博士是一位老国大黨員，由于正直无私和廉潔，很受人們的敬仰。

当然，說什么共产党有私設法庭的“暴行”更是数不胜数。任何人如果只是从每天的報紙上来了解喀拉拉邦，那

末他必然会感到，他一迈出大門就会陷入共产党的私設法庭，而安全和荣誉自无保障可言了。

时时警惕着的共产党政府及时地揭穿了这些瀾天大謊，并且用事实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那些謊言是凭空捏造的。然而制造謊言的先生們却頑固不化，不肯低头，因为誰也无法使一个不願意服从真理的人向真理低头。但是，非常遺憾的是，他們的誣蔑在喀拉拉邦並沒有发生作用，因为馬拉雅拉語族人民对于一件事是深信不疑的，这就是他們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一个廉潔的政府。

关于“私設法庭”的危險和毫无保障的謊言，联邦內政部副部长維奧列特·阿耳瓦夫人前来喀拉拉邦的訪問，提供了一个很有趣味的注釋。在特里凡得琅，新聞記者問她是否在任何地方发现了不安定和法紀蕩然的現象。这个問題使阿耳瓦夫人感到很驚訝，她爽快而坦白地回答說，她在喀拉拉邦一直都是坐汽車到特里凡得琅来的，又說，各位記者可以看到她好端端地、安全地坐在他們的面前。

1958年1月26日，統一的喀拉拉邦举行了第一次“共和国日”，这一天，特里凡得琅一片节日景象。当晚举行的“共和国日庆祝会”盛况空前，是喀拉拉邦絕无仅有的盛会。群众热情洋溢。在拥挤的运动場中，首席部长南布迪里巴德领导举行了追念克里斯納·皮萊的仪式。接着首席部长以充滿自信和誠懇的語气向喀拉拉邦人民发表了“共和国日”演說。他說：

“我們現在庆祝，我們在印度国大党领导下，下定决心从英国統治者手中爭取完全独立的二十八周年紀念，同时我們也在庆祝，在胜利地获得完全独立以后实行以民主原則为基础的宪法的八周年紀念。

“因此，在这一天我們自然要向那些为爭取完全独立和制定民主宪法而进行战斗的无数人民致敬；我們也要向那些在爭取自由和民主的斗争中牺牲了生命的英勇烈士們致敬。

“我們庄严地宣誓，我們决心保卫由无数英勇的爱国者通过忘我的斗争而赢得的共和国宪法。我們要在宪法的保护下，建立一种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新社会秩序。

“當我們在庆祝共和国日的盛会上回顾我們过去在爭取民族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秩序方面所做的努力时，让我来向喀拉拉邦的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賀，同时讓我們在未来的日子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进行更持久更坚决的努力。”

共产党政府的列車就是这样向前开进的。事实既已証明各种誣蔑都阻拦不住列車的前进，于是肆意采取顛复手段的暴行便随之而来了。罢工和不合作的事件几乎成了每天司空見慣的現象。在特里凡得琅共产党書記处的大門口，几乎常常可以看到这个或那个以絕食相威胁的滋事者。甚至暴力手段也采用了；有組織的纵火、搶劫和暗杀时有所聞。暴徒和“克里斯托弗”武装队接受指示搗乱滋事。在所有这些冲突中，有一件事无疑是真实的，这就是当共产党人有时坚决地进行自卫时，一些反对他們的人也遭受了伤害。但是，总的說来，共产党人和支持他們的人所受到的伤害是严重的。的确，正象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那位被激怒了的書記戈文丹·奈尔后来所說的：“事实上，我們有些人有时也感到，對我們自己來說，取得政权并不是什么幸事，因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對我們和支持我們的劳苦人民所发动的攻击多到数不胜数，有的甚至演变成为暗杀。”

在共产党干部这样遭受攻击的时候，既得利益集团竟

又同时采取一致的行动，企图造成一种印象，使人们以为共产党人散布虚伪和半真半假的道理，在整个邦内放纵暴行。

1958年2月24日邦议会的第二次预算会议开幕了。邦长致开幕词，总结了喀拉拉邦政府在过去一年中所作的工作，并指出政府工作在今后一年中的总方向。在喀拉拉邦，一个政府竟能存在到提出第二年度的预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在过去的十年中，也许只有已故的阿·季·约翰的政府曾经有机会提出第二年度的预算。

对反对党的领袖诸公来说，这件事是忍无可忍的。他们事先就筹划停当，要狠狠地让共产党执政者嚐嚐苦头。在国大党上层反共分子的煽惑和喀拉拉邦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下，国大党的无耻之徒和堕落的人民社会党人，竖立了一块“民主统一”的招牌。邦政府当前的政策，特别是土地关系法案，已经使穆斯林既得利益集团惶恐不安，于是他们也在“民主”的招牌下摆好了阵势。不仅如此，反对党还采取一致行动，竭力拉拢那位仅有的不偏不倚的邦议员——喀拉拉邦马拉巴北部喀南达地区的对现状不满的国大党人。他过去一直是支持共产党政府的。

反对党就这样全付武装，准备发动猛攻。毫无疑问，进攻也果真展开了。预算会议开幕后还不出一个星期——3月1日，埃纳库兰姆就发生了公共汽车售票员和学生冲突的不幸事件。接着就是罢市和示威游行，而邦议会中也响起了一片喧嚷声。司法部长警告学生不要中挑拨者的诡计，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人们公开断定，他们在埃纳库兰姆积极进行活动，而且已经到特里凡得琅去煽动学生。但是，幸好政府迅速而敏捷地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企图在学生中煽起更大风潮，枉费了一番心机。

事情的真相是，反对党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建设性地来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推翻共产党政府。下面就是“不使用暴力的”国大党人3月间在邦议会中发言的几个突出的例证。这些例证都引自印度全国工会大会一个高级领导人所主编的“喀拉拉邦邮报”。这位主编是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印度政府派往日内瓦的印度劳工代表。

戈宾纳散·皮莱(国大党)说：“有十一位部长正在破坏这个国家的面貌……我们要这批没用的人干什么呢？共产党流氓和街头犯罪分子正象兀鹰那样围绕腐烂的尸体打圈子，……我们了解这些卖国贼的战略。俄国熊认为他们能够拐走我们的选票。这些傻瓜和罪犯，他们正在痴人说梦。”(1958年3月23日)

下面是另一位国大党邦议会議員——姆·姆·馬特海——所說的一段話：

“我們这里有这么一位司法部长。在他吃咖喱飯的时候，他看见了‘克里斯托弗’武装队。在他心神不安地吃完饭站起来的时候，他又看见了‘克里斯托弗’武装队。这个人的脑筋有点毛病。在我看来，必須在他的脑門上放一个冰袋或是把他送进瘋人院……。”(1958年3月30日)

另一位国大党人——恩·納拉揚納·皮萊——竟完全忘記了邦議会的选举是在总统統治下进行的，自由而公平。他說：“在共产党取得政权的道路上遍布着死尸。”他还說：“看，那里坐着一位劳工部长。不正是在他的部門下面强劫和暗杀的行动猖獗起来嗎？”(1958年3月30日)

这里又是另一位国大党邦議員——克·特·托馬斯——所說的話。他說：“我也来談几句有关我們的警察部

长的話。我得問問，普天之下有这样一位說出这么多愚蠢而虛伪的話的警察部长嗎……？一个老女巫在她无事可說的时候，她还要嘮嘮叨叨，說个不停；如果她果真抓住一些好談的玩意儿，她岂不是要得其所哉了？現在的情形就同老女巫完全一样。我告訴你們，朋友，我們必須提防这些人……他們全都会变成卖国賊……。”（1958年3月30日）

实际上，到了这时，喀拉拉邦国大党的“非暴力”主义信徒已經公开用暴力和“报复”手段来进行威胁了。有一个叫做克·姆·斯提文的脚色，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會議和国大党大会中，素以不同凡响的大声、冗长而空洞的演說而著称，他也是印度全国工会大会的一位領導人物。3月22日，他在奎龙发表了一篇声明：“我們已經一忍再忍了。我們已經原諒他們几百次了。我們也是人呀。如果我們决定报复的話，那将是很可怕的。……受虐待和长期受苦难的人們也是有感觉和感情的。为了生存和自卫，他們也会作出重要的决定。到那时，結果将是非常可怕的。”

上面这段話中所包含的威胁，实际上已經付諸行动了。在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的政治和精神的支持下，有时还在两党党员和“克里斯托弗”武装队的积极帮助下，地主們对于共产党人和他們在劳苦人民中的支持者发动了一連串的攻击。在尼拉囊，一支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已經由地主們組織起来了。他們在夜間襲击罢工的农业劳工的住宅，殘暴地打伤了男女和儿童。这种襲击一直繼續到第二天，有一个农业劳工竟被活活打死。在舍塔萊的漁民和地主間的一場爭执中，国大党人和印度全国工会大会的工作人員坚决阻撓对这个問題进行和平而公正的解决。在他們的唆使下，地主們召集了七百名武装打手，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形势。

在阿杜尔，种植园工人受到暴徒的袭击。在瓦利库纳姆，那位臭名远扬的“巴格万通心粉”调调的歌唱者和国大党会议中的无耻谎言的宣传者拉强同一些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当地人发生了争执。在争执中，拉强被殴打了。但是，为了报复，居然有人企图绑架共产党邦议员梭皮耳·巴希出生刚九十天的婴儿。这是一件卑鄙的行为。在静寂的深夜里，绑架的行动开始了，婴儿正同母亲一起睡着。婴儿的哭声惊醒了母亲；她追出门去，晕倒在地。哭喊声惊醒了村民；绑匪们把婴儿扔在附近的田里跑掉了。

在“克里斯托弗”武装队的根据地柯塔扬姆县，“克里斯托弗”队员也采取了行动。他们喝得醉醺醺地，拿着武器，成群结伙地到处走动。他们弄掉棕树叶子，甚至把整棵棕树也砍倒。帮助地主把佃农非法地从土地上赶走，已经成了“克里斯托弗”武装队的正规任务。许多地方国大党领袖们的政策，都直接间接地助长了这一切暴行。

不过，在3月的最末一个星期，事情似乎有了变动。3月24日，政府有关发放补助金的要求以五票的多数在邦议会中获得通过；那位唯一的无党派人士（过去总是投票支持政府）和那位指定议员，都投了反对票。3月25日，政府又在议会的一项表决中以三票的微弱多数获胜。

不过，到3月28日，情况才达到了高潮。这一天，联合在一起的反对党聚集了他们的最大力量。在这一天，由于最高法院暂时中止了选举法庭有关宣布詹拿达南在恰拉库迪选区内的选举无效的判决，因而这位人民社会党的邦议会議員又出席了议会。这样，反对党刚好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就增加了力量；老天爷真是慈悲为怀。也就是在这一天，高等法院要宣判有关否认卡纳诺尔选区共产党邦議員



克·卡南的选举的上訴悬案。反对党特别指望克·卡南的当选被宣判无效。

在这个但愿对方力量削减的指望上所展开的又是一幅多么宏伟的前景啊！国大党、人民社会党和穆斯林联盟这三个反对党联合起来已经拥有六十个席位了。加上那位孤单的独立人士和那位指定議員的票数，他们将在議會的一百二十七張票中，掌握六十二票。再加上罗薩瑪·彭諾斯的选举被宣布无效和一位共产党議員当主席，共产党的表决力量就削减到六十三票。如果卡南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被排斥到議會以外，那末共产党就只剩下六十二票，刚好同反对党的票数相等。在一般的表决中，主席的表决权可以为执政党取得必要的多数。但是，宪法却禁止主席在有关預算的提案中投票。

3月28日的表决一定是有关預算提案的表决。看来共产党政府的命运似乎要在这个不祥的日子里决定了。反对党之所以突然地欢呼起来就是这个道理。特里凡得琅旅館前之所以車水馬龙，也就是这个道理。的确，反对党的希望是很大的。

不过，老天爷并没有使国大党和糾集在“民主”招牌下的人士如愿以偿，他选择了不敬鬼神的共产党。卡南的当选被埃納庫兰姆的高等法院判决有效。这个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特里凡得琅，于是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邦議會进行了表决，共产党政府毕竟以一票的多数保存了下来。查科和丹努·皮萊悲哀沮丧溢于言表。种植园主也同样感到不高兴。甚至在吃午飯的时刻以前，那些小轎車就都很快地駛回豪华的种植园庄去了。

这一天，怒气冲冲的丹努·皮萊在議會中发了言。这

原是不难理解的事。日趋沒落的人民社会党的那位越来越衰老的領袖也大肆咆哮起来：“我特別要指控政府教唆使用暴力的露骨不法行为。我有責任証明政府的部长們就是这些罪行的幕后主使者。在他們就职以前，他們就已經为使用暴力創造了条件。現在的情况是，他們仍然保持老一套的做法，同时却又卖弄他們是在宪法的範圍内进行工作。”

国大党的領袖普·特·查科又重彈了那个老掉了牙的“法紀蕩然”的調調。他說：“我們曾經经历过这样的時候：人民战战兢兢地說，穆斯林党徒已經来到我們的家門口。我們也曾經经历过这种時候：人民害怕劫掠和蹂躪国土的‘般底耶’的(Pandyas)<sup>①</sup> 軍隊。而今天又輪到人民害怕共产党了。本邦的共产党軍隊正在前进中。……共产党已經訓練了一支秘密武装队。”

当查科最后把猫从口袋里放出来的时候，傾听他发言的議員們都不知道他究竟要变什么戏法。这和几天以前克·姆·斯提文所說的有关“报复”的威胁同出一轍。这簡直是在“自卫”这个被人濫用的借口下煽动叛乱。查科說：“你們这伙共产党恐怖分子正按照預謀的方式放纵暴力行为。你們正有系統地利用私人武装队进行这种活动。現在，我直截了当地警告你們，如果这些先生們用这种方式办事，并得到政府的公开鼓励和支持，那末，本邦受压迫的人民除了組織起来进行自卫以外，就沒有其他路可走。”当查科輕蔑地提到“一票的多数”时，他要求政府辞职，并且暗示說：“如果你們不这样做，那末就請稍稍注意这一点：群众反对的巨浪将摧毁你們。你們将被汹涌澎湃的巨浪所吞沒。”

查科的发言是一篇聳人听闻和不同凡响的演說。議會

<sup>①</sup> 古代南印度的强大部落之一。——譯者

中的紧张气氛增强了。演說中充滿了憎恨和敌意。一种預示不祥的沉默籠罩了庄严的議會。

第二天,在质詢以后,南布迪里巴德根据議事程序第二百二十六条規定起立发言。当前一天查科发言时,他沒有出席議會。首席部长对查科的演說表示遺憾,特別是对他所說的有一种“游击战”正在进行,同时又煽动人民在自卫的名义下拿起武器这些话表示遺憾。首席部长說,查科說这番話并不是事出偶然。根据这位反对党領袖的說法,非共产党人准备訴諸武力。首席部长說,他在暗示以武装队来“对付共产党的‘武装队’和支持共产党的警察”。纵使查科沒有用“訴諸武力”这种字眼,但是,这位反对党領袖的演說中就包含着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的威胁。南布迪里巴德直截了当地否认了有任何共产党武装队和共产党部长檢閱武装队的說法;同时又說,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出这种事。他向議會說,不論是誰要組織私人武装队,政府都要采取有效步驟加以制止。政府决心維護和平,同时他希望这位反对党領袖能够从他已采取的立場上后退。

接着查科根据議事程序第八十条規定作“个人解釋”,这时他心里又想起了德里。他居然爭辯說,首席部长的声明是为德里而发的。他一面否认他曾煽动采取暴力行为,不过一方面又重复了以前的調調,并且还把共产党叫作是难打交道的“暴徒”,这显然是由于激动而忘其所以的原故。他承认,有关共产党部长在夜間檢閱武装队一事肯定是他首先提出来的,但是他却掩飾說当时他剛好听到这件事。正像报纸所报道的,查科的“个人解釋”一直把共产党叫作“暴徒”,在“自卫”这个委婉动听的名辭下,充滿了报复的怒火。当然,他又很小心地說,他所謂的“自卫”是“合乎法律的”,

正如这个名词的含义一样。

首席部长的呼吁恰似石沉大海，没有得到反应。采取暴力行为的威胁不但没减轻反而加剧了。

印度执政党在喀拉拉邦的代表就是这样对待在一个邦内取得政权的唯一反对党的。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所反对的显然就是执政的国大党以外其他政党所组织的任何邦政府。喀拉拉邦国大党对于共产党政府的态度是偏狭和仇恨，而不是容忍和共存。

在喀拉拉邦，共产党人执政和国大党人在野的十四个月经验，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对印度民主的整个未来发展具有巨大意义的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所行所为与印度的伟大传统——容忍、力求心灵上的改变、互相谅解以及印度民族运动和印度国大党的善意——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这正是我们一向坚持不渝的精神态度，即使在对待外国统治者英国人的时候，我们也保持了这种态度。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多党制将来很有发展的可能，我们不禁要问，在不同的邦由不同的政党执政时，在中央和邦由不同的政党执政时，为了使民主制得以发展和扩大而不致被扼杀和箝制，各级反对党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随之产生的问题是：在实现以宪法为目标而规定下来的社会经济改革、有关政策的指导原则以及大家一致接受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中，各邦究竟应该起什么作用？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像上述几个问题的推论，这就是：是否允许共产党在印度生存？是否允许共产党通过民主的方式存在下去和取得政权，并在宪法的严格范围内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或者是说，我们的宪法是否适用于任何人，而只

有共产党除外，共产党是否必須受到排斥，它的存在是否必須被否定？

总之，反共是否就是我們的信条？或者說，我們是否要发展一种印度式的政党互相监督和政党共处？

对于这些問題，可以有——实际上也的确有——两种答案，这就是肯定和否定。但是，那些希望我們作肯定答复的人却忽略了印度心灵中的一种重要品质。反共或反对任何东西，是同印度的傳統不相容的。我們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民族。对于印度所独有的这种对待事物的态度，我們的总統——偉大和善良的拉金德拉·普拉沙德——說得再清楚也沒有了。1957年的独立紀念日，他在喀拉拉邦說：“我认为，你們并没有由于两个不同的政党分別在你們这个邦里和整个国家执政而感到有什么差别，我希望我这个說法是正确的。我可以肯定，我們在德里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

总統还說：“我很高兴，你們邦内所进行的这个偉大实验，将成为一个尽管信仰不同，但为了全体利益，仍然能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的范例。这个范例不仅对其他邦，而且对全国都是一个巨大的教訓。”

在总統說这些話的时候，他想到了那些崇高的潘查希拉原則——国家之間共处原則——的理想。这正是印度当作一种自豪的特权而向处于原子毁灭威胁之下的四分五裂的世界提出的理想。总統說，喀拉拉邦的“共处的典范”将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也将成为一个值得为之生活和工作的理想。总統又說，当印度人可以对全世界說，尽管我們的信仰不同，但我們是一个整体，我們的国家是統一的，而且将来也一直是統一的的时候，我們就可以要求其他国家向我們学习了。

## 十一 共产党执政下的一張 收支平衡表

到 1958 年 4 月 5 日，共产党政府执政已整整一年了。反对党企图推翻这个政府的一切手段都没有成功。邦内的人民欢欣鼓舞；全邦到处都举行了庆祝会，与会群众都保证全力支持共产党政府。

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所取得的进展不但受到全印度的密切注意，而且也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怀。许多根本没有想到的地方纷纷寄来了贺辞。甚至连“印度快报”那位极端反动和反尼赫鲁的社论作家也在几个月前承认说：“一直到目前为止，南布迪里巴德先生的公共行为是完全正确的。”该报的每周专栏作家则把 1958 年 4 月 5 日叫做一个“值得注意的周年纪念日”，并说“喀拉拉的实验”是“一个伟大的实验”，“应该给以相当的时日使它健全起来”。这位专栏作家还注意到，像总统拉金德拉·普拉沙德博士、尼赫鲁总理和贾西·普拉卡什·纳拉扬那么不同的三位人物“都热烈地赞扬了喀拉拉邦政府”。他接着指出：“就群众方面来说，它（喀拉拉邦政府）已经引起其他邦政府的极大的警惕。在为公众谋福利方面进行竞争是应该受到欢迎的。”（“目击者”，“喀拉拉邦政府的周年纪念日”，见 1958 年 8 月 9 日“印度快报”）

1958 年 3 月，英国“新政治家”周刊的著名主编金斯莱·马丁亲自去喀拉拉邦考察了共产党的施政；4 月 8 日，他在

倫敦向英國廣播公司的一位記者說，我們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喀拉拉邦共產黨政府是怎麼說就怎麼做的——放棄武力，通過爭取一個個席位的方式來取得政權。”他還說：“喀拉拉邦政府一直是在嚴格地遵守印度憲法的條件下進行統治的，……並且正在正確地履行着職責。”

不久以前，內奧米·密契遜在“新政治家”周刊上撰文贊揚共產黨政府，特別推崇南布迪里巴德是“一位誠實而有教養和吸引力的人”。密契遜認為，印度非常需要一個反對黨，而共產黨正好填補了這個空缺。在提出共產主義能否與民主相結合這個問題時，密契遜說：“我本人就看不出喀拉拉邦的制度怎麼就能變成獨裁統治，也看不出品格高尚的南布迪里巴德先生……變成一個暴君。”她還說：“同基督教或印度教一樣，共產主義也可以根據新的形勢重新加以解釋。也許喀拉拉邦正在發生這樣的事情。”

甚至連美國的雜誌“商業周刊”早在12月就曾說道：“對照來看，共產黨人似乎一直在穩步地取得勝利。在其他印度人的眼中，他們的小小勝利卻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家雜誌還說：“……共產黨政府已經獲得了為政清廉和樸實的名譽。從事這項任務的人就是首席部長南布迪里巴德，當地人說他是‘印度最純潔的首席部長’。”

1958年6月著名的科學家豪登教授訪問喀拉拉邦，他說：“到目前為止，喀拉拉邦共產黨政府還沒有做出任何一件國大黨政府不能做的事情來。”

在以前的几章中，我們已經談過了共產黨政府的勞工政策和土地政策。這些政策是遵循國大黨綱領中的方針確定下來的。我們姑且放下政策不談，不論在生活上以及在樸素的作風和低微的薪金上，共產黨人也最接近我們曾經

期望于国大党部长諸公的水平。尽管誣蔑中伤的运动此起彼伏，共产党政府的清廉无私和为民辛苦的美誉还是与日俱增；甚至政府的最刻毒的批評家也不断地說，他們对于任何共产党部长个人都提不出什么責难来。喀拉拉邦历届政府声名狼藉、偏激狹隘，专搞教派活动，同时又不稳定，因而人民要求有一个較好、較清廉和較稳定的政府，而共产党政府就完全滿足了人民的这个願望。

在小額儲蓄运动中所获得的成就，正是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得到人民支持的一个証明。由于政府积极发起这个运动的結果，1957—1958年度所收集的儲蓄金甚至比1956—1957年度还高。1957—1958年度所收集的总数和淨額分别为四千六百一十零三千卢比和一千二百六十九万九千卢比，而1956—1957年度的相应数字則为三千七百七十万卢比和六百五十六万九千卢比。由于受到这个結果的鼓舞，同时又考虑到小額儲蓄计划在为五年计划动員資金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政府把1958—1959年度的儲蓄指标定为三千万卢比。

为了加强宣傳和扩大小額儲蓄代办系統的范围，政府成立了小額儲蓄管理局以代替国家儲蓄机构。小学教員、村鎮公務人員、乡村服务人員、村議会和全国农村服务推广计划区，都被吸收到儲蓄代办系統中去。政府在这方面已經取得文化工作人員、剧团和其他人士的支持，运动正在全面开展中，預計可以完成預定的指标。

为了发展国家的特殊计划而用群众运动的形式来大规模地动員人民，对一个得到群众拥护的执政党來說，的确是一个最好的試驗，而这种試驗也正是完成我們计划中的目标的关键，因为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利用我国人民的无限潜



力。1958年6月，在大規模地和有計劃地動員喀拉拉邦人民來種植一種叫做“格萊利希達”(glyricidia)的綠肥灌木的運動中，邦政府又獲得了勝利。這種綠肥具有理想綠肥所應有的一切優點，是一種四季長青的植物，生長迅速，每年可以收穫兩次。人造肥料的供應量目前還有限，喀拉拉邦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綠肥，而這種綠肥正好可以滿足這種需要。

喀拉拉邦每年需要一百四十萬噸左右大米，而它本身只生產八十萬噸，其餘的則需要進口。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標是增產三十五萬噸糧食。目前，喀拉拉邦有二百萬畝稻田，預計新的灌溉系統可以把另外的十萬畝土地變成稻田。政府的口號是每一畝稻田有一百棵這種綠肥灌木，每一棵椰子樹有一棵這種綠肥灌木。總的指標是兩億六千六百萬棵。自從這個運動開始以來，已經分配了七百二十三萬棵這種綠肥灌木的種子和樹苗。本年的目標是種植一千万棵，預計要增產稻穀一百二十八萬帕拉<sup>①</sup>。

農民協會之類的群眾組織、政黨工作人員以及社會福利工作人員等等都在6月里大規模地參加了“綠肥灌木”周，并使這個運動具備了群眾運動的性質。在喀拉拉邦，廣大的群眾參加一個由政府的一個部——農業部——所發起的運動，這還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喀拉拉邦政府對於這個運動的成功滿懷信心，因而決定停止撥款給邦營農場購買有機肥料，並且要求他們自己製造肥料。

這一綠肥運動深深地打動了計劃委員會，因而該委員會要求各邦都在這件事上效法喀拉拉邦（見1958年6月12

① 印度容量單位，相當於110公升。——譯者

日“印度快报”)。实际上,在反共分子所制造的反对喀拉拉邦政府的造謠污蔑运动的喧嚣中,中央政府的某些負責人士和国大党人对喀拉拉邦政府的多次称贊,似乎已經不再为人注意了。比方說,1957年12月14日,联邦农业部长潘·德希穆克博士在希朗对中央林业局的第四次會議說:“看到喀拉拉邦政府在統一全邦林业中給我們树立楷模,我感到很高兴。”(見1958年12月15日“印度快报”)1958年5月,加德季耳率領了計劃委员会的一个电力和灌溉計劃研究小組訪問了喀拉拉邦。喀拉拉邦政府对这个問題的精辟理解給这个小組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加德季耳对一家报館的記者說:“灌溉部长的出色辯护,使他深受感动,”并且希望該小組的訪問“将有助于喀拉拉邦加速完成其計劃”(見1958年5月17日“印度快报”)。联邦乡村建設部部长戴伊也在同一个月里訪問了喀拉拉邦。他告訴“印度斯坦时报”說:“我认为,現在的喀拉拉邦政府对于乡村发展計劃的需要是非常重視的。該邦政府目前特別強調生产方面的計劃,而反对重視邦內已經很讲究的那种排場。”戴伊說,喀拉拉邦政府已經着手进行一个“严格按照其字面意义的”权力分散和民主化的計劃。那些“摆样子的”技术部門已經比过去有生气了。

喀拉拉邦政府的各項措施也得到了国大党人的支持。大家都知道,教育法案就得到邦外国大党人士的称贊。土地改革政策也同样受到了国大党人的推崇。1957年10月,比哈尔邦財政部副部长尔·格·普拉沙德率領了一个土地改革小組前来喀拉拉邦訪問。普拉沙德把喀拉拉邦政府的禁止夺佃法看作是“保护土地真正耕种者的权利的一个健康措施”(見1957年10月22日“印度快报”)。1958年6

月，喀拉拉邦政府公布了修正薪金方案，規定每月的最低薪金为三十卢比，最高为一千卢比。這項措施受到了北方邦国大党議会党团秘书克肖尔的热烈称贊。克肖尔把这种縮小最高和最低薪給之間的差别的行动叫做“大胆而正确的步驟”。他告訴記者說，他已經写信給国大党主席德巴，要求他处理縮小最高級官員薪金差異的問題（見 1958 年 6 月 27 日“印度快报”）。

喀拉拉邦国大党諸公的頑固不化，可以从下面一段令人痛心的評論中看到。邦外国大党人对喀拉拉邦政府的称贊大大激怒了他們。据某位記者的报道，喀拉拉邦国大党人“对于邦外某些国大党人在沒有获悉这个邦所发生的事情的正确情报时，就不負責任地对新聞界发表声明的做法，表示忧虑”（見 1958 年 6 月 28 日“喀拉拉邦周报”）。

喀拉拉邦政府所采取的一項小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措施，成功地为该邦政府赢得了全邦老百姓的謝忱。我們从外国統治者手中接收了一支警察武力。过去，外国統治者对警察所干的坏事，一向是充耳不聞的，因而对人民來說，他們就成了一种威胁，特别是对农村人民的威胁。积习是很难改掉的，因而甚至在今天，警察对公民的橫暴行为也还是相当显著的。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从就职的第一天起，就竭力防止警察的这类行为，并且在該政府认为正当的时候，就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正是因为这样，政府懲罰了一名警官和一名警士，原因是当国大党邦議員康本布和其他七位人士由于采取不合作行动而在卡塔姆帕利被逮捕时，这两位警官和警士把他們铐了起来（見 1958 年 6 月 3 日“印度时报”）。政府宣布，对于警察在沒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給任何人带手铐的行为，将严肃处理。根据 1958 年 6 月的

一項報道說，警察總監已對屬下的警官發出一項通告。該項通告說，他已接獲好幾項控訴警察對公眾有不當行為的指責，“任何堅持不改的人，將受到嚴厲的處分。”（見1958年6月24日“印度快報”）

的確，喀拉拉邦人民之所以越來越熱愛邦政府就是因為邦政府熱切地關懷民間的疾苦和人民的福利。我們不妨舉出幾個例子來談談。科塔納德今年在肥沃地帶種植稻子中遭受了嚴重損失。於是政府便在1958年3月迅速對種植者發放貸款，並修改了有關償還下欠貸款的規定。在某些沿海地區發生了災難以後，政府立刻批准了修築公路的措施，在這項工程中，政府支出了四十二萬九千盧比的工資，當作對沿海地區的一項救濟。當運輸部門編制內的職員在工時延長後向政府提出紅利的要求時，政府便在1958年4月額外發給了相當於一個月薪水的金額。1958年2月，埃納庫蘭姆發生了學生和運輸工人沖突的事件，當時警察曾使用武力驅散群眾。沖突之後，人們要求對這一事件進行調查。政府立刻任命了一個委員會，而委員會現已提出了報告。對於這一沖突事件，委員會譴責了運輸部的雇員，同時認為，警察不使用催淚瓦斯而使用武力，也是一種過份的行為。

這裡還可以著重地提一提，1958年4月28日，政府在奎龍的薩散科塔營地發生食物中毒的不幸事件的那一天所採取的措施。首席部長和一些高級官員那一天都到了奎龍。首席部長在最緊急的時刻親自參加了工作，指揮特里凡得琅的醫生趕赴奎龍，並安排運輸力量把擁擠在奎龍各醫院中的中毒者疏散開。隨後，他又訪問了三十哩以外的營地，慰問那里的人民，催促採取其他緊急援助，直到午夜

以后，才回到特里凡得琅去。

喀拉拉邦政府也許是對每月平均收入不超過一百盧比的人們——不論他們是被告還是原告——提供法律支援的唯一政府。政府還提出了一個對被解雇和被開除的工人給予經濟援助的方案。1958年5月，政府委派了一名專任律師，在工會向法庭提出訴訟時，在法律上給工會以支援。在有關違犯勞工立法的規定或不履行契約和判決的訴訟案件中，這位律師還要向當地的政府律師提出必要的建議。

我們還可以提一提政府為了使喀拉拉邦工業化而採取的步驟。那些在過去的十年中曾經統治過喀拉拉邦以及那些在喀拉拉邦工業化中絲毫沒有出過力的先生們，一直在大嚷大叫，說什麼共產黨政府沒有發展新工業。他們也許希望在共產黨人執政的第二天就遍地開滿工業之花。但是這些人本身卻用“法紀蕩然”的連篇鬼話，竭盡恐嚇之能事，把那些有意投資的人嚇跑，並施加其他影響阻止那些人前來喀拉拉邦。

1958年5月，帕利圖拉磚瓦有限公司的建設工程在舍爾塔萊開始了。這個磚瓦廠建成後，每天能生產四萬塊磚，並為幾百名工人提供職業；對五年計劃中的建築計劃來說，這個工廠具有重大的意義。

喀拉拉邦已經同孟買的一家公司達成協議，由這家公司在喀拉拉邦建設一座從廢茶中提煉咖啡因的工廠。在這個工廠全面開工後，每月將生產二千噸咖啡因。喀拉拉邦政府保證給予這個工廠以一切便利，其中包括在五年內豁免廢茶的銷售稅。

在喀拉拉邦共產黨政府所採取的其他工業化步驟中，我們還可以提一提政府為建立電燈和電燈泡的製造工業而

頒發和授予特里凡得琅印度电气公司的執照和便利。此外，喀拉拉邦水上運輸公司也在1958年4月正式開業。這個公司的成立結束了喀拉拉邦特里凡得琅地區的汽船客貨運輸的私人所有制，使這項業務成了邦營事業。我們不妨再提一提政府為了制止本邦制漆工業的迅速衰落而採取的有力措施。這種慢性的危機是由缺乏資本、一再發生的罷工以及漆樹子原料供應不足等等情況所造成的。政府代表和各工會代表舉行了會議，擬定了一項解決制漆工業——喀拉拉邦民族工業——所面臨的問題的計劃。

在一年來的施政期間內，喀拉拉邦共產黨政府所獲得的成就的確是很多的。我們不進一步詳述細節，姑且以計劃目標為基數，把喀拉拉邦在共產黨治理下所獲得的成就，概括地提供給讀者。下頁表中(引自1958年6月29日“新世紀”周刊有關訪問南布迪里巴德的報道)指出第一個五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頭兩年在各主要計劃支出項目上所獲成就的數字。

我們可以看出，1957—1958年度的實際支出數字是原定預算數字的78.6%。應該記住的是，共產黨人是完全沒有執政經驗的，他們在1957年5月，也就是在1957—1958預算年度開始後的一個多月，才開始執政，更何況他們並沒有參加他們目前負責執行的計劃的制訂工作。儘管如此，下列數字表明，在“農業及其有關項目”以及“工業和礦業”這兩方面，1957—1958年度的執行情況比1956—1957年和整個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都更出色。這幾項計劃支出是最重要的，因為這些項目同食物缺乏和失業這兩個極端嚴重的問題有關係。至於“灌溉和電力”，他們完成計劃的百分數是94.4。

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喀拉拉邦大部分時間是處在

	第一个 五年 計劃	第二个五年計劃	
		總額	總額
		1956—57年	1957—58年
		(百分比)	
农业及其有关項目	43.9	52.0	70.06
灌溉和电力	94.4	101.0	94.4
工业和矿业	52.3	47.0	55.8
运输和交通	132.6	68.0	93.4
社会服务	84.1	31.2	65.1
其他	400.9	81.7	66.3
<hr/>			
小計:			
邦的部分	83.5	58.9	76.9
中央的部分	—	51.6	100.4
總計	—	58.1	78.6

国大党的統治下的。第一个五年計劃原拟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而国大党在农业和工业方面却只完成計劃的 43.9%。本来应该用在农业和工业这两个对喀拉拉邦极为重要的項目上的款項都被国大党政府轉用到“运输和交通”(完成計劃数字的 132.6%)和“其他”(完成計劃数字的 400.9%)这两个項目上去了。在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况的后面,就是喀拉拉邦国大党政府的腐敗无能、穷奢极欲和徇私舞弊。

問題的真相是喀拉拉邦共产党人必須通过从国大党人手中所继承下来的行政制度来执行五年計劃,而这批先生在卡納諾尔国大党會議中居然責备共产党人实施五年計劃所动用的款項还不及計劃支出的 50%。我們姑且不說这种說法只是一种揣測,而且这一揣測又是完全錯誤的;他們的責难同时还說明喀拉拉邦国大党人在失敗之余并没有反躬

自省，虛心思過，而仍然堅持老一套的作風，看不到這種信口雌黃在明智而了解情況的選民面前是絕對起不了作用的。如果能起任何作用的話，那也只是使他們自己在人民當中更加孤立罷了。

在共產黨政府從前屆政府所接收下來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經費分配額中，“運輸”和“社會服務”兩項分別為五千五百七十萬盧比和二億三千六百七十萬盧比，而“工業”的分配額只有六千八百三十萬盧比，“農業及其有關項目”（包括小型灌溉、畜力耕作和土壤保持）的分配額只有六千二百四十萬盧比。這樣，由於那些下了台的統治者的“德政”，喀拉拉邦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已經不恰當地犧牲了生產部分而偏重於非生產部分。同時，由於最近的計劃支出的削減以及隨之而來的資金的重新分配，結果很可能使已經不足的農業和工業分配額再受到影響。

在喀拉拉邦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中，除去某些修正外，已不可能對款項的分配作任何重要的修改。唯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在生產活動的領域內，採取措施，使物質產量提高，而同時又不相應地增加財政資金。綠肥運動就是朝着這個方向前進的一次行動。

在這裡，就同在整个行政領域中一樣，共產黨政府的工作也必須通過現存的行政機構來執行。這個機構沒有效率，動作緩慢和官僚主義化，同時又繼承了獨立前土邦首相一人統治的有害特徵。正如首席部長南布迪里巴德所說的，貪污腐敗幾乎是這個繼承下來的行政機構的第二天性。

到目前為止，共產黨政府在改造這個機構和把它遠遠地拖離舊軌這兩方面一直還沒有獲得任何重要的成就。事實上，1958年1月，在科齊科德舉行的共產黨邦會議上，改



造行政机构失败的问题就会被尖锐地提出来。

对于一件事情的执行，政府官员往往是横加阻挠而不是迅速地予以处理的。这几乎成了一种积习。下述事实可说是这种趋势的典型例子：有一些官员的绰号是“障碍物——姆·比莱”，而他们却反而以此为荣。公文走得慢，手续繁琐，而拖延则是最突出的特点。由于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于是下列事件就发生了。一位女教员在一年以前因为健康关系，请求调动工作。等到她的请求最后被批准时，她已经死去好几个星期了。另外，有一位志愿从马德拉斯邦前来喀拉拉邦工作的医生，被分配到卡里库特附近的一所公营药房中去工作；但是当他到那里去报到时，他发现那里并没有那么一个药房。

尽管有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些成就，1957—1958年度在农业和工矿业方面所完成的数字实际上只分别达到该年度计划指标的70.06%和55.8%。因此，虽然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所做的努力，同历届政府比较起来是一个长足的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就喀拉拉邦的实际需要来说，急待进行的工作还多得很。情况既然如此，因而任何吹毛求疵的人，都可以像目前邦内的反对党那样，提出一连串尚未解决的问题来进行责难。

不过，共产党的部长们从来没有说过大话。他们只是说，他们正在努力研究这些问题，并下定决心要取得结果。这种谦虚的态度深得民心；在人民对部长们的诚恳朴实和艰苦作风产生了信仰以后，他们就更加爱戴这些部长了。事实上，南布迪里巴德就曾说过，共产党施政一年的唯一重要成就，就是打破了共产党人和其他人之间的那一堵高墙，现在人们已把共产党人看作是同别人一样的人，也具有类似的

特点和願望，而不是有关的政党和人們所描繪的魔鬼。南布迪里巴德又說，对于那些企图在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間划一道鴻沟而使国家陷于分裂的人們來說，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共产党人看到了自己在施政中所存在的缺点，因而主观上就努力消除这些缺点。他們具有解决問題的明智措施和善于分析的头脑，因而在行政系統中他們已逐步而成功地启发了比較开明的人士。事实上，对工作产生热情、尽最大的努力来进行手头工作的官員，特別是年輕的官員，正越来越多。下級人員也逐漸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共产党政府認識到，改革行政机构的需要是非常迫切的，因而执政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行政改革委員會。委員會的报告已于7月签署。人們普遍地承认，委員會在空前短的时间內——在大約九个月的时间內——就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委員會的报告还没有公布；它的建議内容还不得而知。不过，我們可以說，行政改革这个問題在印度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注意和关怀。据說，建議的重点是实行民主的权力分散，預料所建議的改革将使行政机构能够迅速地处理公务。

共产党在喀拉拉邦执政的最大成就，就是建立了一个稳定而誠实的政府。仅仅是这一事实就已經使他們在各界人民中贏得了无数的支持者。意义重大的，喀拉拉邦所有的銀行都向政府担保，他們将貸款給政府，而实际上它們答应給政府的貸款已經超过了政府所需要的数額。

共产党人完全有能力在民主的宪法下进行工作。他們在阿姆利則所通过的有关向社会主义社会作和平的过渡的決議，是說了算数的。喀拉拉邦就是个千真万确的証据。

因此，全印度的人民今天都对喀拉拉邦政府怀着无限的善意，这本身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他们希望这个政府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他们在这个政府中看到了一种与国大党统治迥然不同的施政方式。人们无法说国大党的统治是符合人民的期待的。

## 十二 德維科倫补缺选举和 选举后的情况

喀拉拉邦政府的統治是否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这件事是一次严肃的試驗，而这次試驗已經在德維科倫进行过了。結果令人折服。

共产党在德維科倫的胜利使得一位瘋狂的反共分子悲叹不已，他幻想着說：“……如果能使共产党在喀拉拉邦遭到失敗，那么这种失敗就会孕育无数有利于印度、甚至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不仅是在印度，而且是在整个世界，所有热爱民主的人都希望德維科倫可以为最后驅除共产主义的幽灵作出良好的开端。”（見1958年4月28日“印度快报”題名“不是滑鉄卢”<sup>①</sup>的社論）

在德維科倫举行补缺选举以前的几个星期，联邦国防部长弗·克·克·梅农看到国大党卡納諾尔會議济济一堂，不禁洋洋得意，于是便說国大党“不仅是一个西方观念的政党”，而且也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只有在喀拉拉邦遭遇过一次选举上的失敗。他鼓励国大党人苦干，贏得群众在道义和情感上的同情，同时用德維科倫的补缺选举来証明喀拉拉邦“已經回到了国家的怀抱”。他又說，

---

① 滑鉄卢原是比利时的一个村庄名。1815年6月18日，法国拿破仑与英将惠灵吞曾在这里进行了著名的滑鉄炉之战，从此結束了拿破仑在法国和全欧的統治地位。这里的意思是說，德維科倫的失敗并不是国大党的致命失敗。——譯者

国大党在补缺选举中的胜利不应该是一次“勉勉强强的”，而应该是一次令人折服的胜利，从而弥补国大党在上一次选举中所遭受的“暂时”挫折。（见1958年4月28日“印度时报”）

反共分子和国大党为反对喀拉拉邦共产党政权而发起的敌对运动已经有一年之久了，而国大党这次在德维科伦的惨败也恰好是这一运动的高潮。尽管拼凑在一起的反对党调动了全部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候选人罗萨玛·彭诺斯，但是德维科伦的工人和农民却重申了他们对于邦政府的信任，于是这个在印度的第一个共产党政府也就这样赢得了一次信任投票。

尼赫鲁接见了一家外国报纸记者；他的谈话的大意是：“如果共产党能够维持在喀拉拉邦的政权，那就很幸运了”，但是接踵而至的事实却是国大党在德维科伦的失败。实际上，这次惨败说明，如果国大党在下次大选中不再丢掉几个邦，那就是件侥幸的事了。德维科伦的选举，的确使印度认识到出现更多的喀拉拉邦和更多的南布迪里巴德是可能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德维科伦的补缺选举象征着一场一边是共产党人和支持他们的民主人士，一边是资本家和反共分子的斗争。德维科伦的选民——全体喀拉拉邦人民的象征——毫不含糊地作出了他们的决定。投票人数的百分比以及获胜的共产党候选人和国大党对手所得票数的悬殊情况，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事实，尽管事先曾有人估计，道路的艰阻可能会妨碍选民出来投票。

这次选举的最重要的特点是，没有一位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的部长参加竞选运动，而国大党竟强拉马德拉斯邦

首席部长卡馬拉吉·納达尔和公共工程部长卡坎出来活动，旨在使泰米尔族的选票倒向国大党。卡馬拉吉并没有明显地出面发表任何演说，但是据说他曾提着一只口袋，四处奔走，而且在5月13日从德維科倫回去以后便对馬德拉斯的記者說，“据他的观察，国大党在德維科倫的补缺选举中大有获胜的希望。”

事实上，共产党部长在这次生死攸关的补缺选举中并没有参加竞选运动，这給印度一次教訓，說明这样做才是民主的竞选运动。相形之下，从外地跑到德維科倫的部长們的那种不擇手段的竞选活动就显得更突出了。比方說，他們曾对大部分来自所謂下等种姓的泰米尔族的选民說，国大党在馬德拉斯邦曾使两三位哈里詹(Harigans)出任部长，而共产党却使两位婆罗門(Brahmins)①当部长，因而如果他們再投共产党的票，那些遭人痛恨的婆罗門的地位就更加巩固了。

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說，德維科倫的选举証明是教族主义的可耻失敗。参加竞选活动的部长企图从外部来煽动的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教族主义。它是一种泰米尔族对非泰米尔族的教族主义。我們对于印度北部所出現的那种卡雅薩(Kayastha)选举卡雅薩、布米哈(Bhoomihar)选举布米哈或是塔庫尔(Thakeer)选举塔庫尔的可耻的景象已經习惯了；而对于印度南部所出現的那种穆达利阿(Mudaliar)选举穆达利阿、納犹杜(Nayudu)选举納犹杜或是瑪伐尔(Marvar)选举瑪伐尔②的景况，我們也是熟悉的。但是

① 哈里詹是賤民种姓；婆罗門是最高的种姓。——譯者

② 这里說的卡雅薩、布米哈、塔庫尔、穆达利阿、納犹杜、瑪伐尔等都是印度教种姓的名称。——譯者

在德維科倫，我們却看到了一種新的教族主義，它以泰米爾族反對非泰米爾族為號召。但是這種無恥的教族主義的叫囂終於破滅了。種植園里的勞工和田間的農民表明，這種教族主義的濫調並沒有使他們對共產黨失去信心，他們堅信共產黨有能力維護他們的利益。

主要的反共政論家為了聊以自慰，便說德維科倫的失敗根本就“不是滑鐵爐”，因為“那里是共產黨的據點”，所以他們獲得勝利並不足奇。然而，事實却正相反。德維科倫並不是共產黨的據點。事實上，共產黨對於代表德維科倫的邦議會議席並沒有把握。原因是：在前一次選舉中，這個選區就沒有共產黨的候選人，他們在那里的勢力非常薄弱。但是當時泰米爾族人民對於國大黨阻止特拉凡哥爾—柯欽的南部泰米爾族地區與泰米爾納德<sup>①</sup>合併的政策深感不滿，於是他們便要求共產黨提出一位候選人。結果羅薩瑪·彭諾斯被推薦出來，而且獲得了勝利。這次勝利純粹是由于該地區人民消極地不投國大黨的票而獲得的。

羅薩瑪在當選以後，的確組織了一些種植園工會。但是這個地區需要一批泰米爾族的共產黨幹部，而喀拉拉邦的共產黨並沒有這種幹部，同時泰米爾納德的共產黨也抽調不出人來。因此，儘管共產黨在德維科倫獲得勝利，但是它並沒有特別重視這個地區。

於是，共產黨便面臨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局面，這種局面意味深長地說明了共產黨人辦事的方式，而這一點是沒有人知道其中真相的。原來泰米爾納德兄弟黨的同志到了德維科倫，在那里做了出色的工作。將近一千名泰米爾納德

① 泰米爾納德是印度南部泰米爾族人民居住的地區，它構成馬德拉斯邦。——譯者

的共產黨員去到德維科倫，其中包括該黨書記處五位書記中的四位，這就是普·拉馬穆蒂、吉萬南丹、文卡塔拉曼和尙卡拉雅。同行的還有泰米爾納德共產黨邦委員會的二十位委員以及共產黨縣的優秀領導幹部。另外還有二十五位女黨員。來自泰米爾納德的一千名黨員中，大部分是工人階級出身的。

泰米爾族的選民占德維科倫選民的60%到65%，他們都住在種植園里，生活極端貧困，而且沒有文化。在德維科倫，凡是工會運動不普遍、政治空氣稀薄的地方，人民便受惡霸土豪的統治。

德維科倫競選中的基本任務就是使這部分容易被泰米爾族式的教族主義所動搖的、基本上沒有發言權的廣大群眾毅然轉變過來。來自泰米爾納德的共產黨幹部幾乎在選舉日前的一個月便三三兩兩地在種植園的居民中安頓下來，他們悄悄的絕沒有作任何表面文章。隨後，他們就穩重而耐心地將共產黨的主張解釋給人們聽。他們和工人們同吃同住，生活在一起，逐漸成了一家子。

共產黨政府的勞工和警察政策對他們的解說工作起了幫助作用。工人們一致認為，自從共產黨執政以來，他們至少可以在自己的棚屋里安心地睡覺了。過去，警察和暗探常常半夜三更來敲門，用捏造的罪名和威脅來折磨他們，勒索他們的錢財。他們也感覺到，種植園主的行為現在也比較檢點一些了，而且很快地都放棄了以前那種妄自尊大的作風和習慣。

其餘的選民都是馬拉雅利族地區的農民。在這裡，喀拉拉邦共產黨人採取了行動，使農民毅然擁護共產黨。

限于篇幅，我們不能詳細地描述競選運動的每一個細



节。只要说明一点就够了，这就是除了在经费方面以外，共产党在任何一方面都胜国大党一筹。共产党的选举机构是由共产党喀拉拉邦委员会书记戈文丹·奈尔有效地加以组织和协调的。在组织工作中，他以大胆、沉着、稳重的工作作风著称。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在宣传方面有好的素养。他们接近每一个选民，不让任何事听任机会去摆布。

国大党在宣传上的不择手段确是骇人听闻的。甚至最负责任的国大党人都陶醉在这种宣传中。在皮尔梅德的皮里亚尔地方举行的集会上，当国大党候选人布·克·奈尔谈到4月28日奎龙县食物中毒的悲剧时，就说什么南布迪里巴德弄到了一些毒药，把它放在奎龙某几家旅馆的食物中，幸好尼赫鲁前来喀拉拉邦的时候没有在旅馆里用餐，才保全了生命。这篇演讲在马拉雅兰姆的几家日报上一字不动地刊登了出来，甚至也发表在几家英文周刊上，而且显然没有遭到反驳。一位亲自出席这次集会的著名报纸专栏作家还对本书作者保证了它的真实性。

喀拉拉邦议会反对党领袖普·特·查科在皮尔梅德的依拉帕拉地方的一次集会上说，如果投了共产党的票，泰米尔族的工人就会被赶走，而由来自阿力培和舍尔塔莱的共产党工人来代替。

巴顿和帕南帕利也投入了竞选运动，但是他们每开一次口就为国大党葬送掉几十张选票。泰米尔族地区发生枪杀事件时，巴顿正是喀拉拉邦的首席部长，因而泰米尔族人民恨之入骨。帕南帕利的声名既然很糟，因而他的大声疾呼也只能对国大党起破坏作用。

克·普·马德哈文·纳雅尔也从新德里赶来了。在选举前夕，“印度时报通讯”报道说：“国大党领袖克·普·马

德哈文·納雅尔虽然渴望这次选举不至由于缺乏經費而遇到困难,但是却說国大党全国委员会‘甚至不願意給我們一文錢……。他說支援是由无名人民用一个或两个卢比的小額匯票寄来的,而且大批工人宣称要来支持我們。’”这篇报道又說:“話虽如此,国大党領袖臉上的張惶和焦虑神色却反而厉害起来了。”

5月16日——选举日——的晚間,在德維科倫选区的一个电报局里,有这样一封电报拍給賈瓦哈拉尔·尼赫魯:“亲爱的潘迪特吉:喀拉拉邦曾几次使你失望,但是,这一次我們不会再使你失望。你可以怀着喀拉拉邦已經再度成为我們有力的一环的心情到庫魯去休息。我們將以巨大的选票获得胜利。馬德哈文·納雅尔。”

在喀拉拉邦,馬德哈文·納雅尔这个名字原是很普通的,我們无从得知这位馬德哈文·納雅尔究竟是何許人,但是毫無疑問,这封电报表达了国大党人在选举結束后的那种得意忘形的心情。当选举結果在5月19日公布的时候,人們就清楚地看出,那只不过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願望罢了。罗薩瑪获得了五万五千八百一十九票;而布·克·奈尔則获得四万八千七百三十票;革命社会党所支持的克·斯·苏伯拉馬尼安只得了七千六百九十票。1958年5月20日“印度快报”报道說:“彭諾斯夫人在这次竞选中的胜利不仅加强了共产党在議會中的实力,而且也使它威信大振。这次选举向世界表明,不管別人会說什么,人民,特别是工人和农民是支持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的。这次选举也使威信早已扫地的国大党遭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德維科倫的惨敗使德里的国大党最高当局大为震惊。“印度快报”(1958年5月21日)的特派記者报道說:“国大党

在喀拉拉邦德維科倫补缺选举中所遭到的失敗，对国大党最高当局來說，是一次严重的打击，根据該党地方代表的报告，該党最高当局絕沒有預料到共产党会得到这样惊人的多数选票。人們认为，这是对国大党，特别是对喀拉拉邦的国大党的当头一棒。国大党自从下台以来就努力进行整頓，但是事情很明显，它并没有改进。”

国大党的中央领导集团感到震惊不已，而喀拉拉邦国大党的領袖諸公竟被吓得目瞪口呆。“印度时报通訊”报道說：“德維科倫的失敗打垮了喀拉拉邦所有反对党的士气。遭受打击的不仅仅是国大党一党而已。人民社会党、穆斯林联盟和革命社会党也都同样受到了打击。”（1958年5月26日）

德維科倫的失敗使国大党惊慌失措，竟一时无法自解。在选举揭曉以后，喀拉拉邦国大党主席克·阿·丹默达拉·梅农所能对記者說的只是：“国大党在德維科倫补缺选举中的失敗是出乎意料的”，接着又說：“这次失敗只能使我們在反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更加坚决。”（見1958年5月21日“印度快报”）

当然，人們从来就沒有指望国大党能謙虛一些，对自己的錯誤政策重新估价，痛改前非。不过，他們利用德維科倫的失敗来发动另一次誣蔑共产党人的运动，竟也出乎国大党評論家的意料之外。很明显，捏造謊言是需要花費几天工夫的，不过，德維科倫的慘敗毕竟很快就轉变为一場毀謗喀拉拉邦政府的攻势，而“反共产主义的坚决斗争”也就这样繼續下来了。

不久以后，解釋这次“出乎意料的失敗”的說法便滔滔不絕、源源而来。名落孙山的国大党候选人布·克·奈尔

竟捏造出这样的滔天大谎，说什么为了“冒名顶替”，共产党人竟从外地运来了两万人。他又指控说，负责选举事宜的官员偏袒共产党人，同时共产党人又任意利用金钱和美酒进行活动。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滔天大谎并不是紧跟着5月16日——选举日——以后就提出来的，而是隔了好几天在5月19日以后才提出来的，这时计算选票工作已经结束，同时选举结果也公布出来了。因为捏造谎言也是需要一些时间的，甚至这些谎言有时也还需要变动。无论如何，不出几天，选举“失败”的种种说法总算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喀拉拉邦国大党主席和其他国大党发言人开始一口咬定，德维科伦的选举名册曾被严重地篡改过。从此以后，这个滥调便始终唱个没完。7月的第一个星期，邦议会举行了短期会议，这个滥调就更肆无忌惮地被唱了起来。

人们虽然不指望喀拉拉邦国大党人演出什么好戏，但是仍然诚恳地希望国大党最高领导至少能认识到喀拉拉邦国大党目前的领导机构的不称职，而采取某种断然的措施来改善喀拉拉邦国大党在工作上的腐烂透顶的状态。事实上，许多对喀拉拉邦国大党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都肯定地认为，如果国大党最高当局要解散任何邦的国大党组织的话，那末这就是喀拉拉邦的国大党组织了。

但是，当国大党新任总书记萨迪克·阿里在6月的第三个星期，也就是在德维科伦遭到惨败的一个月以后，前来喀拉拉邦访问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愿望便落了空了。人们原指望萨迪克·阿里会深入研究喀拉拉邦国大党的事务。但是恰恰相反，他竟也弹起了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滥调，因而人们大为失望。他在特里凡得琅对记者说：“邦内许多地方

的选举名册由于添加了‘假姓名’而人为地膨胀了起来……这是一件需要加以研究的事。”（見 1958 年 6 月 27 日“印度快报”）此外，薩迪克·阿里竟不顾摩·德賽以及弗·克·克·梅农这些国大党領袖反对国大党与人民社会党結盟的明确声明，反而贊許这一措施，他說，邦国大党委员会有和任何党派达成協議的自由。

虽然薩迪克·阿里沒有濫用什么“极权主义”的陈腐論調来反对共产党政府，但是他却毫不隱諱地表示他的信念，这就是“共产党的民主概念”是“不明确的”。如果我們回顾一下这位国大党新任总書記过去就喀拉拉邦問題所发表的言論，然后再来衡量他上面說的那句話，未尝不是沒有益处的。1957 年 8 月 30 日，薩迪克·阿里曾以国大党全国委员会青年組織顧問委员会委員的身份，在埃納庫兰姆为喀拉拉邦国大党青年代表大会致開幕詞。在这个場合下，他會說过，当他“在邦內各地作訪問旅行的时候”，他看到喀拉拉邦目前在民主的名义下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顛复和破坏民主精神的”（見 1957 年 9 月 2 日“政治家报”）。当时他甚至還說，所有的“民主力量”應該团結起来，把“共产党赶下台去”。

喀拉拉邦当地的一些国大党人在評价德維科倫失敗的时候，显然比这位国大党新任总書記要现实得多。本章前面所提到的珀魯范伯地方的克·尔·姆·奈尔就曾說过，“派系之間的斗爭和教派之間的疑忌使国大党淪落到今天这样可怜的地位。在目前的选举中，这两种弊端都是非常明显的。”（見 1958 年 6 月 2 日“印度快报”）

事实上，“印度时报通訊”也报道說，某些“反对（和非共产主义政党）团結和反对国大党目前在党内和議會內的領

导机构的国大党领袖，已经成功地破坏了这次选举运动。”

(見1958年5月26日該報)

为了了解喀拉拉邦国大党在德維科倫惨敗以后的行徑，有必要简单地談一談喀拉拉邦国大党目前所存在的派系傾軋的情况。对于这个问题，“印度时报通訊”已經敏銳地喚起人們的注意。直到今天为止，个人的糾紛和派系的傾軋仍然是喀拉拉邦国大党内左右一切的动力，即使在经历了所有落在头上的灾难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变。以帕南帕利——前喀拉拉邦首席部长——为首的集团反对与人民社会党締結任何联盟，他們的主要論点是，如果领导得当，国大党本身就足以击败共产党。很明显，这个論点的言外之意是，不論是邦国大党組織，还是国大党議會党团，都操在无能之輩的手中。事实上，在某种場合下，帕南帕利曾公然表示他对邦議會里的领导深为不滿。

这件事，实际上和恰拉庫迪地方預料要举行的补缺选举有关。在上次大选中，帕南帕利就在这个地方被共产党所支持的一位人民社会党候选人所击败。这次，人民社会党领袖巴頓·丹努·皮萊提出要求說，既然人民社会党曾在德維科倫支持国大党的候选人，那末，国大党就必須在恰拉庫迪支持人民社会党的候选人。帕南帕利渴望这次再度被提名为国大党的候选人；但是在国大党和人民社会党團結的种种活动后面，他却看到了巴頓的阴影。毫無疑問，巴頓对帕南帕利是恨之入骨的，因为他的第二届內閣就是由于帕南帕利的陰謀才垮台的。事实上，巴頓最近也毫不隱諱地指出：“邦內的某些国大党领袖对于某种能够把这个邦从共产党的虐政下拯救出来的工作方式是不感兴趣的”。在德維科倫补缺选举以前的几个星期，他曾发表談話，而且深

为惋惜地说：“国大党甚至到现在还没有发表一项正式声明或通过一项决议，来敦促邦内一切信仰民主的党派建立一条统一战线来对付共产党。”（见1958年4月25日“印度快报”）

普·特·查科和巴顿最近之所以过往密切，可以用他们对帕南帕利的共同憎恨来解释，他们两人都决心不使帕南帕利被提名为恰拉库迪的候选人。在这件事上，他们似乎得到了喀拉拉邦国大党委员会主席克·阿·丹默达拉·梅农的支持。

因此，大部分不可思议的政治活动都是由于喀拉拉邦反共分子的这种令人惊讶不置的不和而造成的。为了讨好当局，双方都热衷于证明在反对共产党上比对方更恶毒。在竞相反对共产主义的活动上，他们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他们竟干出了这样的事来，帕南帕利在特里朱尔的公营斯塔拉姆面粉厂的一次虚假的罢工中，竟领导着队伍上街游行，大喊口号。有六千多名“自愿者”被关进了监狱。在这些“自愿者”当中，有许许多多是从乡村前来特里朱尔作买卖而往往难得赚上一个卢比的小贩。凡是参加“不合作运动”而在监狱里待上两个星期的，每人都得到了四十五个卢比。在此期间，如果作买卖最多也只能赚上十五个卢比，而现在竟得到了四十五个卢比，这的确是一宗很不坏的交易。

当帕南帕利这样施展自己反共的“豪侠”气概时，普·特·查科也不甘落后，在议会内外大肆咆哮。在邦议会于1958年7月举行短期会议期间，他竟抓住南布迪里巴德在科因巴托所作的那篇（“内战”）演说大吵大闹起来。他的演出终于在7月8日在特里凡得琅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告闭幕，在这次招待会上，他威胁说要把那些“从内部破

坏宪法”的共产党人“消灭掉”。

至于克·阿·丹默达拉·梅农，就更胜一筹了，他指控共产党政府用添加假姓名的办法使选举名册人为地膨胀起来。他也同样穷凶极恶地提出指控说：“共产党加剧了恐怖主义的策略，企图表明他们的党徒自己就可以在喀拉拉邦过一种无畏而和平的生活。”（见1958年6月23日“印度快报”）不过，丹默达拉·梅农在喀拉拉邦似乎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1958年3月，他在特里朱尔县的政治会议上曾破口大骂共产党，当时一家无党派而很有势力的马拉雅利文日报——“喀拉拉邦库穆迪”写道：“至于丹默达拉·梅农先生的那篇‘登山训众’的演说”，对于喀拉拉邦的人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喀拉拉邦人民对于他的变幻无常的政治经历是了如指掌的。（见1958年4月1日该报）

在德维科伦遭受惨败以后，国大党的领袖诸公就这样变本加厉地展开了反共的敌对运动。政治的纠纷很可能发展到不厮杀不足以解恨的地步，这种危险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可是喀拉拉邦国大党人却视而无睹，他们已经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反共的斗争中。

像喀拉拉邦这样一个既贫困、而又人口过剩的邦，显然不能用各主要政党作你死我活的斗争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只应该把相互消灭的说法看作是狂人呓语。

说来很奇怪，对国大党最中肯的忠告却来自共产党的南布迪里巴德。在德维科伦选举以后，南布迪里巴德曾劝告国大党“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政策，要像一个建设性的反对党那样履行职责。”后来他在科因巴托引申这段话时说，如果各反对党不采取建设性的态度，反而联合起来企图消灭共产党，那末，这只会产生一个灾难性的局面，接着，他还



举出中国作为例子。但是国大党人不但没有从这种忠告中吸取任何教训，反而抓住南布迪里巴德的谈话，说他用内战进行威胁。这种叫嚣一直漫无节制地继续下去。

在德维科伦选举以后，就喀拉拉邦的发展情况来看，不禁令人想起喀拉拉邦国大党身上已经长了毒疮，而且无法救药。唯一的办法便是从印度国大党的主体上把这一肢割去。然而，可能与否，却大成问题。危险还在另一方面：喀拉拉邦国大党的毒疮显然正在向国大党的全印组织蔓延。事实上，如果听其自然，在下届大选中，喀拉拉邦国大党在邦议会丧失至少50%的力量，当是意料中的事。

至于喀拉拉邦共产党，威信则空前提高。人民日益感受到共产党的政策为他们带来的利益。“喀拉拉邦库穆迪”最近说：“如果现在的政府被推翻而让它的继承者施政一个短时期，人民就会再度祈求总统来统治他们了。在这种情况下，让这个已经施政一年的共产党政府继续执政，不去推翻它，同时向它提出建议，纠正它的错误，岂不是更好吗？不要丢掉钻石而向往铅块的谚语，难道不是先圣给我们的忠告吗？”（见1958年4月4日该报）

### 十三 向国大党同人进一言

德維科倫的补缺选举証明，喀拉拉邦的选民并不认为作为反对党的国大党比在掌握政权时更令人滿意。共产党在德維科倫选区的胜利，使該党成了全国注意的焦点。这次补缺选举所引起的振奋情緒也許正足以說明，人民在思想上已經有了一個新方向。

德維科倫的补缺选举还証明，单凭演說，甚至狡猾地玩弄教族主义，簡直就不可能贏得选民。十年来的自由显然并没有筑起一堵阻止覺醒了的人民越来越不滿印度执政党的高墙。

究竟是哪些因素使人民和国大党之間出現这个日益加深的敌对性的鴻沟呢？又是什么力量使公众的意向产生这种拥护新領袖和新政党的新轉变呢？

德維科倫的补缺选举十分尖銳地提出了这些問題。根据上面所談的全部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喀拉拉邦国大党并没有能从經驗中吸取教訓；不过，印度其他部分的国大党人則又当別論。深深地思考这些問題，力图革故鼎新，正是所有拥护国大党崇高理想的党内光明磊落之士的神圣职责。

已經退休了的印度首席法官麦赫尔·昌德·馬哈詹說得好，“尽管各方面都有进步，但是在一般人民中間——也許只有那些特权階級的人們例外——对每一件事情却存在着极强烈的不滿情緒。尽管有各种改进工业和經濟的計劃，

这种不满还日益在滋长中。在我的漫长的一生中，我从来还没有经历过这样强烈的不满情绪”（见1957年10月8日“印度快报”载“粮食：幻想和事实”一文）。

但是，这种强烈的不满情绪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国内某些最善于高谈阔论的人士常常谈起道德的危机，并且为世风日下的现象痛心疾首。国内也许果真存在着一种道德的危机；但是，更加确凿的事实，却是我们面临一场把整个国家都席卷在里面的经济和政治危机。无可否认，道德标准是和社会的经济条件息息相关的。因此，目前的不满情绪的根源就在于人民最主要的必需品的缺乏；也就是粮食和其他必需的消费品的缺乏。把1940年的主要商品价格同目前的价格略略比较一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小麦的价格不仅决定和控制其他谷物的价格，而且还决定和控制其他消费品的价格。小麦价格已经从每茂<sup>①</sup>二点五卢比或三卢比上涨到二十五卢比，甚至二十五卢比以上。工资和收入也增加了，但增加的幅度没有这样大。人民的购买力下降了，生活条件每况愈下，除了少数在牺牲人民的代价下致富的人以外，几乎普遍存在着不满的情绪。

如果我们把英国人统治期间所遗留下的因素撇开不谈，那末，使印度人陷入日益严重的灾难中的唯一根源就是国大党的十年统治。人民曾一度把信任寄托在国大党身上，对它进行支持，这种支持在世界历史上是罕有其匹的。的确，他们对国大党的期望是很大的。他们相信，国大党当政以后即使不能全部解决他们的困难，至少可以把他们的痛苦减少到最低限度。人民对国大党所抱的期望全部落空

---

① 印度衡量名，法定每茂等于37.32公斤。——译者

了；这一事实就解答了馬哈詹所提到的那种极端不滿的原因。

在独立后的岁月中，尼赫魯領導下的国大党的确制定了一项国家經濟复兴計劃。当然，像印度这个惨遭帝国主义者一百多年最橫暴的統治而被蹂躪得滿目疮痍的落后国家，要从事經濟复兴，本不是易事。制定一个正确的計劃是首要的任务；感謝尼赫魯，他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人們認識到第一件大事是解除劳苦农民的負担；因而，土地改革方案受到了应有的重視。人們也同时認識到，如果重工业沒有相应的发展，农业复兴是不可能的；于是，一项工业化的方案就拟定了出来。此外，人們也非常正确地理解到，只有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能消灭我們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落后状态。国大党阿瓦迪年会<sup>①</sup>接受了建設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建議，联邦議会也一致通过了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決議；这正标志着人民的一个重大胜利。

但是，在所有这些发展的道路上都存在着障碍。最近有一位广播評論員說得好：“国内普遍地存在着一种看法，这就是，除了中央政府中的少数領袖以外，其余的人对于計劃或計劃的目标都沒有什么同情，而把两者都看作是‘尼赫魯的标新立異的想法’；人們对于他这种想法只是不自然地加以贊許罢了。”这位評論員又說：“照目前的情况来看，不仅是一般民众，甚至連执政党的二、三流領袖都不知道計劃是怎么一回事，它打算达到什么目的”（“国内一周”，見1958年7月10日“印度时报”）。

国大党最高当局和二、三流領袖对他們所接受的目标

---

<sup>①</sup> 指1955年1月国大党在馬德拉斯邦阿瓦迪举行的第六十届年会。——譯者

和政策的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正是一切困难的根源。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政府为什么没有执行计划中的许多方案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土地改革方面比在其他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独立后的十一个年头中，国大党政府始终没有制定一项有效的法律来制止夺佃的行为。国大党工作委员会 1958 年 7 月 12—13 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会议中提出评论说：土地改革的进展是迟缓的。

关于国大党的目标是什么的争论，在各级国大党组织中都存在着。国大党的一位前任首席部长——汉努曼撒亚——坦率地阐述了这种情况。他说：“当巴特尔先生在的时候，社会主义概念就没有进入国大党。只是在 1957 年，当坦登先生辞掉国大党的主席职位而由尼赫鲁先生兼任联邦总理和国大党主席以后，尼赫鲁才企图实现这个他曾经培育了很多年的理想。于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便在阿瓦迪发生了。那些以往反对社会主义的国大党人，这时竟也举手赞成社会主义了。没有一个国大党省邦委员会曾通过拥护社会主义的决议，也没有一个省邦议会曾想到过社会主义。五十多年以来没有被接受的东西竟在两小时内被接受了。”

汉努曼撒亚接着又说：“印度有过两三个伟大的皇帝，其中包括阿克巴<sup>①</sup>和阿育王<sup>②</sup>。阿克巴非常伟大，他不满意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而自创了一种新的宗教，叫做‘真主之徒’教(Din Ilahi)。但是，这种宗教在阿克巴死去的时候也就随之消灭了。尼赫鲁的新社会主义也将遭到同样的命运。尽管他说，民主必须保持，社会主义也必须实行。尼赫鲁先生的处境与阿克巴皇帝的处境是相同的。他创设了这种

① 十六世纪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一皇帝。——译者

② 纪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的一皇帝。——译者

新的政治宗教——社会主义。他从民主国家抄襲了一些观念，从俄国和中国抄襲了一些观念，另外又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抄襲了一些政治思想，而企图推衍出一种新的政治哲学。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尼赫魯先生的副手們，也就是那些目前非常信仰他的人士，将来必然会首先說，尼赫魯先生不在了，因而这种新社会主义也应该同归于尽。”

由此可見，目前的悲剧就在于，一批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士在执行着一种基本上向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计划。更糟的是，这批人士抱着特殊的思想和概念，他們相信自己无所不通，因而不研究，也不知道新世界的趋势和思想。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布·克·罗伊博士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錫德哈撒·雷說：“看来某位人士已經使首席部长相信，既然政府沒有办工厂做买卖，那末，由政府人員成立工会的問題就根本不存在。”（見1958年6月28日“印度快报”）人們会认为这个有关商业和工会同政府关系的离奇創見，与“五个指头”的概念同出一轍，而且的确是很可笑的。不过这并沒有有什么用，因为領導的任务并不是使人发笑，而是要做出成績来，消除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穷困局面。

我們已經注意到，使我們的总理恼怒的事情有一件是，左翼反对党在攻击他的政府的各种失敗之余，竟只字不提政府的成就。

总理的恼怒固然大有原因在，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人民所最关切的問題就是立刻得到解救。在每天不可能吃上两頓飽飯的时候，人人都希望至少能吃到一頓飽飯。当广建住宅的工程还遥遥无期的时候，人民都渴望看到，千百万人以城市便道为栖身之地的凄惨現象纵使不能消灭，至少也应该有所减少。当彻底改革目前土地租佃制度也許还要

拖上几年的时候，人民当然都渴望夺佃的行为能够立刻加以制止，而喀拉拉邦共产党政府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这就是计划委员会和政府的官员所公布的洋洋大观的政绩统计数字并没有使人民受到感动的原因。因为人民忘记不了的是饥饿和痛苦，是贫困和匮乏，是精神和思想不断受到压制等这些冷酷无情的事实。曾在独立前激励印度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使他们完成与外敌进行斗争的英勇事迹的上述事实，今天在印度依然严重地存在着，而且存在的形式也许更加恶化了。英国用尽了举国的武力也没有能制服群众由于饥饿和痛苦而激发起来的正义愤怒和行动。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印度政府就不会激发起同样的愤怒情绪，尽管这个政府是在尼赫鲁这样杰出的人物领导之下的。

社会主义对很多人意味着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同平均主义混为一谈，社会主义的确包含一个简而易明的真理，这就是，它意味着一切形式的剥削的结束。不管政府实际上作的是些什么，也不管国大党的负责发言人在表明他们自己时是多么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确得到他们足够的承认，至少在口头上是这样。自从“国大党盔甲上的裂缝”在喀拉拉邦出现以来，承认社会主义的趋势更大大加强了。不过，事实是财产税、消费税以及类似增加消费税的措施等都不能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保证。当然，拖延就土地持有亩数的最高限额作出规定更不是社会主义。

国大党的社会主义概念仍然是含混而不明确的，不管他们怎样解释社会主义，或是给社会主义下什么样的定义，却始终没有强调过社会主义意味着终止剥削这一事实。有这么一位在国大党最高执行机构窃居高位的碌碌无能的野心家，他写了一连串的文章，从总统府的经济学一直谈到氢

彈的經濟學。這些文章都是作為國大黨的正式出版物發表的，因而可以看作是國大黨對社會主義的權威性的意見。不過，一般都認為，像這些文章這樣令人大失所望的文件的確還不多見，這也許是很自然的事吧。這些大作中竟沒有一處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含義包括人剝削人的現象的終止。

我們在報紙上讀到，在所有參加7月12日在新德里舉行的國大黨工作委員會會議的人士中，北方邦首席部長桑姆普爾納南德竟發起“討論國大黨意識形態和綱領在社會主義概念中的哲學基礎”（見1958年7月3日“印度快報”）。這簡直是因社會主義定義而產生的混亂情況的一個悲慘結局。桑姆普爾納南德甫自喜馬拉雅山聖巴德倫那斯峰旅行歸來。據說，他到那里去是為了自己在一位共產黨人所提出的選舉訴訟中獲勝而向神明謝恩的。我們都知道他對占星學素有偏好。對於桑姆普爾納南德在工作委員會中所發表的高論，尼赫魯有何感想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事實很明顯，這位北方邦首席部長早在1937年就為了北方邦政府中的一個部長職位，出賣社會主義和他的畢生同僚——已故的阿恰亞·納倫德腊·德瓦。

但是，奇怪的是，關於“社會主義類型”的解釋大都來自國大黨組織中那些自稱為反動分子的人們。他們的企圖是把社會主義作為一種迥然不同於共產主義的東西提出來，但同時他們又不明確自己的社會主義的定義，而聽任它模糊不清。在他們的手中，社會主義只不過是用來同共產黨進行鬥爭的一種武器罷了。

因此，我們就不可避免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國大黨內的反共分子正利用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作戰，而且情況越



来越严重。他们仅仅在这一点上利用了阿瓦迪年会的伟大决定，而所有力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具体解释的企图都被他们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眼前就有一个例子，它说明国大党内有一批人企图鞭策党的最高当局明确态度，但他们的建议几乎在提出时就被破坏了。这批人的目的就是要使国大党的社会主义类型的概念具体和明确起来。这本是值得赞许的事，而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书记处的反共分子竟向工作委员会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反对这种作法。自此以后，这批人几乎就被忘掉了。

对待社会主义的这种暧昧态度的固有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里面孕育着独裁的种子，因为在这种态度之下，所有的反对党很快就会被看成是共产党了。事实上，西孟加拉邦国大党首席部长已经表现了这种态度。最近，他把加尔各答的各次饥饿示威游行都归咎于“分裂主义者”，而大加责难。新闻界也免不了受到一番指责。“印度时报”的一位专栏作家被激怒了，他写道：“根据布·克·罗伊博士的说法来看，他已经和某些国大党部长不相上下了，他们把对政府的最轻微的批评也看作是共产党的颠覆活动”（1958年5月8日）。

由此可见，国大党组织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危险地坚持走混乱而消极的路线，而另一方面内部的腐败又在继续蔓延。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冠冕堂皇的决议和崇高的劝告都不能制止腐败的蔓延。几乎在每一个邦里，国大党都被敌对的派系攻击得体无完肤。几乎各个地方的国大党领袖都在为权位忙于尔虞我诈的阴谋活动。部长们都热衷于拉拢选民，而不大关心加强地方的国大党组织。许多高居领导地位的人士都醉心于首席部长温和地称之为“假公济

私”的勾当。

由于缺乏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理想，国大党已经有陷于内部分裂的趋势。有很大一批身为国大党联邦议会議員和邦议会議員，同时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中也有代表的权势赫赫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计划、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很少有信心，而对于这些方面的理解则更谈不到了。尼赫鲁总理最近在人民院就有关政府科学政策的决议进行辩论时所作的回答中说得好：“在印度发展科学和科学方法的过程中，必须同生活在牛车和原子能同时并存的时代中的人们的‘分裂人格’和‘双重思想’进行斗争。”（见1958年5月2日“印度快报”）

事实上，这些“分裂人格”偏巧整天地在总理的身傍徘徊。国大党所需要的是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坚强团结，而尼赫鲁则被那些矢志效忠于他的人們所包围，而这些人思想偏偏又和他大相径庭。的确，在当前这个关头，国大党最高当局没有履行他们公开宣布的原则适足以说明国大党的软弱无能。

因此，国大党组织的瓦解以及在普通人民中的威信日落，就成了不可避免的后果。既然国大党人的主要动机是扩大个人的权势而不是为民效劳，又焉能产生别的后果呢。报纸上满篇刊载了有关国大党内部解体的惊人报道。我们只举一个例子来谈谈：据报道，1958年5月有人企图在北方邦阿里戈县阿亨村杀害北方邦部长莫汉拉耳·高滕，因而警察迫不得已开了火。在高滕发现这个企图“有反对他的国大党派系的人参与时”，阿里戈县国大党委员会就指责这位部长是谋杀一位著名的国大党县委员会委员的共谋犯。此外，根据来自詹赫诺（拉贾斯坦）的一项报道说，国大党的

两个派系进行了一场恶斗，“在交手中，双方互以带铁箍的木棒和石块殴打。”（見1958年7月7日“印度时报”）

尼赫魯亲眼看到了这种急轉直下的墮落情况而束手无策；这真是一幕悲剧。实际上，尼赫魯发现自己莫明其所以然地被孤立起来了，而且对于周圍所发生的事情，他也許并不是常常能获得报告的。最近他以退休相威胁，另外他在国大党議會党团以及后来在国大党全国委员会會議上又发表了充滿苦悶情緒的演說，这正反映了这个事实。尼赫魯固然沒有坚持退休，但是这个退休威胁却只能被看作是对这种令人忿懣的局面的一种公开挑战。他的挑战是在5月提出的，而他的思想活动早在前一个阶段就已經很清楚地流露出来了，只不过是沒有被人注意到罢了，1958年2月，尼赫魯步高哈蒂的后尘，拒絕出任国大党議會委员会委員。显然，他看不下去委员会中一向沒有中斷的拿議席作交易的勾当；現在阿薩德又不在了，因而他那易于激动的头脑便决定置身事外。

事实上，尼赫魯和他的同僚之間存在着裂痕是不容怀疑的。尼赫魯是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而他的同僚們——如果他們可以自行其是的話——則想充分发展私人企业。裂痕不仅存在于經濟政策方面，而且也存在于社会观方面。尼赫魯相信現世主义、科学和技术。右翼分子則都是傳統主义者，他們相信渐进的改变，主張精神价值。这两种趋向之間的区别不仅在印度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也是全世界評論的对象。关于尼赫魯的退休打算所引起的反应，卡巴迪发自倫敦的报道（見1958年5月2日“印度快报”）說，西方观察家认为，他的內閣中的“神牛”集团已經占了上風；就稳定千百万不能忍耐的人民來說，国大党則被拉得过于靠右

了。以对英国女王提出坦率批評而享盛名的英国貴族奥特林厄姆勋爵，在“訪問了这个国家以后”在“全国英語評論”上撰文叙述他对印度的印象。他写道，对“新印度”來說，那里存在着一种来自“名为新复古运动”的“潜在的威胁”，“这种复古运动是甘地主义的过于死板、过于概括的应用”，其中还包含“对工业化和所謂‘巨大主义’（大致是指巴克拉水壩那样的大規模建設工程）的进攻。”（見1958年3月28日“印度快报”）

实际上，相当一段時間以来，某些地方就出現了一种阴谋企图，想“教育”这个国家，使人們相信总理不仅有从政府、而且甚至有从政治生活中引退的必要。从德里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可以看出，总理并不是沒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当时有人問总理这个暂时退休的建議是不是由一批“議會外的右翼活动家”怀着某些不可告人的动机而提出的，接着总理就回答說（見1958年4月5日“印度快报”），即使他退休了，他也不致于完全不发生作用。不但如此，如果他果真退休的話，对于那些所謂“議會外的右翼活动家”实际上倒还反而不利。

尼赫魯和他的同僚在社会观点上有裂痕，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事。尼赫魯在从事民族运动的早期就已經看到了这一点。提伯尔·門德引尼赫魯的話（見“同尼赫魯先生的談話”第21頁）說，他对于运动的社会方面是有怀疑的，“因为我还不能十分肯定我的同僚有足够的社会意識。”随后，在他的“自傳”中也出現了这样的話，他“痛苦地”感到他的道路和他的同僚不同。此外，他在其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中談到，当国家計劃委员会由当时的国大党主席苏巴斯·錢德拉·鮑斯組織起来并由他〔尼赫魯——譯者〕任主席的时候，

“委员会的产生原是由于国民大会党的发起，但其中国大党中的重要分子却将委员会看作是个乘儿，不知道他怎样会长得大起来，并且对于它未来的活动也颇为怀疑。”<sup>①</sup>

由此可见，现世主义和科学的道路同信仰复兴者和唯心主义道路之间的鸿沟，在国大党内始终是存在着的；不过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由于圣雄甘地的影响，这道鸿沟一直是潜伏着的，简直就没有显露出来过。

在独立后的年代中，印度经历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些事件所留下的印象使人民敢于提出新的问题。一系列毁灭性的打击，已经使帝国主义制度遭到挫折。复活了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日益高涨的非洲各国人民的自觉，正在对这个暴虐世界的制度施以最后的打击。美国是唯一残存下来的强大帝国主义，它正面对着苏联的日益强大的力量；更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又大大加强了苏联的力量。

所有这些发展深刻地影响了印度。邻邦中国所走的新的、光辉的进步道路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尽管诬蔑中伤和授意的宣传层出不穷，新中国仍然日益强大了起来，特别是它的千百万人民正过着新的幸福生活；这些事实都是无法否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1949年诞生的，而印度获得自由还比中国早两年。印度的人民不禁要问：如果过去惨遭剥削和压迫的中国的千千万万人民今天都能够无忧无虑地吃到饱饭，那末，为什么印度就办不到呢？如果贪污、腐化和裙带风能够在中国消灭，那末，为什么在印度还严重到这种地步呢？

<sup>①</sup> 见世界知识社1956年版，第523页。——译者

事实上，中国今天正在向印度伸出友誼之手，正象許多世紀以前印度以佛祖的法音向中国頻傳友誼的語言一样。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用人类鮮血染紅了中国土地的那种殘酷的級阶斗爭将来也要在印度发生。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們相信，不采用流血和战争的方法就能給广大的印度人民带来幸福，将是印度的特征；而流血和战争在中国之所以不可能避免是由于历史的决定。

通过历史而具备更优越的条件来在印度实现这样的和平过渡，除国大党外，再也沒有其他組織了。这是誰也不能否认的事实。自从共产党最近获得进展以来，特别是从共产党政府在喀拉拉邦成立以来，国大党的这项特殊任务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反而是加重了。明显的事实是印度共产党是从国大党产生出来的<sup>①</sup>，受到印度偉大的民族斗爭的深刻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的执政更証实这个事实。

这就是国大党和共产党之間不需要发生冲突的原因。从某种意义来說，共产党在阿姆利則接受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原則，未尝不是国大党概念的胜利<sup>②</sup>。国大党的任务应该用正确的眼光来看印度的发展，并通过适当的政策来进一步保証印度国内的和平发展。人們期望国大党——許多組織的母体——能够在我們历史上这个危急的时刻，慎重从事，保証团結一致的进展，而避免从事兄弟鬩

<sup>①</sup> 事实是，印度共产党在1933年成立后，便在1934年被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为非法組織，印共被迫轉而进行地下活动。1935年以后，印度共产党采取了民族統一战綫的策略，一些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当时具有各阶层反帝統一战綫組織性质的国大党和国大党各級委员会的工作，和国大党员一起进行爭取民族独立的斗爭。后来，他們退出了国大党。——譯者

墙的杀戮。

为了使国大党能够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那些左右它的命运的人士必须认识到：领导人民恰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领导的艺术上是沒有阳关大道可走的，只有那些不畏艰辛不怕困难的人才能攀登顶峰。

然而，不幸的是，在国大党领袖中，具有适当的历史观念和必要的高尚品质，因而能以正确观点来对待事物的仅有尼赫鲁一人。尽管尼赫鲁是属于国大党的，但他不仅仅是国大党的领袖而已。他是国家的领袖；而且他自己也深深了解这一点以及从而承担下来的责任。

尼赫鲁的最大障碍是他的同僚。在明智的尼赫鲁和他的无知的同僚之間存在着一段很长的距离。他們的无知似乎更加强了他們的偏見。他們所追逐的只是权力。但是，他們所追逐的权力的本质究竟又是什么呢？托尔斯泰曾經說过：“最坚强、最不可分解、最累贅和长久的羈絆就是所謂

---

② 1958年4月，印度共产党在阿姆利則举行的特別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中指出：“在爭取实现自己的当前的和最終的目标的斗争中，印度共产党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基本原則作为它的指南的，因为只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基本原則才能給劳动人民指出消灭剝削階級的統治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正确道路”；并且指出：“印度共产党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是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和印度的现实条件相結合的原則的，是考虑到印度的历史和它的民族特点以及考虑到印度人民的优良傳統的。”同时指出，在一系列条件下，“印度共产党力求用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充分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在1958年4月“关于党章”一文中說：“……今天在印度已經有可能在大規模的群众运动的支持下，通过議會，采取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当然，这种可能性决不等于必然性，因为資产階級对人民的意志会实行反抗，到那时，使用暴力的責任就应当由他們来負了。”——譯者

权力，而权力的真正意义只不过是對它們的最大程度的依賴罷了。”

國大黨組織的病根正是它的各級領袖們為了保持自己的權力而對黨內首腦們的這種“最大程度的依賴”。而對黨內首腦們的依賴就意味着忽視他們的過錯。這些過錯和派系主義又導致了腐化。從腐化中又產生了偽善。最顯眼的偽善就是這樣的作風：他們在尼赫魯面前承認一件事情，而在他的背後則駁斥同一件事情，甚至還批評他“想法離奇”。

我們只舉一個例子來談談。1958年5月3日，尼赫魯撤銷了他的退休建議。在撤銷這個建議時，他對國大黨議會黨團發表了一篇令人激動的演說，對周圍所看到的墮落情況和營私舞弊等等現象表示痛心。而國大黨議會黨團執行委員會的一年一度的選舉則是在1958年5月5日舉行的。“印度時報通訊”（1958年5月6日）報道說：“今晨在議會舉行的國大黨議會黨團執行委員會的年度選舉中所看到的那種非常活躍和緊張的奔走活動，似乎暗示尼赫魯先生就‘營私舞弊’的禍害所作的勸告，對那些僅僅在兩天以前還保證要洗心革面的人們，並沒有留下持久的影響。”

我們還可以提一提另外一個例子。在幾天以後舉行的國大黨全國委員會的會議中，尼赫魯猛烈地攻擊了那種甚至在國大黨最高級領袖中也存在的教族主義和復古主義，同時嚴厲地批評了對待烏爾都語——特別是在北方邦內——的那種卑鄙的手段。接着工作委員會就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各邦政府給與烏爾都語以應有的地位。北方邦的前任和現任首席部長——潘迪特·潘特和桑姆普爾納南德——都參加了這些會議；而這兩位先生也就是北方邦的烏爾都語政策的負責人。但是，不出幾天，北方邦政府竟在



一份文件中悍然宣称，北方邦的烏尔都語政策是符合工作委員會的決議的！

這真是一個令人驚訝不置的現象。更何況，在尼赫魯面前是一套，在他背後又是另一套的現象，還只是舉國所見到的不體面的景象中的一部分。在尼赫魯的社會意識形態和右翼分子的唯心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傾向之間，還存在着一道鴻溝。

所有這些尼赫魯不以為然的復古主義者在反共行動中所採取的聯合方式，正是使這種傾向變得極端危險的原因。既反對共產主義，再加上對國大黨的社會主義目標缺乏誠意，其中自然就孕育着獨裁傾向的種子。

印度主要國民組織<sup>①</sup>的內部情況就是這樣，而這時共產黨人則穩固地團結在他們的政綱和政策之下，從勝利走向勝利。喀拉拉邦政府的成立和隨後發表的阿姆利則宣言正是他們初露頭角的表現。反共分子在這裡再度顯示了他們的短見，他們藐視這項動議，說什麼這是欺騙，虛有其表，而始終不去體會它在印度人民心目中所產生的影響。甚至像恩·格·蘭加和拉賈戈帕拉查里<sup>②</sup>這樣一向對共產黨吹毛求疵的批評家也把這項動議看作是真誠的動議而表示歡迎，這正是以反映這項動議的影響。阿卡里亞·維諾巴·巴夫也歡迎它，並要求人民相信共產黨。

① 即指國大黨。——譯者

② 蘭加曾任國大黨工作委員會委員和安德拉邦委主席，1951年—1955年間脫黨另組農人黨，後又與國大黨合併。但後來又退出國大黨。1959年8月，印度大資產階級政黨自由黨成立，他任該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席。拉賈戈帕拉查里原是國大黨元老，印度獨立後，曾任總督、內政部長及馬德拉斯邦首席部長。1959年8月，印度自由黨成立後，他是該黨中央領導人之一。——譯者

尼赫魯也把阿姆利則綱領看作一个方向正确的动議而加以欢迎。但这并不是說他已經放棄了他对印度共产党的苛求态度。尽管如此，印度共产党还是承认他是全国的領袖。这又証明国大党人和共产党人甚至在相互責难的情况下，也能相互尊重地共处下去。从本质上說，这就是所謂的党派共存。党派共存，如果可能的話，再进行互相砥礪和互相监督，正是印度今天的迫切需要。只有走这条道路，我們才能期望国家获得团結一致的进步。

因此，我們必須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共产党在印度的日益增长的影响。我們沒有引起疑忌和发动敌視共产党运动的必要，而應該进行率先为人民謀福利的合作。

如果不能这样去做的話，那仍然是因为尼赫魯的政策沒有被构成国大党領導机构的先生們所接受。事实上，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复古主义者今天已經形成了套在尼赫魯脖子上的一条绳索，使他无法为印度人民去做这项偉大的工作，而这项工作本来是他力所能及的。

印度的广大国大党人和党的健康核心（在党的上层机构中，这个核心无疑还是存在的），正无可奈何地注視着这个日益逼近的悲劇。他們唯一可走的道路就是仰望和焦急地等待着尼赫魯有一天会拿起一把大扫帚横扫那些唯唯諾諾的达官貴人——不信任者、蒙昧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把他們从有职有权的职位上赶走。这种清洗工作对一个組織來說，永远是有帮助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尼赫魯的作用对印度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也許是由于他了解到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同僚們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負担，他已經决定不容許他們进一步从事倒轉历史車輪的尝试。他在促进印度同其偉大邻邦中国

和苏联的友誼中所采用的强有力的方式、創議五年計劃以及在他的創議下，議會和国大党所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等，都已經替印度的未来历史規定了道路，而任何企图使我国放棄这些政策的右翼分子都沒有获得成功的希望。

不过，使人民大惑不解的是，即使在他知道那些心怀疑虑的同僚們并不相信他的对外政策或国内政策时，他仍然忠于他們。虽然他們并不情願，他仍在用自己的人格力量拉着他們跟着自己走。在一定的範圍內，这样做也許是正确的；但是，超过这个範圍，我們就无法认为，这有助于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孔子曾經說过：巧言令色鮮矣仁。

光明磊落的国大党人士虽然目前說話不多，但是他們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集团；当尼赫魯提議退休时，他們都真摯地希望，期待已久的、向右翼分子摊牌的时刻即将到来。毫無疑問，尼赫魯的建議是一次有力的挑战，只是沒有坚持下去。全国人民认为，如果这次挑战果真坚持下去，而得到合理的結論，对国家來說，未尝不是有好处的。

我們也許可以在这里向总理提一段往事。这件事发生在1987年，当时桑姆普尔納南德还是剛剛成立的人民社会党的一面旗帜。地点是在勒克瑙市政府的一个大厅里。国大党邦委员会正在开会选举邦长。以阿恰亚·納倫德腊·德瓦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支持桑姆普尔納南德，而以已故的腊費·薩哈为首的另一集团則提出了莫汉拉耳·薩克西納。会上发生了无休止的爭吵，尼赫魯力图举行无爭論的选举的嘗試失敗了。尼赫魯气得发抖，走到扩音机面前大发雷霆：“我討厭这些爭吵。当我問这个人时，他說那

位先生不同意；当我問那位先生时，他又說另外一位先生不同意。这真是奇怪而令人吃惊的事。为了两个半人，你們竟背叛了二十五万人。这是不能忍耐的。这是下流的。这是忍无可忍的。必須同这种現象作斗争，不让它有存在的余地。”

这是一次具有摧毁力量的演說。国大党邦委员会傾听了这次演說，接着便向尼赫魯欢呼。不久，桑姆普尔納南德便走上讲台，并宣布撤消自己的竞选，但他又說：“我不喜欢尼赫魯先生所讲的下流的說法。”尼赫魯几乎沒等他讲完，就跑到麦克風前，气得发抖，同时大声喊道：“我說这是下流、下流、下流、彻头彻尾的下流。我决不容忍这种現象。这是为两个半人背叛二十五万人。我要同这种現象干到底，干到底。”接着国大党邦委员会再一次向他欢呼。

我是根据记忆来讲述这段往事的。这件事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在那些与会者的脑海中刻下了永远不能忘怀的深刻印象。現在印度又一次面临类似的局面。我們不能为了少数不相信已經宣布了的的目标的同僚而不顾整个国家。

我們极其謙恭地向尼赫魯提起这段往事。大家都知道，誠实的国大党人和整个国家都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如果說我們从国大党内最近所出現的这种不幸和不合理的趋向得到任何教訓的話，那末，这个教訓就是，必須进行一次党内大清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国大党。

尽管尼赫魯年事已高，人們对他的期待无疑还是很高的。他仍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影响来使国大党走上正轨。他曾在某地說过，每当国大党抛棄一些向后看的分子时，它就变得更坚强、更有力一些。目前正是需要进行这种抛棄工作的时刻。在現世主义和科学同复古主义和傳統主义之

間，是沒有妥協余地的。即使把革命看作是持續不斷的過程，社會主義和放任主義也是不能並行的。

東南亞國家的最近趨勢，特別是印度尼西亞和緬甸所發生的事件，指出，在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很多共同之處。在共產黨的積極合作下，蘇加諾和吳努分別抵擋住了國內反動集團的攻擊，而這些反動集團都是得到帝國主義的幫助的。這些事實正指出，在真正的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很多的共同點。

印度的青年一代對尼赫魯的期望很大；毫無疑問，人們要求他做出一生中最偉大的決定。不過，不管尼赫魯做什麼或不做什麼，誰也阻止不了印度的前進。反共的道路不可能是印度的道路。印度的道路將是所有矢志拯救千百萬飢餓人民的進步力量的大團結。在國大黨內外都有一些很有影響而還沒有表示意見的人士；對他們來說，反對共產主義並不是一種宗教。他們是印度千百萬人民的崇拜者，正是這些人民的貧窮和災難使他們團結了起來。他們的力量會發生作用。誰也阻止不了他們。他們必然會獲得最後的勝利。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